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7 1959

5061/5600.1
2 79-90
(1959)

中國語文

ZHONGGUO YUWEN

1

1959

C495

1959年1月号(总第79期)目录

略論汉語語法研究中的資产阶級唯心主义学术思想……刘建輝、李燮純（1）
黎錦熙先生語法研究中的几个問題……史錫堯、李大魁、李桐华、蔡同安（11）
批判張世祿先生在語言学工作中的資产阶級学术思想……严修、胡裕树、張君炎（16）
批判王力《汉語詩律学》中的資产阶級学术思想……金連城（20）

悼念罗常培先生……本刊編輯部、老舍、冰心、魏建功、郑天挺、傅懋勣、王力（22）

現代汉語音节重音的声学本質……苏联 H. A. 斯茔式涅夫（28）

四川邛崃話里的后加成分"兒"和"兒子"……李龄（35）
潮州方言一些語法特点的討論……白星、苏賢輝、林澤熙、俞圭（36）

語文短評
536—545……（39）
从一篇文章的評改談起……王兆麟（40）
談《旅行家》的一篇特写……何季（40）

書刊評介
《学文化詞典》……蔚（41）

語言学名詞解釋(四)……北京大学語言学教研室（44）

动态
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語組大搞科学研究……梁振仕（34）
复旦大学中文系語言教学上的一次革命……湯珍珠、高天如（42）
兰州大学中文系的語言教学和科学研究……謝曉安（43）
上海語文学会举行《馬氏文通》出版60周年学术座談会……程美英（47）
日本中国語学会第九回全国大会簡記……日本 香坂順一（50）

1958年度高等院校学报和学术刊物的語言学論文索引……（48）

請訂閱《中国語文》的讀者注意

1959年《中国語文》月刊篇幅和定价都无变动，每册定价仍为二角四分，因本年第一季度向各地布置預訂时誤将定价填为二角，以致各地收訂时有部分訂戶按每册二角交付訂費。茲特郑重声明更正，如有按照每册二角交付訂費的，务請按原定价向原預訂处补交。

略論汉語語法研究中的資产阶級唯心主义学术思想

刘建輝　李燮純

現代汉語語法的研究，如果从1924年《国語文法》出版算起的話，在我国已經有了三十多年的历史。这三十多年里边，語法学家做了不少工作，也有一定的成績，这是肯定的。但是，語法研究里也存在着严重的資产阶級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这种学术思想給研究工作带来了極其有害的影响，妨碍了祖国語法研究的長足进展。我們在学習語法的过程中深深感到过去的語法研究有这样一种不良風气：不是先分析大量的語言事实，进而归納为語法規律；而是急于建立研究者自己的語法体系，先构拟出一个体系，然后拿語言材料往这个体系里塞。这既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缺乏取人之長、补己之短的虛心精神。結果是体系分歧，术語繁杂，而不解决实际問題，使得学習語法的人很头痛，甚至把学習語法視为畏途。語法研究之所以存在这些問題，是跟研究者缺乏明确的工作目的分不开的。因此，我們这篇文章打算从工作目的和工作方法两方面进行批判。

語法研究的論著数量很不小，一篇文章不可能都談到，我們所討論的只限于几部影响較大、有一定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是：《新著国語文法》（黎錦熙）、《中国語法理論》、《汉語語法綱要》（王力）、《中国文法要略》（呂叔湘）、《語法修辞講話》（呂叔湘、朱德熙）、《語法講話》（語法小組）、《北京話單音詞詞彙》（陆志韋）、《汉語語法論》（高名凱）。这些著作有的不止一个版本，各本內容不尽相同，我們采用的都是最近的本子。

限于我們本身的理論水平和业务水平，这些批判的意見还很不深刻，甚至还可能有不正确的地方。我們希望由此引起国內关心語法研究工作和从事語法研究工作的同志們的注意，进一步展开討論，徹底肃清語法研究中的資产阶級学术思想，經过大家的努力建立馬克思主义的汉語語法学；这就是本文希望达到的目的。

一　目的不明确，为研究而研究

資产阶級学者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研究而研究。一本著作，为什么而写，写給誰看，解决什么問題，是不明确的。語法研究也不例外。王力先生在《汉語語法綱要》"导言"里談到語法研究的目的說：

> 勿以为語法能使文章做得好。…現代語言学里的grammar只是对于某一民族的語言事实加以分析，并不怎样着重在矯正坏習慣，更不会企圖改善語言。…語法学家只把語言当做一种动物来解剖，并不把它当做一瓶鮮花来欣賞。（着重点原有——引者）

在王力先生看来，語法学并沒有指导語言实践的任务，語法学家只是把語言当作一种动物，解剖了完事；至于这种"解剖"是否对闡明語法的本質問題有关，对讀者到底有多少用处，对于語言規范化到底有沒有帮助，語法学家可以完全不管。我們認为，眞正的科学必須是从实踐中来，到实踐中去的，它研究客观現象的最終目的乃是指导实踐，分析也好，解剖也好，都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王力先生所提倡的"現代語言学里的grammar"不是这样的科学，它把手段当作目的，它并沒有解决指导实踐这样一个根本問題。

語法学家有时候也談一談写書的目的，象《中国文法要略》就談到帮助讀者学習标准語和閱讀文言作品两个方面（頁5）。我們姑且不論这两个目的是不是全面，只来看看著者的工作能不能达到这两个目的。我們覺得呂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里常常离开了他給自己規定的目的，为分析而分析，流于繁瑣細碎。比如講"指称"，立了不少名目：特指、承指、助指、任指、虛指、全称、偏称、他称、分称、普称、各称、隅称、逐称。这里究竟有多少是从詞的語法特点和詞在句子里的作用来区分的呢？究竟对讀者有多少帮助呢？恐怕都很成問題。

再举黎錦熙先生的《国語文法》作例子。黎先生分析"我的心象水似的"这句話，認为"可以分两方面說他的省略"：一方面"省略了主位名詞'干淨'，补足起来，应作：我心里的干淨，象水似的。"另一方面"省略述語方面的述說詞"，"各补出所省略的述語，作：我的心干干淨淨，象水似的。我的心干干淨淨，和水一般。"从这两方面出發，黎先生把"我的心象水似的"一句話变成了"我心里的干淨象水的干淨似的"、"我心里的干淨，是和水一般的干淨"、"我的心干干淨淨，象水的干淨似的"、"我的心，干淨得和水一般的（地）干淨"等等

格式，共有十几种之多！（頁93—99）黎先生这种"省略"說对讀者理解汉語、掌握汉語究竟有什么用处？这些格式大部分是誰也不这样說的，不但口語里不这样說，書面語里也找不到。这是典型的为分析而分析的例子，这种分析旣不符合客观实际，又不解决实际問題。

从上面的例子看来，这些語法著作有时对各别現象也可以分析得很"細致"，但这种"細致"往往局限在一些枝节問題上，对于那些重大的問題就注意得很不够。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修訂本序里就說《要略》"有意把詞类分别說成无关重要"。《語法修辞講話》在談到詞类問題时也說："詞类区分虽然在語法理論上是很重要的問題，在实用上并不是語法的最重要部分，远不如句子的結构以及某一些个别的詞的用法重要。"（頁10）吕先生忘了：这种方法忽視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是"見木不見林"的方法。忽視了对这些重要問題的認眞的探討，就不可能揭示語言事实的全貌，因而也不可能达到帮助讀者学習語言的目的。

在忽視語法里边这些重大問題的同时，語法学家对一些很需要解决的实际問題也常常不够注意。比如"的"字的使用規律几部語法著作都沒有很好地研究。《中国文法要略》只是說：

> 表組合关系的"之"和"的"，有些地方非用不可，有些地方可用可不用，要說明白，非三言两語可了。主要的原則是結合得紧就不用，結合得松就要用。（頁20）

但是讀者还是要問：什么情况下結合得紧，什么情况下結合得松？在一些无关語法規律的問題上連篇累牘，不厭繁瑣，为什么这些地方就只能"三言两語"，不肯多費一点笔墨，把它叙述清楚？到底是能"說明白"而不說，还是不能"說明白"而含胡交代？《要略》还說：

> 白話在指示詞后加"的"字表示領屬关系，这个"的"字往往可以不說。（頁161）

> 方位詞和前头的名詞連接的时候，白話可以用"的"，但常常不用，文言的"之"字也是可用可不用。（頁199）

这两段話同样沒有交代"的"字的使用規律。

类似的說法在《語法講話》里也有。在应該闡明規律的时候，《語法講話》有时就用上一些不很确定的字眼，一笔带过。比如談到动量詞的位置时說：

> 跟名詞的宾語連用，动量詞在前头的时候居多。

举的例子有"射了一眼崔甯碌"。又說：

> 不过跟指人的宾語連用的时候，动量詞也常常在后头。

举的例子有"她看了艾艾一眼"。①

这两种說法是互相抵消的。讀者会發生疑問：动量詞跟指人的宾語連用的时候，到底是在宾語前面为常，还是在它后面为常？是随便用，还是有一定的条件？

我們認为，一部語法書要眞正对讀者有用，仅仅告訴讀者我們的語言里边有哪些格式（这往往是"路人皆知"的），而不說明出現这些格式的特征和出現的条件，是很不够的；必須首先把各种詞的变化格式、句子的結构方式加以分析，然后告訴讀者在什么条件下能运用某一个格式，什么条件下不能运用某一种格式。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需要对語言事实进行大量的、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徹底改变那种为研究而研究、为分析而分析的資产阶級学風，进一步明确語法工作的首要目的是指导語言实踐，是更好地發揮語言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作用；徹底改变那种理論脫离实际的状况，堅决貫徹理論联系实际的无产阶級科学原則。

二　主观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

馬克思主义認为，科学研究必須从客观事实出發。毛主席說：

> 認識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覚的阶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覚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屬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覚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錯覚），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論理来。（《毛澤东选集》，頁289）

我們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同时是逐步認識客观事实的过程，我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認識客观事实才有可能。但是資产阶級学者常常不从客观出發，而从主观出發。他們往往抱着成見去分析語言，拿一些現成的"框子"去套語言，因而对語言現象作出了种种片面的、錯誤的解釋。

下面我們从四个方面来分析資产阶級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

1）对于語法的發展的錯誤看法　《中国文法要略》說：

> 近百年是中国社会变动得最剧烈的时代，主要的原因是和西洋文明的接触，这个接触在語文上也發生了影响。这个影响有直接和間接两方面。間接的影响是西洋的語文相当一致的情形促起我們的語文合一运动。…西洋文明的接触同时直接在我們的語文上發生了影响，最重要的是詞彙的改造…；其次是文法方面，也增加了好些新的語句組織的方式。（頁5）

我們并不否認所謂"西洋文明"对于我国社会發展起过一定的推进的作用，但是我国社会發展的更深刻、更本質的原因还要到社会本身去找。因为馬克思主义告訴我們，社会發展是由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是內部原因，不是外部原因。把外部原因看成主要原因，夸大西洋文明的作用是非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重外輕中"的一种表現。要理解近百年来汉語的發展（其中包括語法的發展），必須联系我国的社会發展。因为

---

① 均見《中国語文》1958年1月号，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語言是一种社会現象，它隨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隨社会的發展而發展"，"要了解某种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發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創造这种語言、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硏究，才有可能。"（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頁20）

也許有人会說，上面所引《中国文法要略》关于語法發展的解釋只是解放前呂叔湘先生在接受馬克思主义以前的观点。但是，这种唯心主义观点在解放后并沒有改变，他在《語法修辞講話》里說得更明显了：

> 語法欧化的趋势是很自然的，一切反对的力量都遏止不住这个潮流，但这并不是說我們可以任意模仿外国語言，毫无限制。（頁314，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这句話的后半段反对任意模仿外語，用意是好的，但是前半段关于"欧化"的說法却是完全錯誤的。現代汉語在發展中的确吸收了某些外語成分来丰富自己，但这些成分在汉語里并不占重要的地位，吸收这些成分更不等于"欧化"。語言發展有它的內部規律。汉語按照本身的規律变化發展，日益丰富，日趋精密，这都是为了社会發展的需要，为了进一步交流思想的需要。如果把这种發展变化看成"欧化"，那就会引导到这样的錯誤結論：汉語的語法結构本来是貧乏的，只有在"欧化"以后才能丰富起来。

这个結論显然是錯誤的。解放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出現了很多新詞新語，在构詞的方法上，在句法格式上也都有了某些新的發展。难道这些發展是一种"欧化的趋势"嗎？完全不是。这种情况的出現，是由于人們政治經济生活不断丰富，人們必須用一些新詞新語新格式来表达这些丰富的思想內容。

正因为《語法修辞講話》的著者对于語法本身的發展缺乏正确的認識，对許多正在發展中的新的有用的格式，也采取了一种从主观出發加以限制批評的态度。这样就不但不能对使用語言起指导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妨碍的作用。举例来說，《講話》認为"…工作才能有新的起色"不妥，"說'有新的起色'，是不是以前有过'旧的起色'呢？'新的'这两个字是多余的。"（頁64）但是，我們在叙述一种事物的时候，常常把它的某种屬性突出出来，和代表这种事物名称的詞組成一个向心結构，象"瘋狂的帝国主义"，"卑鄙的个人主义"，等等。这是一种很有用的格式。如果按照《講話》的說法，"瘋狂的"、"卑鄙的"就都是多余的了，因为沒有"不瘋狂的"帝国主义，也沒有"高尙的"个人主义。《講話》对于"用数字概括平列的几項"也不很贊成，說"这种簡称省略太多，初次看見簡直无从猜測它的含义，应当少用"。（頁86）事实上这种格式的發展并不由于人們的粗心和任意，而是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最近的例子就有"除四害"、"四无三潔六面光"、"两放三統一包"等等。它用于正式文件，也为群众所喜聞乐道，相反的，如果不用这种簡称，一定要把它包含的內容一一列举出来，說的人听的人反而都不胜其煩。因此对这种格式加以限制是沒有理由的。

《講話》談到动詞"宾語兼做第二个动詞的主語"的时候，認为"教育"、"組織"都不能有这个格式，"教育他們徹底了解…土地改革政策"之类都不对，必須改成"教育他們，使他們徹底了解…土地改革政策。"这里充分說明了著者不是客观地分析語言事实，探討語法規律，而是抱着自己的主观見解，去指手划脚地批評語言事实。上述用法既簡潔又明确，大家習以为常，絲毫不覺得別扭或者含混。《毛澤东选集》里有"糾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員懂得党的組織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評应当在党的会議上提出"（頁95），"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細心地傾听群众的呼声"（頁1119），有"这样的綱領…对于淪陷区，除組織地下軍准备武装起义一項外，是一个要等到收复后才能实施的綱領"（頁1088—1089）。报紙和杂志上这种用法更多，如"教育少年兒童学習文化科学知識"，"各商业部門組織大批售貨員主动送貨下乡"等。我們实在看不出这种用法有任何違反汉語習慣的地方，相反地倒确实比著者主張的"教育…使…怎样"的格式簡潔得多。

《講話》还認为"部分和全体不能并列"，"团員和青年"应該改为"团員和非团員青年"，"亚洲的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也不合适。（頁246—247）《講話》虽然也看到"这种說法的流行也可以說是有客观需要"，但是，"道理上旣有欠缺，能避免的地方还是应該設法避免"。（頁247）其实，这里所謂"道理"是在汉語習慣里找不到任何根据的，它仅仅是存在著者头脑里的一些与語言无关的偏見。

我們認为，語法是約定俗成的說話的習慣，作为一种法則来說，語法有稳定的一面，也有發展的一面。硏究汉語語法規范，应該指出哪些是違反汉語習慣，因而容易引起混乱，妨碍語言的純潔和健康的格式，提出批評建議；哪些不会引起混乱，因势利导，促进它的健康發展。对于那些不但不会引起混乱，反而能更精确簡練地表达思想的格式就不能采取粗暴的不承認的态度。我們認为，《語法修辞講話》在这方面存在着相当的片面性，原因就是以主观成見代替了客观的分析。

以形而上学的观点对待語言，把語言看成靜止不变的东西也就必然带来另一种錯誤，即把古代汉語和現代汉語混同处理，把古代汉語的特征，强加在汉語的头上。呂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修里說：

古汉語和近代汉語在語法結构上是有些出入的。…上卷論詞句結构，虽然也作了些比較，但是采用了同一个間架，这就不能反映汉語的历史發展，不能使讀者得到正确的認識。这个缺点特别表現在构詞法和詞类的处理上。

对古今汉語的构詞法和詞类采用"同一个間架"来处理，呂先生已經作了自我批判，但是对于析句中存在的同样性質的錯誤还沒有認眞批判。我們举例来說：

晚飯有了，可送不送？（紅，五八）
只怕逛膩了的日子还有呢。（紅，六〇）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論語）

这三个例子里边，"有"字前面的成分（"晚飯"、"逛膩了的日子"…）呂先生說："不能認为'有'的起詞。"因为"文言里通常要在'有'字后面补一个'之'字，这就表示那个名詞虽然用作句子的主語，可是对于'有'字还是个止詞"。（頁66）照著者看来，"晚飯"之所以为止詞，是因为这句話翻成文言以后得在"有"字后面加上个"之"字。又比如：

他們听見說买了鷄蛋糕，就吵着要吃。

著者認为"吃"后面有所省略，因为"改用文言来說，就可以利用'之'字，如…'欲分而食之'。当然也可以省略，如…'即喧嗷索食'。"（頁156）又比如：

你喜欢这件你就穿这件，我可以穿那件。

著者也認为这句"省說名詞，但留單位詞"。但是，我們要問：旣然句子里的名詞已經由代詞代替了，为什么还發生"省說名詞"的問題呢？答案还要到著者自己的話里去找："文言里沒有这种用法。白話里可以說，'这篇文章比那篇〔文章〕好，文言只能說，'此山望見彼山高'。"

白話可以說，文言不可以說的例子，呂先生就認为白話里"省說名詞"；"文言白話同有其例"的，才認为"非省去名詞"。象"倒是丢了印平常，若丢了这个，我就該死了。（紅，三二）"（頁166）就不把它看成省說名詞了。但是，这一句里的"这个"跟"你喜欢这件你就穿这件，我可以穿那件"里的"这件"、"那件"在語法上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一句是省說，另一句又不是省說呢？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来看，呂叔湘先生采用同一个間架来处理古代汉語和現代汉語，对現代汉語的分析常常以古汉語为轉移。我們認为，这不仅是"不能反映汉語的历史發展"的問題，用这种方法来处理現代汉語，根本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結論。因为汉語几千年来經过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了很多發展变化，不看到这种發展变化，用文言的框子来解釋白話，就要犯形而上学的錯誤。

王力先生的《中国語法理論》在处理語言材料的时候也存在同样性質的錯誤。他取材以《紅楼梦》为限（自造例句極少），但《紅楼梦》的語言是二三百年前的語言，和現代汉語已有許多不同。王先生在进行研究时不加抉擇，結果他的書里出現了不少跟現代汉語不合的例句，諸如："众声不一，这一个如此說，那一个又如彼說"（下册頁59）"，横竪有他二哥哥天天同着大夫瞧着"（上册頁75），"相帮尤氏料理"（下册頁170），"誰知竟被老爷看中了"（中国現代語法，上册頁365），等等。根据这些資料得出的結論当然不可能反映現代汉語的眞实面貌。

我們反对"古今杂糅"式地研究語法，批判《中国文法要略》簡單地用文言規律来解釋白話，当然并不意味着反对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語言永远处在运动、变化的状态之中，現代汉語跟古代汉語保持着历史的联系，对两者进行比較研究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上述的例子都不是什么历史比較研究，而是把不同时期的現象給以同一的处理。馬克思主义辯証法告訴我們，語言現象不仅处在运动的状态中，同时在特定的时期內又是相对地靜止的，語言有其确定性、稳定性，正是这种确定性和稳定性使語言的描写研究成为可能。而为了認識語言在某个特定时期內（例如現代汉語）的面貌，就必須暫时撇开它的历史联系，把这个时期的語言当作一个横断面来研究。

2）硬搬西洋語法規律和語法理論　語法研究中唯心主义的另一种表現是不顧汉語事实，硬搬西洋語法規律或語法理論，用来說明汉語。不用說，这种"張冠李戴"的方法根本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結論。

硬搬西洋語法規律比較突出的是黎錦熙先生、王力先生和高名凱先生。呂叔湘先生的著作里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先談黎先生的《国語文法》。在这部書里，著者虽然也看到汉語語法中，詞类問題与印欧語不同，提出了"句本位"的口号，但是第六章以下分論各类詞的"細目"，并沒有脫出西洋語法的窠臼。許多分析（象把名詞分为特有名詞、普通名詞、抽象名詞，把代名詞分为人称、指示、疑問、联接四种，等等）还是套用英語語法的。至于黎先生的"句本位"里面，也不是沒有問題的。①在分析汉語句子的时候，硬搬英語語法也不乏其例。比如第41节分析"有人傳說这件事，但沒有人看見过"里的"有"和"沒有"时說：

这些"有"字又怎样呢？…他乃是'領起主語'的一种"冠詞（Article）性的形容詞'：恰相当于英文的A或Some, Any；而表示否定的'沒有'（或'无'），就相当于英文中作形容詞的no了。（頁51）

① 关于黎錦熙先生的"句本位"，史錫堯、李大魁兩位同志的論文《黎錦熙先生語法体系批判》（載《中国語文》1958年10月号）已經加以批判，請參看。

类似的比附在《国語文法》中絕不是个别的，63节"'的'字的特别用法"里把"卖花的"的"的"看作联接代名詞 (relative pronoun) 就是强与英語比附的例子。这在不懂英語的人看来，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又比如把"他不来是一件怪事"、"品質优良的学生很不少"之类都看成复句，也是硬搬英語語法的結果。这样的說明是不符合汉語事实的，与其說是說明汉語語法，倒不如說是翻譯英語語法。

王力先生在他的著作里很强調汉語的特征，反对"有意識地或无意識地，把西洋某詞'譯'成中国話，再把这中国話認为和西洋那一个詞同一性質"。（《中国語法理論》，上册，頁2，"翻譯不是語法"）但是王先生的工作并不是这样。他用的方法是拿汉語同外語（主要是英語和法語）来对比，不同的地方就是"汉語的特征"。我們拿《中国語法理論》上册第一章造句法（上）做例子来說明。这一章論述的都是汉語語法的基本概念，这一章可以說是有"总論"的性質的。它包括字和詞、詞类、詞品、仂語、句子、句子形式和謂語形式、叙述句、描写句和判断句、复合句等九节。每一节都是举些外語作例，介紹一下叶斯柏森怎么說、柏龙菲尔德怎么說，然后拿汉語来同外語比較——用的是这样一种方法。我們不否認不同語言的比較有一定的用处，但是王力先生的方法并不是正确的比較方法。王先生实际上是先給汉語事实加上一个框子，讓語言事实屈从于这个框子，所謂比較，所謂特征，都不出这个范圍。这样做，到底能不能揭示出汉語的眞实的、全面的状貌呢？答案是否定的。

另一方面，王力先生有时也直接套取西洋語法規律来說明汉語語法，犯了跟黎錦熙先生类似的錯誤。《中国語法理論》第24节（頁330—350）和第25节（頁350—360）論述联結詞和关系末品就是一个例子。

"若…則…""虽…但是…""因为…所以…"这一类格式，王力先生是分作两种語法范疇来处理的。他把"若、虽、因为"称作关系末品，把"則、但是、所以"称作联接詞。前者的根据是：1)"若、虽"等永远不能放在两个分句之間；2)如果分句有主語的話，"若、虽"經常在主語后面。后者的根据是：1)"則、但是"等放在两个分句之間；2)"則、但是"不能放在主語后面或插入謂語中間。事实上，王先生所說的关系末品和联接詞关系是很密切的，它們在复句里合起来表示各分句之間的种种关系，把它們分成两个范疇是不恰当的。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分？还是根据英語語法。"西洋普通所謂連詞，是放在其所連結的两个語言成分的中間的，至少是可以放在中間的。例如英語的 if-clause, because-clause, though-clause, when-clause 等，往往是放在主要句子的前或后均可的。"（着重点原有——引者）

呂叔湘先生說他的《中国文法要略》"无意之中繼承了""前人写書講虛字和句讀的精神"（修訂本序），但是硬搬西洋語法規律的地方也是有的。比如：

>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論，阳貨）
>
> 何以致"伐"，未圍齐也；未圍齐則其言"圍齐"何？抑齐也。（公羊，襄一九）

著者說："我們要是不跟英語比較，不感覺这两处的'未'有什么两样。"（頁241）这里两个"未"本来沒有形态上的不同，但是著者一定要比附英語，找出它們的"不同"来。又比如說，著者分析时間，"現在，过去，将来，謂之三时"，"'現在'是个基点，'过去'和'将来'都不是基点，一个是基点前，一个是基点后"，"我們不一定老是拿說話的此刻作基点，有时我們把基点放在过去，例如說'唐代'。就說話的此刻而論，'唐代'屬于过去，但是我們說'唐以前'和'唐以后'的时候就又拿唐代做基点了。同样，基点也可以移往将来，如'一九六〇年'。"（頁222）从这兒出發，又立了"基点时、基点前时、基点后时""絕对基点、相对基点"一系列的名目。这样的分析，是直接从叶斯柏森的《語法哲学》和《英語語法綱要》里搬过来的。这样的搬用，对于汉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不論"基点"在現在或在唐代，汉語句中的动詞都沒有印欧語那样的形态变化。

高名凱先生在《汉語語法論》里套用外語規律来說明汉語的地方更加突出。在分析"中国風俗、李子核兒"里"中国、李子"的詞性的时候，他說："在有形态变化的語言里，（中国、李子）多半都带有形容詞的詞尾，如果我們認为它們不是形容詞，那么我們就必得否認說汉語的人有把这些詞彙意义抽象成性質的能力。"（頁76）在分析"道德"是不是一个詞的时候，他說，道德只能譯成英語 morality，不能譯成 principle and virtue，所以是一个詞。从这些例子看来，高先生分析汉語的时候，主要是从心目中那些个外語的例子出發的。很明显，不从汉語事实出發，而从外語的标准出發来研究汉語的內在規律，这就是資产阶級的唯心主义观点。

王力、呂叔湘先生在詞类和句法問題上采用叶斯柏森的"三品說"是硬搬西洋語法理論的显著的例子。

叶斯柏森看到現代英語的詞形变化与希腊、拉丁語不同，一部分詞形变化正在消失，因而产生了一詞多类的問題。于是他把詞类和詞品分开，把句子里的詞分成三"品"。比如"这只狂吠的狗"和"这只狗狂吠"，在叶斯柏森看来，两个"狗"都是首品，"这只"是次品，"狂"是末品；而"吠"是次品。为什么把"吠"定为次品，叶氏自己也講不出所以然来，只是因为"它必須說成是从屬于'狗'而在品級上高于'狂'"。（《英語語法綱要》，頁79）換句話說，因为"吠"比"狂"（末品）高一級，而又从屬于"狗"（首品），所以是次品。——因为是次

古汉語和近代汉語在語法結构上是有些出入的。…上卷論詞句結构，虽然也作了些比較，但是采用了同一个間架，这就不能反映汉語的历史發展，不能使讀者得到正确的認識。这个缺点特别表現在构詞法和詞类的处理上。

对古今汉語的构詞法和詞类采用"同一个間架"来处理，吕先生已經作了自我批判，但是对于析句中存在的同样性質的錯誤还沒有認眞批判。我們举例来說：

晚飯有了，可送不送？（紅，五八）

只怕逛膩了的日子还有呢。（紅，六〇）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論語）

这三个例子里边，"有"字前面的成分（"晚飯"、"逛膩了的日子"…）吕先生說："不能認为'有'的起詞。"因为"文言里通常要在'有'字后面补一个'之'字，这就表示那个名詞虽然用作句子的主語，可是对于'有'字还是个止詞"。（頁 66）照著者看来，"晚飯"之所以为止詞，是因为这句話翻成文言以后得在"有"字后面加上个"之"字。又比如：

他們听見說买了鷄蛋糕，就吵着要吃。

著者認为"吃"后面有所省略，因为"改用文言来說，就可以利用'之'字，如…'欲分而食之'。当然也可以省略，如…'即喧譁索食'。"（頁 156）又比如：

你喜欢这件你就穿这件，我可以穿那件。

著者也認为这句"省說名詞，但留單位詞"。但是，我們要問：旣然句子里的名詞已經由代詞代替了，为什么还發生"省說名詞"的問題呢？答案还要到著者自己的話里去找："文言里沒有这种用法。白話里可以說，'这篇文章比那篇〔文章〕好，文言只能說，'此山望見彼山高'。"

白話可以說，文言不可以說的例子，吕先生就認为白話里"省說名詞"；"文言白話同有其例"的，才認为"非省去名詞"。象"倒是丢了印平常，若丢了这个，我就該死了。（紅，三二）"（頁 166）就不把它看成省說名詞了。但是，这一句里的"这个"跟"你喜欢这件你就穿这件，我可以穿那件"里的"这件"、"那件"在語法上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一句是省說，另一句又不是省說呢？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来看，吕叔湘先生采用同一个間架来处理古代汉語和现代汉語，对现代汉語的分析常常以古汉語为轉移。我們認为，这不仅是"不能反映汉語的历史發展"的問題，用这种方法来处理现代汉語，根本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結論。因为汉語几千年来經过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了很多發展变化，不看到这种發展变化，用文言的框子来解釋白話，就要犯形而上学的錯誤。

王力先生的《中国語法理論》在处理語言材料的时候也存在同样性質的錯誤。他取材以《紅楼梦》为限（自造例句極少），但《紅楼梦》的語言是二三百年前的語言，和現代汉語已有許多不同。王先生在进行研究时不加抉擇，結果他的書里出現了不少跟現代汉語不合的例句，諸如："众声不一，这一个如此說，那一个又如彼說"（下册頁 59）"，横竪有他二哥哥天天同着大夫瞧着"（上册頁 75），"相帮尤氏料理"（下册頁 170），"誰知竟被老爷看中了"（中国現代語法，上册頁365），等等。根据这些資料得出的結論当然不可能反映現代汉語的眞实面貌。

我們反对"古今杂揉"式地研究語法，批判《中国文法要略》簡單地用文言規律来解釋白話，当然并不意味着反对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語言永远处在运动、变化的状态之中，现代汉語跟古代汉語保持着历史的联系，对两者进行比較研究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上述的例子都不是什么历史比較研究，而是把不同时期的現象給以同一的处理。馬克思主义辯証法告訴我們，語言現象不仅处在运动的状态中，同时在特定的时期內又是相对地靜止的，語言有其确定性、稳定性，正是这种确定性和稳定性使語言的描写研究成为可能。而为了認識語言在某个特定时期內（例如現代汉語）的面貌，就必須暂时撇开它的历史联系，把这个时期的語言当作一个横断面来研究。

2）硬搬西洋語法規律和語法理論 語法研究中唯心主义的另一种表現是不顧汉語事实，硬搬西洋語法規律或語法理論，用来說明汉語。不用說，这种"張冠李戴"的方法根本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結論。

硬搬西洋語法規律比較突出的是黎錦熙先生、王力先生和高名凱先生。吕叔湘先生的著作里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先談黎先生的《国語文法》。在这部書里，著者虽然也看到汉語語法中，詞类問題与印欧語不同，提出了"句本位"的口号，但是第六章以下分論各类詞的"細目"，并沒有脫出西洋語法的窠臼。許多分析（象把名詞分为特有名詞、普通名詞、抽象名詞，把代名詞分为人称、指示、疑問、联接四种，等等）还是套用英語語法的。至于黎先生的"句本位"里面，也不是沒有問題的。①在分析汉語句子的时候，硬搬英語語法也不乏其例。比如第 41 节分析"有人傳說这件事，但沒有人看見过"里的"有"和"沒有"时說：

这些"有"字又怎样呢？…他乃是'領起主語'的一种'冠詞（Article）性的形容詞'：恰相当于英文的 A 或 Some, Any；而表示否定的'沒有'（或'无'），就相当于英文中作形容詞的 no 了。（頁 51）

① 关于黎錦熙先生的"句本位"，史錫堯、李大魁兩位同志的論文《黎錦熙先生語法体系批判》（載《中国語文》1958 年 10 月号）已經加以批判，請参看。

类似的比附在《国語文法》中絕不是个别的，63节“‘的’字的特別用法”里把“卖花狗”的“的”看作联接代名詞(relative pronoun)就是强与英語比附的例子。这在不懂英語的人看来，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又比如把“他不来是一件怪事”、“品質优良的学生很不少”之类都看成复句，也是硬搬英語語法的結果。这样的說明是不符合汉語事实的，与其說是說明汉語語法，倒不如說是翻譯英語語法。

王力先生在他的著作里很强調汉語的特征，反对“有意識地或无意識地，把西洋某詞‘譯’成中国話，再把这中国話認为和西洋那一个詞同一性質”。(《中国語法理論》，上册，頁2，“翻譯不是語法”)但是王先生的工作幷不是这样。他用的方法是拿汉語同外語（主要是英語和法語）来对比，不同的地方就是“汉語的特征”。我們拿《中国語法理論》上册第一章造句法（上）做例子来說明。这一章論述的都是汉語語法的基本概念，这一章可以說是有“总論”的性質的。它包括字和詞、詞类、詞品、仂語、句子、句子形式和謂語形式、叙述句、描写句和判断句、复合句等九节。每一节都是举些外語作例，介紹一下叶斯柏森怎么說、柏龙菲尔德怎么說，然后拿汉語来同外語比較——用的是这样一种方法。我們不否認不同語言的比較有一定的用处，但是王力先生的方法幷不是正确的比較方法。王先生实际上是先給汉語事实加上一个框子，讓語言事实屈从于这个框子，所謂比較，所謂特征，都不出这个范圍。这样做，到底能不能揭示出汉語的眞实的、全面的状貌呢？答案是否定的。

另一方面，王力先生有时也直接套取西洋語法規律来說明汉語語法，犯了跟黎錦熙先生类似的錯誤。《中国語法理論》第24节(頁330—350)和第25节(頁350—360)論述联結詞和关系末品就是一个例子。

“若…則…”“虽…但是…”“因为…所以…”这一类格式，王力先生是分作两种語法范疇来处理的。他把“若、虽、因为”称作关系末品，把“則、但是、所以”称作联接詞。前者的根据是：1)“若、虽”等永远不能放在两个分句之間；2)如果分句有主語的話，“若、虽”經常在主語后面。后者的根据是：1)“則、但是”等放在两个分句之間；2)“則、但是”不能放在主語后面或插入謂語中間。事实上，王先生所說的关系末品和联接詞关系是很密切的，它們在复句里合起来表示各分句之間的种种关系，把它們分成两个范疇是不恰当的。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分？还是根据英語語法。“西洋普通所謂連詞，是放在其所連結的两个語言成分的中間的，至少是可以放在中間的。例如英語的if-clause, because-clause, though-clause, when-clause等，往往是放在主要句子的前或后均可的。”(着重点原有——引者)

呂叔湘先生說他的《中国文法要略》“无意之中繼承了”“前人写書講虛字和句讀的精神”（修訂本序），但是硬搬西洋語法規律的地方也是有的。比如：

>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論，阳貨)
>
> 何以致“伐”，未圍齐也；未圍齐則其言“圍齐”何？抑齐也。(公羊，襄一九)

著者說：“我們要是不跟英語比較，不感覺这两处的‘未’有什么两样。”(頁241)这里两个“未”本来沒有形态上的不同，但是著者一定要比附英語，找出它們的“不同”来。又比如說，著者分析时間，“現在，过去，将来，謂之三时”，“‘現在’是个基点，‘过去’和‘将来’都不是基点，一个是基点前，一个是基点后”，“我們不一定老是拿說話的此刻作基点，有时我們把基点放在过去，例如說‘唐代’。就說話的此刻而論，‘唐代’屬于过去，但是我們說‘唐以前’和‘唐以后’的时候就又拿唐代做基点了。同样，基点也可以移往将来，如‘一九六〇年’。”(頁222)从这兒出發，又立了“基点时、基点前时、基点后时”“絕对基点、相对基点”一系列的名目。这样的分析，是直接从叶斯柏森的《語法哲学》和《英語語法綱要》里搬过来的。这样的搬用，对于汉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不論“基点”在現在或在唐代，汉語句中的动詞都沒有印欧語那样的形态变化。

高名凱先生在《汉語語法論》里套用外語規律来說明汉語的地方更加突出。在分析“中国風俗、李子核兒”里“中国、李子”的詞性的时候，他說：“在有形态变化的語言里，(中国、李子)多半都带有形容詞的詞尾，如果我們認为它們不是形容詞，那么我們就必得否認說汉語的人有把这些詞彙意义抽象成性質的能力。”(頁76)在分析“道德”是不是一个詞的时候，他說，道德只能譯成英語morality，不能譯成principle and virtue，所以是一个詞。从这些例子看来，高先生分析汉語的时候，主要是从心目中那些个外語的例子出發的。很明显，不从汉語事实出發，而从外語的标准出發来研究汉語的內在規律，这就是資产阶級的唯心主义观点。

王力、呂叔湘先生在詞类和句法問題上采用叶斯柏森的“三品說”是硬搬西洋語法理論的显著的例子。

叶斯柏森看到現代英語的詞形变化与希腊、拉丁語不同，一部分詞形变化正在消失，因而产生了一詞多类的問題。于是他把詞类和詞品分开，把句子里的詞分成三“品”。比如“这只狂吠的狗”和“这只狗狂吠”，在叶斯柏森看来，两个“狗”都是首品，“这只”是次品，“狂”是末品；而“吠”是次品。为什么把“吠”定为次品，叶氏自己也講不出所以然来，只是因为“它必須說成是从屬于‘狗’而在品級上高于‘狂’”。(《英語語法綱要》，頁79)換句話說，因为“吠”比“狂”(末品)高一級，而又从屬于“狗”(首品)，所以是次品。——因为是次

品，所以是次品！这种說法在邏輯上是極端混乱的。它不反映任何語言本質的問題，三个"品"都是从心理出發規定的，表現了極大的主观随意性，对句子願意怎么解釋就怎么解釋。这是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

王力先生在《中国語法理論》上册第一章第三节"詞品"里譯述了叶氏关于三品說的話，盛贊三品說对研究中国語法的"貢獻"，并且在自己的著作里运用了这种方法。《中国語法理論》新版自序批判了叶斯柏森，但是这个批判还是很不徹底的。新版自序里有一段話：

> 三品說本身也有很大的缺点，譬如說，一般所謂动詞所处的地位，叶斯泊生叫做次品，我也跟着叫做次品。其实謂詞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它是和主詞的地位一样重要，为什么也叫做次品呢？反过来說，目的語的地位一般是沒有謂詞的地位那样重要，为什么它倒反是首品呢？由此看来，对于三品說，我連"自圓其說"都做不到了。（上册頁11）

那么，是不是把謂詞定为首品，把目的語定为次品，就能"自圓其說"，就避免了三品說的缺点呢？不，不可能的。叶斯柏森的錯誤在于从心理出發，而王先生对他的批判同样是从心理出發的，以錯攻錯，当然不可能达到批判的目的。

《中国文法要略》所受三品說的影响，呂叔湘先生在修訂本序里也已經批判，修訂本又删去了一些錯誤比較明显的地方，但是还不能認为三品說的影响已經清除了。象叶斯柏森那样，从心理出發，从意义出發，来分辨句子成分的首要与次要，在修訂本《要略》里还可以找到例証。比如：

> 拿叙事句来說，旣是叙述一件事情，句子的重心就在那个动詞上，此外凡动作之所由起，所于止，以及所关涉的各方面，都是补充这个动詞把句子的意义說明白，都可称为"补詞"。… 可是所有的补詞和动詞的关系并非同样密切，起詞和动作的关系最密切，止詞次之，其他补詞又次之，如时間补詞及方所补詞和动詞的关系就疏得很，有他不嫌多，无他不嫌少。但是如果沒有起詞，那个动詞就悬在半空，代表很抽象的概念，不成一个具体的动作了。止詞有时候也有同样的重要，所以我們才把他們另外提出来，不和其余补詞一律看待。（"补詞总說"，頁53）

这是著者关于叙事句的总結性的說明。我們認为得出这样的結論的观点和方法同叶斯柏森还是大体一致的，尽管結論不同（呂先生認为动詞是句子的重心，而叶氏認为主語是首品）。

象三品說那样，从心理出發来判断句子各成分的主要与次要，在分析具体語言时会碰到不少困难。比如复杂謂語里不止一个动詞，即使把主謂分开了，对謂語里的各个动詞又怎样分？"我打电話叫他来"，哪一个动詞更重要一些？这是很难回答的。事实上，在不同的語言环境里，句子的"重心"可以在不同的句子成分上。象"哪朵花謝了？——紅花謝了"，"紅"在这个句子里的地位显然并不是次要的，"他今天不来，明天来。"时間副詞"今天"、"明天"，显然不是"有它不嫌多，无它不嫌少"。"我找他，不找你"，"重心"就在宾語上。由此可見，我們不可能給句子規定一个死框子，說哪个成分一定是首要，哪个成分一定是次要。句子各个成分都是意义所借以表达的必要手段，从主观出發来机械規定某种句子成分的首要与次要，是脫离实际的主观唯心的方法。

3）偏重意义分析，甚至用詞义分析来代替語法分析　过去的語法研究有一个比較普遍的缺点，就是偏重詞义的分析。在分析句子的时候，往往着重分析句子里边某一个詞的意义、它跟别的詞意念上的关系，忽視結构形式，甚至用詞义分析代替了語法分析。

我們說，詞是語言的建筑材料，但詞并不就是語言。語言里的詞不是孤立存在的，詞在句子里按照一定的規則組合起来，这样才具有一种有条理的、可以理解的性質。一方面，詞具有一定的意义，另一方面，詞与詞是按照各种結构形式組合起来的。詞的意义是語义学或詞彙学的研究对象，詞与詞的結构形式是語法学的研究对象。

在任何語言里，意义和形式是互相結合的，但語法学所研究的首先是結构的規律。离开結构形式去談詞彙意义得出来的就不是語法的規律。斯大林說：

> 文法的特点就在于它給以詞的变化的規則，不是指具体的詞，而是指沒有任何具体性的一般的詞；它給以造句的規則，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句子…而是指一般的句子，是与某个句子的具体形式无关的。因此文法把詞和語加以抽象化，而不管它的具体内容。文法把詞的变化和用詞造句的基本共同之点綜合起来并用这些共同之点組成文法規則、文法規律。文法是人类思惟長期抽象化工作的成果，是人类思惟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的指标。（《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頁22）

斯大林在这里是就語法学的性質来說的。当然，在进行語法研究的时候，我們还是先从許多具体的句子开始我們的工作的。我們要从某个特定的句子里研究它的意义用什么形式来表达。但这只是工作的起点而不是工作的終点。我們由这兒开始，从許許多多的句子里，也就是說，从許許多多的意义和形式的結合体里，抽象出普遍的、概括的結构形式規律来。簡單点說：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

过去的語法研究，如前所述，严重的缺点之一就是局限于具体的句子的分析，并且在分析具体的句子时偏重詞彙意义，忽略結构形式。由于运用这种方法，就产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問題：

a）因为偏重意义，忽視結构，所以把意义相同或

相近而結构不同的句型当作同一类格式来談。

《中国文法要略》分析致使句，把“王請無好小勇，王請勿疑”跟“于是家人延画工画”“我劝你过两天再去找他”归为一类，理由是：“王請”不妨从权当作等于“請王”。(頁94)这种說法显然是錯誤的。“王請”跟“延画工”“劝你”是两类不同的格式。又比如把“你别把我当三岁孩子”列入意謂句，理由是“等于‘以…为’分用”。(頁100)但是，“把…当”和“以…为”只是意义上相近，結构上却不相同。“把我当三岁孩子”可以說成“当我三岁孩子”，但“以我为…”却不能說成“为我…”，只能說“以为我…”。因此，把这两种格式等同起来，跟上面一样都是上了“意义”的当。

b）因为偏重意义，忽視結构，所以把結构相同而詞彙意义不同的句型分为不同的类型。

《中国文法要略》把“你又有母亲，又有哥哥，这里又有买卖地土，家里又仍旧有房有地(紅、四五)”归在加合关系里边(頁333)，把“我回来病了三天，病中又想她，又咒她”归在对待关系里边(頁342)。其实，“又有母亲，又有哥哥”跟“又想她，又咒她”只是意义上有区别(前者的分句是平列的，而后者的分句是对立的)，結构上是完全一样的。又比方說，《要略》又把对待关系分作两类：一类是“眞正对待”，例如“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郑書)”；一类是“似相反而相成”，例如“車兒向东，馬兒向西。”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因为照著者看来，“眞正的对待关系指上下两小句的意义相背，两事互相映發，构成一种对照”，而“似相反而相成的对待句，只是字面上对待，意思是互相补充的”。(頁341)呂先生把对待关系分得这样細，純然用的意义标准，缺乏結构形式的根据。这种分法对讀者理解和掌握这种語法現象有多少帮助呢？可以說并沒有多少帮助。因为“車兒向东，馬兒向西”也未始不可以說是“两事互相映發，构成一种对照”，而“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也未始不可以說“只是字面上对待，意思是可以互相补充的”。由此可見，这也是一种为研究而研究、为分析而分析的做法。

單純从意义来講語法，必然陷入繁瑣主义。因为，只要意义有一点不同，都可以列出不同的名目，結果名目繁多而不能揭示汉語語法結构的眞象，当然也不解决实际問題。前面所举的例子已經可以說明这个問題，下面我們再来看看《語法講話》的一些例子。

《語法講話》在分析体詞謂語的时候分了好些类：

甲、主語是屬于謂語的那一类　例如：我浙江人。

乙、謂語是带数詞的体詞結构　例如：他十五公斤。

丙、主語謂語都含有数詞　例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丁、表示主語与謂語同一　例如：你这个傻子。

戊、謂語是主語的一部方　例如：那个人黃头髮。

……(《中国語文》，1952年10月号，頁22)

这几类里边，乙、丙两类的謂語同样是数詞結构，但丙类主、謂語可以互換，乙类不能互換，分成两类还有語法上的根据。而甲、丁、戊三类，与其說是語法分类，还不如說是邏輯分类，因为它們的区分是以主語和謂語各自所代表的概念是同一关系还是包含关系为根据的。又比如說，《語法講話》分析以“有、无、沒、沒有”做动詞的句子时，把这些句子分做四类，第一类表領屬：

所謂領屬包括各种各样关系。“他有两身新衣裳”，“他有两个孩子”，“他沒有新衣裳”，“他沒有孩子”，“他”跟“衣裳”的关系是一种，“他”跟“孩子”的关系又是一种。(《中国語文》，1952年12月号，頁14)

这种分别显然也不是語法上的分别。

c）偏重意义，有些結构就不能分析清楚，只好一笔带过。

《中国文法要略》說：

白話里用“两”也用“二”，这两个字的分别不容易定出一条簡單而概括的規則。只能說，“两”字比較家常些，亲切些；寻常的單位詞之前都用他。(頁135)

“家常些”“亲切些”如何理解？讀者讀了这段話以后还是不能掌握“两”和“二”的規律。

《要略》分析“是誰在外面嚷个不淸？”“是誰叫你来的？”“是誰起的这样刁鑽名字？”說：

这是因为我們不很願意用“誰”做动詞的起詞，所以把句子改成判断式，讓“誰”在形式上成为謂語，这似乎是“誰”字的最合适的身分。(頁174)

这段說明也完全是从著者的主观臆断出發的，絲毫沒有解决“是誰叫你来的？”和“誰叫你来的？”两种結构的关系問題。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这些語法学家偏重意义的缺点是很淸楚的(只是程度各有不同)，而对于意义又往往从自己的主观感覺出發去研究，从中演繹出語法規律来，这种方法也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現。

4）不是从語言事实出發得出結論，而是从主观出發，讓語言事实服从主观見解　首先談一談“省略”和“变式”的問題。

汉語的句型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設想用一个簡單的格式来概括一切。但是，有的語法学家却是这样来对待語言事实的。黎錦熙先生在《国語文法》里說：

一个人說話，开口便要道个“什么”；这个“什么”，就是他那句話里边的主腦。…若單个說“什么”，不說它“怎么样”，那主腦不过是一个靜止的观念，永远不会表示一个活动的思想出来；只是一个“詞”(或短語)，永远不会成完全的“句子”。所以主語之后，必定跟着一个述語。(頁13)

黎先生用“主語——述語”这样一个簡單的格式去看待語言，当然无法賅括复杂多样的句型。这时候他就用

"省略"和"变式"来解决困难，主述之中，缺了一项就是省略，次序颠倒就是变式。下面这些句子，黎先生都看做省略句(均見《国語文法》第五章)：

[ ]来吧！　吃飯，[ ]要右手拿筷子。　[ ]請[ ]坐。　这是一本很好的書，我要再讀[ ]一遍。　大街上有一个卖花的[ ]。今天的会到了两百人，其中劳动模范就有二十个[ ]。　这酒[ ]太淡。　我的心象水似的。

下面这些句子，黎先生都認为变式句(均見《国語文法》第四章)：

我把一本書送張先生。　我連这本書也讀完了。　这本書，我可以送給張先生。

下面这些句子黎先生既認为省略，又認为变式（均見《国語文法》第四章)：

茶棚里坐着許多的工人。　前面来了一个和尙。

照黎先生看来，"这种句子，若改为正式的，便是：許多的工人〔在〕茶棚里坐着。一个和尙〔到〕前面来了。"(頁47—48)

《中国文法要略》所講的"省略"和"变次"范圍沒有《国語文法》这么大，但同样是从主观出發的：

…要把一件事情說清楚，必須說明这个动作起于何方，止于何方，如圖解：动作起点(猫)——动作(捉)——动作止点(老鼠)(頁28)

一个句子必得有个"什么人"，或"什么东西"，然后还得說明这个人或这个东西"怎么样"，这两个部分缺一个就不成句(特殊情形又当別論)(頁23)

表态句里的正常詞序是先主語，后謂語。(頁57)

著者拿"主語——謂語"(表态句)"起詞——动詞——止詞"(叙事句)这样两个标准来衡量句子，也發生了"省略"和"变次"的問題。下面的例句，著者都認为是省略：

請坐(＝我請你坐)　快来(＝你快来)　本校欢迎参观(＝任何人参观)　打鐘了，吃飯去罢(頁29—30)

別罵，是我(別罵"人")　只要埋头学，不怕学不会(学任何事)(頁31)

下面这些例句，著者都認为变次：

吾誰欺，欺天乎？　古人不我欺也。　你这个孩子，書不念，專門淘气！　什么事情她都懂(頁34—35)

在"省略"問題上，照黎、吕两先生的办法，有些句子是可以"补"上一个成分的。但是，象"〔我〕請〔你〕坐""今天的会到了两百人，其中劳动模范就有二十个〔人〕"之类只是邏輯上可能有的說法。我們是講語法，不是講邏輯，我們应該从語言事实出發。按照一般的語言習慣，根本不說"我請你坐"之类。省略是相对于完整来說的。一个句子如果已經完整地表达了意思，就不能認为省略了什么成分，尽管它不一定合于語法学家的主观标准。

其实，所謂"补"完全是从主观出發的，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客观标准。黎先生認为，"主人讓客"是"主人讓客吃茶"的省略，我們也未始不可以說是"主人讓客喝酒"的省略。吕先生認为，"請坐"可以补成"我請你坐"，事实上語言里很少这种說法，倒是常听說："你請坐"。如果"請坐"可以补成"我請你坐"，"請教""請問"不知吕先生、黎先生認为該怎么补？"請教"要是也补成"我請你教"，那末"請教你一个問題"該补成什么样子？"請問"显然更不是"我請你問"了。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黎先生不厭其煩地把"我的心象水似的"生造出十几种格式来，可見塡补是无穷无尽的。这种分析不仅不符合汉語实际，而且只能陷入不可知論的泥坑。

"变式(变次)"問題的性質也是类似的。吕叔湘先生認为《論語》里的"吾誰欺"是变次，但是这实在是正常的次序。在先秦汉語里边，"吾欺誰"之类的格式不能說沒有，但却是極少数的例外。把通例看作"变次"，把例外看成正次，这是本末倒置的。吕先生也不是沒有發現这个問題，他說：

具有三个成分的叙述句的正常次序是：起——动——止，这是无須再說什么的。但是这个次序不是普遍的，白話和文言里都有"变次"的情形。(頁33)

黎先生在《国語文法》里也說：

但本書所謂"变式"，大都仍是国語習慣上的正規句法，并不能还原的。(頁37)

既然起——动——止这个次序"不是普遍的"，既然所謂"变式"大都是"不能还原的""正規句法"，也就是說黎、吕先生的分析不符合語言实际，那么为什么还要这样来分析呢？除了不顧客观事实，使客观事实服从自己的主观感覚以外，是很难解釋的。

下面我們还要談一談"同形替代法"的問題。

陆志韋先生在《北京話單音詞詞彙》一書里曾經認为："汉語的基本資料是單音詞"，"自有文字以来，这三千多年的历史，基本上是單音詞的历史。"(頁7—8)陆先生証明自己这个主观成見用的是"同形替代法"。

同形替代法的原則是：一对格式只要能够各自分成两段，交叉替代，那就証明每一段都是單音詞。例如"表兄，內侄"可以交替成"內兄，表侄"，那就証明"表、兄、內、侄"都是單音詞。按照这个原則，在《北京話單音詞詞彙》里，"伯父，姨母；春天，秋季；今年，明年；家規，校風；腹膜，胸腔；头伏，三眠；語气，口調兒；兵紀，軍律；母鷄，公牛；悬求，婉托"等等都是由两个單音詞构成的詞組。这种分析法如果是正确的話，那就必須認定：一个單字，作为詞素只能构成一个詞，如果这个詞素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詞，那就証明它不是詞素而是單音詞了。但事实上，只能构成一个詞的詞素是極少極少的。

其次，同形替代法的出發点不是語法的，而是邏輯

的。陆先生规定"互相替代的成分不單要屬于同一个詞类，而且意义要相仿佛"。象"谷穗兒"和"谷皮子"里的"穗兒"和"皮子"就不能互相替代，因为"意义差得太远"，"这样的替代就很不合适"。(頁8)是什么"意义"相差太远，著者沒有交代。我們妄猜一下，可能是說谷穗兒是指很多谷粒組成的东西，而谷皮子却可以只是一个谷粒上的外皮，概念有大小的不同，因而意义也"相差太远"。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方法的出發点就很值得考慮。陆先生曾經說过，他的同形替代法是小时候在書房里"对对子"的發展，这就証明这种方法是从邏輯概念出發而不是从語法标准出發的，因为"对对子"本来就是概念的配对。

事实上，这个方法的根本弱点陆先生也不是沒有觉察到的。但是为了迴护"汉語的基本資料是單音詞"这个主观成見，著者不顧語言事实和方法之間的矛盾，把大量的"例外"除开。些这"例外"有:

a)有些格式著者也承認是多音詞，但是按照同形替代法就要分析成單音詞了。这样的場合，就規定它們是"駢詞"，不适用同形替代法，如"姑嫂:叔侄"。

b)有些格式按照同形替代法是不能拆开的，但是著者不願承認它們是多音詞，就規定他們是成語。例如"作揖"用同形替代法拆不开，就按成語来分析。因为其中可以插"了"和数量詞(如"作了揖"，"作三个揖")，所以"作"和"揖"都是"分析成語得来的單音詞"。至于为什么可以插"了"和数量詞的格式就是成語，著者并沒有說明。

c)有的格式用同形替代法旣不能拆开，又不能插进任何别的东西，但在著者看来"显然是由两个詞构成的"(例如"东去")，那就以"从汉語的整个系統看問題"为理由分成两个單音詞。

为什么同形替代法在这些場合就显得捉襟見肘呢？著者不肯从这里来考慮同形替代法本身是否存在問題，运用这种方法是否能正确闡述汉語事实，而是造出"例外"来迴护这种方法。在这里充分暴露了著者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往下我們还要批判另一种更为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方法，即为了証明自己的理論而生造例句，或者对例句作歪曲的解釋。比方說，高名凱先生在《汉語語法論》里談到所謂"傳遞式的規定关系":

> 規定的关系是可以傳遞的。这就是說可以甲規定乙，乙規定丙，丙規定丁…而至于无穷。(頁285)

为了証明这种理論，著者列举了好些例句:

> 他的兒子的先生的兒子　他的好看的衣裳　我的最好看的衣裳的顏色　那个最有学問的女人的最难看的臉孔　淺紅的被單

这些例子，除了"他的好看的衣裳"和"淺紅的被單"以外都是生造的，我們从来不这样說。这就証明，著者的"傳遞式的規定关系"的理論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此外，著者还說:"介詞实在只是一些半动詞或准动詞(quasi-verb)"，理由之一是:"'介詞'的用法和具有动詞的功能的詞的用法頗有相同之点"，"如'我做了这椿事'。这'了'也可以用在所謂'介詞'的后面。例如:'因为了他，我才不干'。这两个'了'字都是表示动作或历程的完成体的。"(頁313—314)但是，我們从来不說"因为了他，我才不干"之类的話。拿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例句来証明自己的理論，这显然是唯心的。

高先生有时还对例句作歪曲的解釋，証明自己的理論。比如他認为"將"字有欲求的意思，說:

> 这些"將"字固然都带有一些表示將来的意味，然而却大半和欲求的意思接近。实在很难找出有什么意义上的不同。(頁230)

但是，試看下列例句，能說"將"有欲求的意思嗎？

> 范阳人蒯通說范阳令曰:"窃聞公之將死，故弔。"
> 吳將亡矣。
> ……

高先生的理論在这里行不通了，但是他又說:

> "吳將亡矣""他要死了"，这里头的"將"和"要"很难說是"吳"或"他"的欲求。…可是，这也并不是說这里的將来的意思和欲求是毫无关系的。…我們过去一向是把天看作人格的。所以…吳亡是天要其亡，他死是天要其死。其实，"吳將亡矣"是"吳，天欲其亡矣"的意思，"他要死了"是"他，天要他死了"的意思，因为習慣了，大家就不說这个"天"。(頁230—231)

高先生这种牽强附会想入非非的解釋到了令人發笑的地步，应該說，这些做法不是研究科学的态度，而是在玩弄語言。

最后，我們来看一看高名凱先生是怎样貫徹他的汉語实詞不能分类的理論的。

按照高先生的意見，汉語的实詞不能分类。每一个实詞都能从三方面来抽象，可以把它看成事物，可以把它看成性質，也可以把它看成动作。在有形态变化的語言里，一个实詞看成事物、性質、动作有各种不同的形态。因此，一个詞不論是在句子中还是独立存在，都可以根据它們的不同形态把它們归入不同的詞类:名詞、动詞、形容詞。但是汉語的詞缺乏形态变化，当詞孤立存在的时候就无法給它分类。当詞进入句子以后，它只能表示事物、性質、动作三种里面的一种，究竟是哪一种，就要根据詞在句子里地位来确定。

詞在句子里的地位不外主語、謂語、宾語、附加語、間接宾語，等等。高先生还制訂了一套关系:規定关系、引导关系、对注关系、并列关系、联絡关系。高先生給实詞規定了三种功能:名詞功能、形容詞功能、动詞功能。但是詞的功能究竟根据上述两个系統里的哪一

个来决定的，还是两个系統都可以根据，高先生并沒有說清楚这一点。

規定关系显然不能作为确定詞的功能的根据。因为規定者包括动句和形容句的主語，以及表示占有关系的詞，似乎是具有名詞功能的詞；同时又包括具有形容詞功能的詞；包括約束具有动詞功能的詞如"已經"之类，似乎是副詞。至于受定者就更复杂了，包括具有动詞功能的詞，也包括所謂被数目字約束者、被具有形容詞功能的詞約束者、被表示占有关系的詞約束者，等等。

引导关系也同样不能用来确定詞的功能。因为引导者包括代詞、具有名詞功能的詞；受导者既包括具有动詞功能的詞(实詞)，又包括虛詞。

对注关系也不能用来确定詞的功能，因为在对注关系里既有代詞，又有名詞。

并列关系和联絡关系也不能确定詞的功能。因为前者可以是两个不同的詞同时表达一种功能，后者則是两个命題的联絡，当然更不能从中看出詞的功能。

我們再来看主語、謂語等等能不能用来确定詞的功能。

高先生說："在句子里能够用作主語和宾語的詞，它就具有名詞的功能。"但是代詞也可以作主語和宾語，我們是不是可以說它"具有名詞功能"呢？至于謂語，显然也不能作为确定詞的功能的根据，因为名詞、动詞、形容詞都可以做謂語。到底怎么分呢？著者說：

> 凡在句子中由于句法的支配而在語法上指明事物的，就是具有名詞功能的詞。凡在句子中由于句法的支配而在語法上指明动作的，就是具有动詞功能的詞。凡在句子中由于句法的支配而在語法上指明性質的，就是具有形容詞功能的詞。(頁 85)

> …我們說話总逃不出三个范圍：不是要說明某个事物是什么东西，就是要描写某个事物是什么样子，或叙述發生了什么事情。每一个句子都有一个意义核心。这意义的核心就是指明这"什么东西"，"什么样子"或"發生了什么事情"的。(頁372)

从上面所引的話看来，詞具有名詞功能、还是形容詞功能、还是动詞功能，是由名句、形容句、动句来决定的，而名句、形容句、动句的区分又是由意义来决定的；高先生貫徹他的汉語实詞不能分类的理論的方法就是这样。

• • •

以上我們对語法研究中种种主观唯心主义方法作了一般的叙述和批判。这些方法的表現虽然不同，但在根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客观决定主观，而是以主观决定客观。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在这里表現得很明显。为了把我們的語法研究推进一步，就必須徹底批判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代之以严格的实事求是的辯証唯物主义方法。

(上接 21 頁)

这样一来，王力先生就"便利"地把五言变成七言归納为七种方式。(234 頁——235 頁)但是当王力先生碰到不合他的"規律"时，他又想出一个"便利"的办法，說"平行的名詞、动詞、形容詞、叠字、連綿字等，都可認为只有一个單詞的用途，主語带动詞，动詞带目的語、动詞語，也都可認为一个动詞的用途，名詞語可認为一个名詞的用途，这样合二字为一字，仍可認为五言的扩充"。(236 頁)王力先生这样做的动机，他自己說得很明白，那就是"在說明上可以有不少的便利"。(234 頁)我覺得从事任何研究，应当从实际出發，从而作出科学的分析，揭示其客观的規律性以指导实踐；不应当从主观願望出發，为了"便利"而对事物作形式主义的划分。

王力先生这种"便利"論，还表現在关于近体詩語法的省略法上。他談到关于詩句省略"於"字的时候說："这里所謂省略只是一种方便的說法。"(257—258 頁)其实王力先生的所謂省略只是把詩句譯成散文后互相比較得出来的。例如"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王力先生認为这是"日出於寒山之外、江流於宿霧之中"的省略。(257 頁)按照这种标准，我們还可以說省略了"之"字呢！这样看来，詩句就是散文的省略了。由此可見，这种"便利"的"省略法"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

此外，王力先生在談到关于近体詩語法的"倒裝"时，竭力推崇詩句倒裝的"玄妙"，宣揚一种玄之又玄的神秘观点。他說，"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栖老鳳凰枝"是"鸚鵡啄余香稻粒，鳳凰栖老碧梧枝"的倒裝。当然这句話并沒有什么可以非議的。可是他又进一步說，不倒裝"也同样沒有妨碍；但是，一經倒裝，就覺得特别新穎，不落平凡。'鸚鵡粒'和'鳳凰枝'，妙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所啄余者已經不是普通的香稻，而是鸚鵡之粒，所栖老者已經不是普通的碧梧，而是鳳凰之枝。…这些地方都是妙手偶得之，不是可以着意摹仿得到的"。(256 —257 頁)王力先生在《中国語言学的現况及其存在的問題》中特别强調要繼承"祖先的优良傳統"。是不是要我們繼承祖先的这种"妙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的傳統呢？照王力先生这样大力推崇，显然是的。我以为古人的这种游戏的吟咏沒有什么値得特地推崇的。这种費力的推崇沒有什么别的解釋，那就是叫我們从古人的詩里專門找一些怪僻的詩句做些无意义的推敲。

以上的一些意見作为一張大字报供王力先生參考。有不对的地方也請同志們指正。

黎錦熙先生語法研究中的几个問題[*]

史錫堯　李大魁　李桐华　蔡同安

一　句本位語法体系抹煞了汉語客观存在的詞类区分

黎錦熙先生在他的《关于語法体系的批評与自我批評》一文中，一方面說他的語法体系与“师范学院現代汉語教学大綱”中語法部分“不同的意見只剩下”“关于‘助詞’和‘补語’”两点了，因而“所謂黎錦熙的語法体系”已經“不存在”了。“‘句本位’并不是一种語法本身上的体系…。‘句本位’是指‘研習’文法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新的語法教学法”。黎先生还說“六大成分七实位；四級形态九詞类——就算是我的体系吧！”“其实，仅仅是四个数目字与人不同，我是沒有特殊体系的”。另一方面，黎先生却又說“六大成分七实位；四級形态九詞类”的語法体系和他的圖解法确是与众不同的。說圖解法是“一种研究和教学上的武器”，是“具有民族創造性的”；“四級形态之說是糾正两極端的，符合六万万人的汉語現实和客观規律的”；尽管人們在“理論”上叫嚷反对“句本位”，“实际上”都不得不“在句本位中过日子”。①

其实，語法体系并不象某些人所說的那样神秘和不可捉摸，即使是年輕人也是可以把握得到的。所謂語法体系就是某种对語言規律（詞形变化、用詞造句方面）的系統的看法和認識罢了。語言本身客观存在的規律毫无疑問只有一种体系。但是人們对語言現象用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便会得出不同的結論，对某一种語言便有不同的認識、不同的解釋和描述。这一些对語言的認識經过分析、研究、归納、概括，系統起來就构成了各自不同的体系。这些不同的体系有的正确地反映了語言的客观規律，有的就可能是对語言的客观規律的不正确分析和描述，甚至于是对某一种語言的歪曲和誣蔑。所以我們必須对歪曲和誣蔑祖国語言的观点进行揭露和批判。

黎先生自己的語法体系到底有沒有呢？这点不应該当作一个問題被提出来。

黎先生的《新著国語文法》“引論”的大字标題就是“‘句本位’的文法和圖解法”。很清楚，黎先生的語法体系就是“句本位”，圖解法也是其体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具体來談，黎先生在語法方面是主張“造句法是汉語的‘核心’”的，② 黎先生認为句法由六大成分构成，在六大成分的基础上，他比附着英文制造了所謂名詞和代名詞的“七位”。黎先生主張“拿‘句法’来控制詞类”，③ 也就是以詞在句法成分的位置来辨別詞类，区分詞类。为了創立以句法成分来划分詞类的理論，而有所謂“四級形态”之說。这一切关于汉語的看法是成套的，成系統的，有核心理論的，与別人不同的，这就是黎先生的語法体系。事实証明这絕不仅是一种教学方法，而是不折不扣的語法体系——句本位的語法体系。

黎先生最初是主張“离句无品，依句辨品”的。这一口号很明显地說汉語的詞不在句中时是不可以划分詞类的。这当然是錯誤的。后来黎先生作了修改，說“詞已定类”，“由职显类”，等等，并提出了“四級形态”之說。結果只是名詞术語的变换，实質上并未改变，仍是“詞无定类”。

黎先生虽然不只一次地向大家宣布“汉語区分詞类，应以第三級广义形态为依据”，但是黎先生在具体区分詞类时却一直以第四級形态，也就是所謂“最广义的形态”的“句本位”为主要依据。这是因为实际上黎先生并沒有放弃或改变他的句本位的主張。“句本位”变为“第四級形态”，不过是改了一下名称。黎先生說他是主張以第三級广义形态（即詞与詞的結合功能）来划分詞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們可以考察一下黎先生的近著。1957年出版的《汉語語法教材》中，在介紹“全書的基本理論”④时講到“造句法和詞类”，黎先生用了具体的例子向广大讀者說明了他是怎样区分詞类的。上面写道：“例如‘劳动’明明是个动詞，但它最爱充当实体詞，如‘劳动創造

---

[*] 这篇文章內容仅限于黎先生語法方面的論著，其他方面未涉及。本文內凡提到“我們的一篇文章”的，都指的是發表在《中国語文》1958年10月号上的《黎錦熙先生語法体系批判》一文。

① 以上引文均見《中国語文》1958年12月号上的《关于語法体系的批評与自我批評》一文。

②③ 《汉語語法教材》第一編，商务版，1957年，[illegible]頁。

④ 《汉語語法教材》第一編，“緒言”2頁“說明”：“本課的注①至④不仅是注明这几个語法术語，全書的語法基本理論，大致包括在內。”

世界'，它就做了'主語'；'我爱劳动'，它就做了'宾語'；'工作就是劳动'，它就做了"足語"；'劳动的紀律建立起来了'，它就做了'領位'（这是說屬于劳动事宜的紀律，不要把'劳动的'解为'劳动性'的意思，那就形容詞化了）；'我因劳动得到健康'，它就做了'副位'。因此，'劳动'在这些成分里都显示是名詞了（因为它是表示一樁事体，不是叙述誰在劳动了；这就是抽象名詞之一种，也就是名物化用法）。"①"劳动"在这些具体的句子中，黎先生所以把它認为是名詞，就是因为它是擺在主語、宾語、足語、定語等句子成分的位置上。显然，这决不是以詞的功能（即所謂第三級广义形态）来作区分詞类的主要依据的。我們还可以看一看黎先生是如何具体講授的。《汉語語法教材》第34、35頁中談到了动詞做主語。書上写道："主語也可以用动詞。动詞是叙述动作，用作謂語的；但若用作主語，就是把这种动作看作一樁事情，就是'事的名称'。"在"說明"中又說"'事的名称'就是抽象名詞"。其中举出的例句是："哭又有什么用呢？""旅行給了我們很多益处。""吹，就是光說不做。""吃也非常不方便。"等等。在談到用形容詞做主語时写道："主語也可以用形容詞。形容詞是說明情形的；用作主語，也就是把这种情形（形状、性質和情态等）看作一个'名称'。"在"說明"中又說"这就是形容詞'轉成'的抽象名詞"。其中有如下的例子："美丽是和淸潔分不开的。""貧困使他不能…工作。""孤独和焦躁襲击了他。"其他又如139頁把做宾語的动詞"开支、呼吸、射击、吃、做"都算作了"抽象名詞"，141頁把"艰苦、紅、靑、紫、好、方便、愚蠢"等做宾語的形容詞算做了"抽象名詞"。这一切有力地証明了从1924年《新著国語文法》直到1957年出版的《汉語語法教材》，三十多年来黎先生的語法体系虽有某些修补，或有某些名詞术語的改变，但句本位的体系一直沒变。因而事实上抹煞了汉語客观存在的詞类区分。（我們的前一篇文章在这方面也曾举出了1955年出版的《中国語法教材》上的不少例子，但是黎先生并未針对那些具体例子进行分析、論辯。）

在理論方面，《新著国語文法》的"今序"第8頁上黎先生也曾明确說过："《新著国語文法》的优点就在把'句本位'做中心，把組成句子的六大成分作为出發的重点。"

黎先生在《关于語法体系的批評与自我批評》一文无意間也流露了自己对汉語詞类問題的根本看法。黎先生因編汉語詞典时不标詞类而說："咱們汉語是詞不标类，看例知类的'句本位'。"（着重号是本文作者所加）这淸楚地說明，直到今天黎先生对詞类划分这个重要問題在理論上也仍然是堅持三十多年前的老看法，仍然堅决認为汉語的詞在进入句子前（即孤立存在时）是不能标类的，必須当詞进入句中时，詞有了句中成分的位置的时候才可以"看例知类"。一句話，仍然是"句本位"的說法。这一理論与我們上面举出的实例恰好做了相互印証。

在談黎先生的詞类区分时，有一点还必須指出：黎先生曾說过"以詞彙意义为基础"来划分詞类的話。②这样一来，就表現出黎先生在区分詞类时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的。在詞孤立存在时黎先生对实詞的区分是依据詞的詞彙意义的，例如《汉語語法教材》16、17頁中說"名詞就是人或事物的名称"，"动詞是一种动作的叙述"，"形容詞就是一种情形的說明"，等等。第12、13頁还有一个詞类表，举出了不少詞做例。矛盾就表現在这里。黎先生在区分汉語詞类时用了两个标准：一是詞孤立存在时的詞彙意义的标准，一是詞进入句中以后依句法成分位置来划分的标准。因为动詞、形容詞等可以跑到所謂实体詞的地位上去，于是就表現出了这两个标准的矛盾和对立。通过上面的具体分析和例証，我們看出了黎先生是以句法成分来划分詞类的标准否定了詞彙意义划分詞类的标准。黎先生的划分詞类"以詞彙意义为基础"的一句話，在事实上不得不成为一句空話。在黎先生的語法体系中"句本位"是不可动搖的核心。

二　圖解法是繁瑣的不切实用的

圖解法是黎先生的句本位語法的重要組成部分。黎先生对于他的圖解法是推崇备至的。首先黎先生說他的圖解法是"具有民族創造性的"。并且不承認是"繁瑣"的，他說："'繁瑣'就可以从两头看問題，一头是繁瑣而无用（无目标、不实际、学院專家的特点），另一头就是繁瑣的同类詞又是对立面，叫'精細'，現代尖端科学精深細致，自不会看作繁瑣而反对它，只有努力鑽研全面掌握。"黎先生还說他的圖解法是"一种研究和教学上的武器"，是一种研究工具。我們認为这些意見是不正确的。

关于圖解法是不是比附英語或是具有民族創造性，这都是次要的問題，若外国的东西眞好，我們也是可以学習和借用的，只要不是用外国的語法規律比附、套用来"范圍"汉語就行。我們的前一篇文章也沒有因圖解法是比附外語因而就說黎先生有民族虛无主义的思想。我們批評黎先生有民族虛无主义的思想傾向是因为黎先生在过分夸大圖解法的作用的同时貶低了汉語（关于这一問題，本文的第三部分將專門討論）。

---

① 《汉語語法教材》第一編"緒言"5頁

② 《汉語語法的科学体系和学科体系》，北京師范大学学报，1957年2期，111頁。

圖解法在教学上的作用是有限的。那就是在学生了解圖解法画法的基础上，教师在分析不太复杂的句子时，在黑板上画圖可起到一定的直观作用。这种作用是極其有限的，句子太簡單，一說就明白不需要用圖解，圖解反而多此一举。句子結构太复杂时，也不宜用圖解，因为用圖解，也是橫七竪八的一堆綫条，呈現一团混乱，并不能給学生以清晰的印象。

圖解句子时必須以先理解句子結构为前提，即便准确地了解了句子結构，圖解出来了，也不一定符合黎先生的标准。所以，必須以理解句子为因，以圖解句子为果。但由于看法不同，“因”就不同，“果”也就不同。若这样的意見是正确的話，說圖解法是一种研究語法的工具便是不正确的了。研究語法規律只能是从書面語、口語中搜集大量的語言材料，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綜合、归納、概括，然后得出規律来；而絕不可能只在那里画圖解便会得出語法規律来，这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圖解法頂多只能在教学上起有限的直观作用，而在語言規律的研究上是不起作用的。任何对圖解法过高的評价都是不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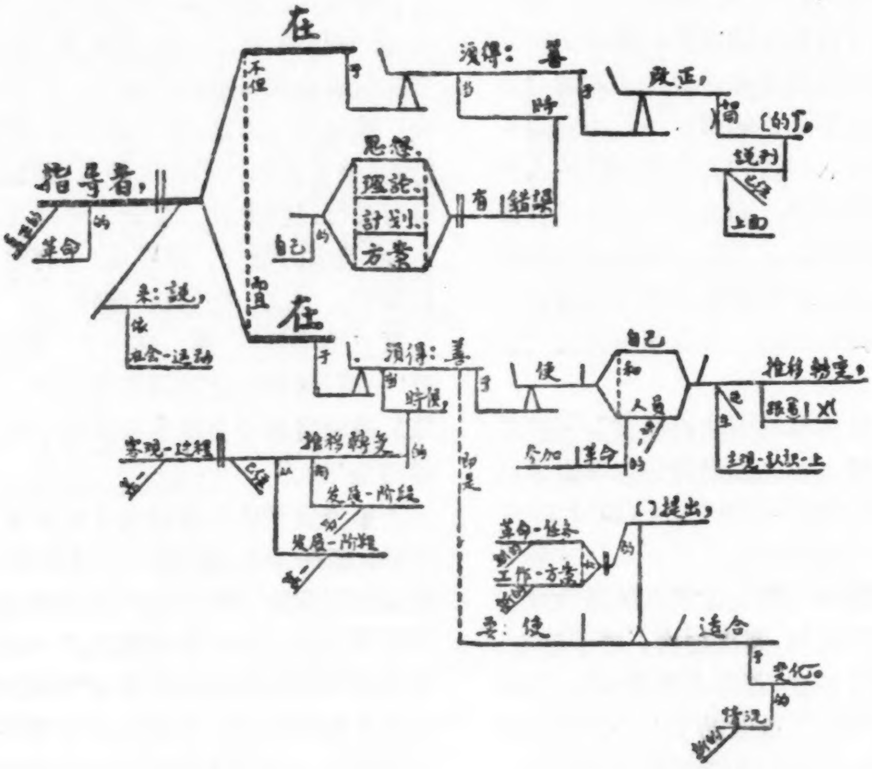
圖解法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只是对句子作了靜止的分析和解剖，把句子作了零碎的肢解，使学習者不能很好地理解句子的結构和脉絡，不能很好地理解全句的思想內容和精神。也正因为圖解法只是对句子作靜止的分析和解剖，学会了圖解法頂多只能靜止地剖析句子，对学習者运用語言帮助不大，不能帮助学習者用詞造句，也不能帮助学習者糾正自己說話、写作中的語法方面的毛病和錯誤。在課堂上用过多的时間去圖解句子，教学效果不会好，因为它脫离实际，不能指导运用語言的实踐。

圖解法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便是繁瑣。学習圖解画法的本身就是学習者的沉重負担。圖解法所以是繁瑣的，不切实用的，我們可以看一下底下的例子(見《实踐論語法圖解》106頁)。

这个圖解的原文是：

依社会运动来說，眞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論、計划、方案有錯誤时須得勇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經說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經从某一發展阶段向另一發展阶段推移轉变的时候，須得勇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观認識上也跟着推移轉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

这一句話虽然長，表达的意思是極清楚明确的，沒有疑莫能明的感覚，看了黎先生的圖解反而使我們有了“疑莫能明”的感覚。



三　汉語研究中的民族虛無主义思想傾向

談到了圖解法就势必联系到黎先生对汉語的看法。在1954年以前的《新著国語文法》中，黎先生有这样一段話：“国語的用詞組句，偏重心理，略于形式；詞句的形式既不象西文那么完备，若非多用圖解法，那心理的表象定多‘疑莫能明’。”在我們的前一篇文章中就批判了这种观点，指出这样的看待汉語是民族虛无主

义思想的影响。今天我們仍然这样看。

語法是研究語言形式的。而汉語的句子形式丰富多采也是举世公認的。馬列主义者在評价一件事物时也多从效果上着眼。从汉語作为我們"六万万人"的交际工具来看，它能很准确地表达我們的思想，交流我們的情感，發揮了它作为交际工具的最大的作用。我們的民族，就是用这种語言来进行交际而使我們的社会發展下来的，目前它也还为我們服务得很好。汉語能表达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如毛主席的經典著作就是用汉語写的，能表达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我們国家的一些尖端科学技术的論文也是用汉語写的。汉語也能准确地翻譯馬列主义的著作，也能翻譯其他国家的尖端科学技术論文。事实上有哪一点可以說汉語差呢？为什么說汉語"詞句的形式不及西文那么完备"呢？誠然，汉語在詞形变化方面是比較少的，但这只能說是汉語的一个特点，我們拿不出任何理由来說这是一个缺点。黎先生却說"汉語詞句形式不及西文那么完备"，因而汉語"用詞組句，偏于心理，略于形式"。那就是說汉語的用詞組句不能憑借不完备的形式而只有借重"心理"，因此人們看汉語的句子时也不能靠句子形式来了解語义，只得憑借心理来猜測、捉摸。也就因为汉語有这样一个特点，"若非多用圖解法，那心理的表象定多疑莫能明"。圖解法的作用也太大了，沒有圖解法"定多疑莫能明"，用了圖解法才可以使"疑"解而"明"。若这是真实的話，在黎先生具有民族独創性的圖解法創立之前，咱們汉族人民彼此說話常常是彼此不太懂对方的意思的。而現在虽有了黎先生的圖解法，不会圖解法的人还是常常听不懂別人的話的。会圖解法的人在說話写文章时不常常画些圖解，別人也是不容易听懂你的話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六亿人民的日常实践和我們的祖先的历史証明了这样說是不符合事实的。黎先生这样講是不顧汉語实际的，其思想根源是民族虚无主义。

黎先生說我們前一篇文章的引文与原文"不符"是不对的。我們并沒有引錯，黎先生沒有任何理由否認1954年以前的二十一版《新著国語文法》(以及1924年以来的所有版本)是黎先生著的。

在1955年以后的版本中，黎先生把这段話改成了下面的样子："国語的用詞組句，偏重結构，略于形态；詞兒底形式不象西文那么多变，若非多用圖解法，那思想的表达定多'疑莫能明'。"虽改动了几个重要的詞兒，但是，我們認为經改动后的1955年版本上的这一段話，仍然反映出了黎先生对汉語的民族虚无主义的观点，甚至于比1954年以前的版本反映得更加明显。

当然孤立地說"国語（应改为"汉語"——本文作者）底用詞組句，偏重結构，略于形态"，是沒有什么錯誤的；孤立地看"汉語的詞兒的形式，不象西文那么多变"，也沒有什么錯誤；但是說汉語"若非多用圖解法，那思想的表达定多'疑莫能明'"，就仍然是1954年以前的观点了。这里清清楚楚地說，不多用圖解法，思想的表达定多疑莫能明，也就是說沒有圖解的帮助，汉語的句子不能很好地表达思想，不能很好地起交际工具的作用。改了以后的比以前的更加明确。以前"心理的表象"，这次就直截了当地說"思想的表达"。为什么汉語不多用圖解法，思想的表达就定多疑莫能明呢？因为"汉語底用詞組句，偏重結构，略于形态"，因为汉語"詞兒底形式不象西文那么多变"，这就是黎先生找出的理由，也就是汉語的弱点。这不更清楚地說明富于形态变化的語言才是高級的語言，那种語言可以很清楚地表达思想；而偏重結构形态变化不丰富的汉語是落后的語言，思想表达定多疑莫能明。这也就是說中国的不如西洋的好。这种貶低汉語的說法难道不是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么？

通过1955年以后版本中黎先生对这段話的修改来看，黎先生对汉語的民族虚无主义观点至今未变，并且对这一問題直到今天也缺乏認識。

四　关于研究方法上的問題

关于黎先生的治学方法，我們前一篇文章也提出了一些意見。我們認为黎先生的"有时拿着一篇国語文，分別归納，成立一些假設"和"有时权把西文法作借来的假設去找自家的例証"，是大胆假設、小心求証的資产阶級治学方法。对于这一点，黎先生在他的《答复我們的〈关于語法体系的批評与自我批評〉》一文中对自己沒有进行自我批評。黎先生解釋說："这是文字上的誤解，应該指出帮助。"原序是："有时拿着一篇国語文分別归納，成立一些假設，有时……。'有时'就不只一次，文章当然不只'一篇'，在一个'有时'之下一般也只宜把'一篇'这种数量冠詞作个定語，不便就說成'多篇'，讀者自然不会誤解为只限于这'一篇'，要拿来'以偏概全'的。"

黎先生不从汉語的大量材料本身进行研究、分析、归納、概括，却去拿西文法做借来的假設，这一方面說明是大胆假設，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在思想上是与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想有些糾葛的。"小心求証"还在"求証"，黎先生却把西洋文法的規律"作借来的假設"，以后，才去找自家的例証，是結論在前而例証在后。这是一种不科学的方法。"拿着一篇国語文分別归納成立一些假設"则是典型的大胆假設、小心求証的做法了。用以上两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一定是不正确的，是不能正确地反映汉語的客观規律的。句本位語法体系本身便証明了这一点。

关于以偏概全的問題，黎先生的解釋越加証实了他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大胆假設小心求証的了。因为黎先生明确地告訴大家："'有时'就不只一次"。"不只一次"当然就更应該引起黎先生的注意，更应該进行自我批評了。

五 关于版本和所謂"錯字"

《中国語文》1958年10月号上所刊载的《黎錦熙先生致本刊編輯部的信》中对我們前一篇文章引用了几点1954年的《新著国語文法》上的字句很不滿意。黎先生說："我曾声明据以批判的要以1955年的二十二版为准，因为1955年版本才是解放后的正式修訂本，內容体系和重要的詞句有些大不相同。"我們虽然从来沒有見过黎先生有任何这样的声明，但当我們見此信后，还是立即把最近的1957年1月上海第二次印刷的第二十三版找了来。我們發現这是第二十四版。因为上面有"二十四版附白"六个字。"附白"的全文如下："二十四版除繼續挖改几个錯字外，在34、36、174、175、238各頁中，都有語法体系上的修訂，請已購本書的讀者，参照作重点的較正。"見此"附白"后，我們便按所指頁碼逐一閱讀，并仔細与1954年的二十一版进行对照。确实有修訂：34頁对次宾位圖解法作了点修正，并加了点說明，36頁加上了对介詞"把"圖解法的說明，37頁"讀完"的"完"字作了新的分析，174、175頁对"性态副詞"之說略作变动，238頁把"引起副詞"一語改作"引起副詞化的形容詞"。所謂修訂，不过如此而已。我們認为沒有什么"語法体系上的修訂"，也看不出与二十一版有什么"大不相同"。

黎先生所謂"二十四版"附白中还提到了"繼續挖改了几个錯字"。这"几个錯字"在什么地方，黎先生沒有标出。我們也查对了1954年以前的版本，發現在"引論"中有这么一段："不过国語的用詞組句，偏重結构，略于形态；詞句的形式也不象西文那么完备，若非多用圖解法，那思想的表达定多疑莫能明"。其中"偏重結构"錯为"偏重心理"，"略于形态"錯为"略于形式"，"不象西文那么完备"錯为"不象西文那么多变"，"思想的表达"錯为"心理的表象"。黎先生指的假如是这几个字，那么应該指出不仅二十一版錯了，以前所有的版本全是这样写的，这不是"錯字"，而是黎先生做了修改。

經我們对照的結果証明，黎先生不仅"挖改了几个錯字"，还有一段話被刪去了。那段話是在1954年以前的版本的原序第1頁，是介紹黎先生的治学方法的。原文是这样的："有时拿着一篇国語文，分別归納，成立一些假設(hypothesis)；有时权把西文法当作'借来的假設'，去找自家的例証；有时忽然發現'例外'便将假設或修改，或增补，或推翻。"黎先生刪去此段却沒有說明自己今天对这种治学方法的看法。我們以为黎先生应該把自己的思想观点摆出来（包括过去的和現在的），采取严肃誠恳的态度进行必要的批判，对不同的意見应当实事求是地按照百家爭鳴的方針，通过討論爭辯来解决。这才符合文化革命的要求，对黎先生本人也是大有好处的。

* * *

黎錦熙先生是我国最早的研究現代汉語的專家之一，三十多年来一直辛勤地从事汉語的研究工作，在这一方面做出了不少的成績，对我国的語言科学有一定的貢献，在讀者中間也有相当的影响；同时在黎先生的語法研究中也反映出了一些資产阶級学术思想观点，如治学方法、对汉語的看法等方面都有所表現，其影响是不好的。正因为如此，我們願意和黎先生一塊兒来清除这些不好的影响。我們的这些意見是很不成熟的，我們很願意和黎先生共同来討論。

（上接19頁）

际的語言运用中，复合詞只是一个代表完整概念的單詞，不必要也不允許加以胡拆乱分。

說汉語是單音节語，也曾是高本汉和張世祿先生反对文字改革的理由之一。他們認为由于汉語是單音节語，如使用方塊汉字，还可以依靠形体和声調的补偿作用来区別同音詞；如使用拼音文字，同音詞就大量增加，引起語言的混乱。他們从汉語是單音节語这个观点出發，不但贊美方塊汉字，而且还歌頌文言文，認为"文言是雅潔的文体，白話是鄙陋的"。（高本汉《中国語与中国文》）这些見解是極其荒謬的，这些荒謬的見解直接阻碍了当时进步的白話文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的进展。

从上面可以看出，張世祿先生的汉語观基本上就是高本汉的汉語观。張先生在他所翻譯的《中国語与中国文》的导言中說："高本汉先生当然是我們最可敬的良导师，我們应当竭力来介紹他的著作。"事实也确是如此，張先生几十年来都是很努力地介紹高本汉的資产阶級的語言学观点，解放前如此，解放后自觉或不自觉地仍然繼續着。

从以上两方面看来，張世祿先生的資产阶級語言学思想是很严重的。張先生的著作論文許多人在讀，張先生的課許多学生在听，可以想見，張先生所散播的資产阶級学术观点，有多么深广的坏影响！

現在对資产阶級学术思想的批判，是知識分子一場深刻的自我革命。我們衷心地希望張世祿先生能在这場自我革命的斗爭中，取得徹底的胜利！

批判張世祿先生在語言学工作中的資产阶級学术思想

严　修　胡裕树　張君炎

張世祿先生在語言学工作中的資产阶級思想，突出地表現为心理主义的語言观和語言优劣論的汉語观。現在分开来談。

一　心理主义的語言观

在解放前，張世祿先生接受了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和方德里耶斯（J. Vendryes）等西方資产阶級語言学家的唯心主义語言学說，用心理学观点来解釋語言。

关于語言的本質，張世祿先生認为："人类之所以需要語言，因为有了思想，不能不把它表現出来，这是依据人类的表現性的。"①他又認为思想感情的表現，是"根据于心理上的作用"，而这种心理作用就是"語言构成的基本原因"，这就暴露出了張先生对語言本質的錯誤理解。首先，他把語言看成是滿足个人"表現性"的手段，否定語言的社会交际功能，抹杀了語言对社会的依賴性。其次，把語言和思惟割裂开来，以为先有思想，然后才有表达思想的語言，以为不依賴語言的赤裸裸的思想可以产生而且可以存在。大家知道，观念是不能脫离語言而存在的，沒有語言材料，沒有語言外衣，以赤裸裸形态产生和存在的思想是沒有的。无論人們头脑中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无論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必須在語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必須在語言的术語和詞句的基础上进行。思想不能超語言而事先存在。語言是思想产生的基础，也是思想存在的形式。

关于語言的起源和發展，張世祿先生認为："語言的起源总不外于人类的精神作用"，"語言只是人类的'表現运动'所演化而成"，"思想和感情的增进，就是語言內容的扩充；語言的發展，处处是依照心理上發展的程序的"（34頁）。我們知道，語言的产生絕不是"精神作用"的結果，也絕不是心理的表現运动的結果，而是太古时代的原始人类在集体劳动过程中，为了适应互相交际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語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發展而發展的。研究語言發展規律的时候，如果不去密切联系社会發展的历史，不去密切联系創造这种語言、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历史，而是大談其"心理發展的程序""語言之心理的基础""語言与民族心理""語言發生之心理的动机"，这就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了。

由于对語言的本質、起源和發展作了心理主义唯心論的理解，因此，对語言学各部門的看法也不能不是心理主义唯心論的。張世祿先生認为，"語言上所包含的意义就是心理上所發生的現象"，"文法范疇依据于民族心理的習慣"，"种种語詞的發生，語句的成立，文法的結构，以及詞句的組織，都包含着心理上的作用"。总而言之，在張先生看来，所謂語言学，不过是"心理作用学"而已。

問題的严重性不在于張世祿先生解放前是一个資产阶級唯心主义者，而在于解放后張先生在講堂上、在著作中仍然在宣揚資产阶級語言学的一套貨色。

例如，在"普通語言学"的教学中，在批判資产阶級各种語言学派的时候，不是在否定的前提下批判地接受它們点滴可取之处，而是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場，用"优""缺"点的"二分法"来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批判。特别是对保罗（H. Paul）的个人心理主义，索緒耳（F. de Saussure）的心理社会学主义，浮士勒（K. Vossler）的唯美主义錯誤地作了过多的不应有的肯定。

保罗从个人心理主义和心理主义观点出發，把語言的發展看成是一系列的心理活动的过程，广泛运用类推作用去解釋各种語言發展的現象，强調語言定律无例外性，認为語言規律是絕对的，不容許有任何例外。保罗还把語言的本質归結为語言观念的有机体；实际的語言只存在于个人当中。很明显，保罗的这些观点是十分錯誤的。但是張先生却把这些看成是"重視語言發展的历史，强調語言發展的規律性"的了不起的优点。原来張世祿先生至今仍然是把"語言發展的历史"看成是"一系列的心理活动过程"！原来張先生把形而上学的絕对主义、形式主义看成是"語言發展的規律性"！

索緒耳別出心裁地把个人的"言語"与社会的"語言"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把"言語"看成是与社会毫无

---

① 張世祿：《語言学原理》，商务版，1933年，10頁。以下引文不注出处的，均見同書。

关系的，純粹是个人心理、生理活动的一种現象；把"語言"看成是言語行为的社会部分，是个人以外的东西，是以每一个人脑中所儲存的印象的总和的形式在集体中存在着。而張世祿先生却贊揚索緒耳的心理社会学主义是"重視語言的社会作用"。实际上索緒耳所侈談的"个人以外"的"語言"是抽象的、虛无飄渺的东西，是一种社会心理的現象——"印象的总和"。被張世祿先生所欣賞的"社会作用"也不过是"社会心理作用"而已。

張世祿先生認为浮士勒唯美主义的一大优点是："强調風格論在語言学上的地位"。我們認为風格論确是应該研究，風格論确是应該在語言学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我們必須把作为語言学的一門分科的、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風格論与浮士勒的唯美主义的風格論严格区分开来。索緒耳把語言分成个人的"言語"和社会的"語言"，可是到了浮士勒，他却把一切語言現象都归結到"言語"里去，認为"語言"差不多只是一种临时的"言語行为"。他認为一切語言都只是个人的"精神表現"和个人的"精神創造"。他把語言發展过程看作是个人創造的行为，認为只有依靠風格論才能够揭示个人的創造对于語言發展的影响，只有在風格論的基础上才能够把美学与語言学統一起来。所以他認为風格論就是語言学里一个最高級的、最基本的部門。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浮士勒的風格論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他否認語言对社会的依賴性，否認語言是社会現象，否認語言是社会交际工具，而把語言看成是純粹的个人"精神表現"，把語言風格看成是可以超社会的、可以脫离全民語言基础的个人"精神創造"。張世祿先生在講授中，并未对浮士勒的唯美的、个人的、心理的"風格論"进行批判，反而認为是"优点"，把唯心主义的風格論与科学的風格論混为一談。

近年来，張世祿先生在"現代汉語詞彙学"的教学中表現出来的唯心主义——特别是心理主义，也是非常突出的。張先生过去認为"种种語詞的發生…都包含着心理上的作用"，"語言上所包含的意义就是心理上所發生的現象"。到今天，張先生仍然沒有抛弃这些唯心主义的觀点，在詞彙学的教学中，大談什么"刺激作用""联想作用""适应作用""补償作用"…到处运用心理学觀点来解釋詞彙学。

張世祿先生在1954年的詞彙学講义中說："在战爭中的报导，对敌軍的移动或撤退說是'奔竄''逃跑'等，是屬于增强刺激作用，用强烈的說法来更換詞語；对自己軍队的移动或撤退，則說成是'轉进''轉移陣地'等，是屬于緩和刺激作用，用委婉的說法来改造詞語。"在張先先看来，"轉进"与"逃跑"是同义詞，仅仅刺激作用不同，仅仅是为了褒貶而造出来。張先生把意义有严格区分的、反映不同客观事实的两种詞看成是同义詞，沒有立場，不分敌我地看待詞义的美恶，对詞义作心理主义唯心論的解釋，否認詞义的客观真实性，把詞义的解釋引导到近似"語义学派"的地步。

張世祿先生曾为自己辯护說："我所談的增强刺激作用与緩和刺激作用，其理論根据是巴甫洛夫的'詞是条件刺激物'这句話。"其实張世祿先生在这里挂的是巴甫洛夫的"羊头"，卖的是布龙菲尔德的"狗肉"。張世祿先生曾經接受了布龙菲尔德机械主义語言学派的行为主义的心理学觀点。布龙菲尔德否認意識的实在性，他把人类的心理完全归結为有机体对其所受刺激的心理反应，他認为人类的語言就是由一系列生物学过程的刺激和反应构成的。这就是張世祿先生的"刺激作用說"的眞正的来源。巴甫洛夫在生理学領域中研究高級神經活动，从两种信号系統的角度，把詞看成是条件刺激物，这完全是科学的、唯物的。張世祿先生在語言学領域中，用心理学的刺激作用来代替詞的客观內容，超阶級地空談詞义的褒貶，把語言事实解釋成心理現象，把語言的社会作用归結为心理作用，这和巴甫洛夫的学說是絲毫沒有共同之点的。

張世祿先生对詞彙的發展变化也存在着錯誤的看法，把一些詞彙的变化，簡單地看成是"事物名称的变更"。例如他說：过去叫"薪俸"現在叫"工資"，过去叫"僕人"現在叫"工友"。請問，我們是否能說：过去叫"皇帝"，現在叫"主席"；过去叫"衙門"，現在叫"政府机关"；过去叫"官老爷"，現在叫"干部"；…很明显，这样解釋詞彙变化是極其錯誤的。我們認为，"薪俸""僕人"是剝削制度社会里的产物，与現在的"工資""工友"是本質不同的两个概念，意义不同的两个詞。而張先生却把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两种不同的客观事物，看成是同一个概念，看成是同一个意义的不同名称。張先生还把一些詞义的变化看成是人們心理的变化，認为"劳动""工人"等詞，解放前与"下賤""骯髒"等意义联系在一起，解放后与"光荣""先进"等意义联系在一起，这是由于人們"道德精神的变更"，是由于"反映了新社会里的思想感情"，因而使这些詞"有了新的感情色彩"。張先生这个看法也是錯誤的。首先，不同阶級的人对"劳动""工人"等詞的理解是不同的，把"劳动""工人"看成是"下賤""骯髒"的是剝削阶級，絕大多数劳动人民对这些詞的理解是与剝削阶級不同的；其次，"劳动""工人"等詞解放前与解放后的意义是有所变化的，解放前"劳动"是意味着被剝削，解放后"劳动"是意味着为自己、为全社会創造財富、謀求幸福；解放前"工人"是被剝削、被奴役的，解放后"工人"是社会的主人，是国家的領导阶級。这些詞义的發展变化，就反映了客观事物本身的發展变化，絕不是如張先生所說的是

由于人們思想感情和道德精神有了变更。

二 語言优劣論的汉語观

西方資产阶級語言学家曾普遍地用語言优劣論的观点来論述汉語，認为汉語是孤立語、列位語、声調語、單音节語，从而得出結論說：汉語是原始、落后、貧乏的語言。从这点出發，进一步肯定了汉民族的文化、思想也是落后原始的，汉民族是天生的应該被奴役的民族。这样一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就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了。張世祿先生崇拜西方資产阶級語言学家，他随声附和并大力介紹西方資产阶級語言学家这些誣蔑汉語的观点。甚至在解放以后很久，还在教学中宣揚这些观点。

在張世祿先生1952年編的《中国語文概論提綱》（以下簡称《提綱》）和1954年編的《中国語言学概要》（以下簡称《概要》）的講义中，都有这样一段話："向来关于汉語的性質，有'單音节語''声調語''孤立語''列位語'等說法，現在看起来，这些說法有些是不正确的，有些是可以采取的。"（《提綱》，26頁；《概要》，5頁）所謂單音节語、声調語、孤立語、列位語，是資产阶級語言学家歪曲和汚蔑汉語的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沒有好坏、正謬的区别，都是極恶毒、極荒謬的东西。而張先生在解放后仍然不肯舍弃这些观点，竟然还要在其中保存一点"精华"，認为"有些是可以采取的"，下面想分几个方面来談談。

（1）关于列位語

張世祿先生認为："說汉語是列位語，就是說汉語的表达方法注重在詞的次序，汉語的語法构造，是把詞在語句的位置的排列，作为一种主要的形式成分。…依照語序来确定詞性，依照詞性来解釋意义，这便是掌握中国語文的唯一方法。"（《提綱》，30頁；《概要》，6頁）很明显，这里所說的正是他二十年前的旧观点。他在1939年写的一篇《因文法問題談到文言白話的分界》①一文中說："我認为現在研究中国文法，不妨把形态学上的关系暫时撇开，而專心注意在措辞学上的关系，才可以达到'建立范疇和构成体系'的目的。""我要憑語序来研究中国的文法，便是要适合中国語文的特殊性的"。根据張世祿先生的观点說来，我們汉語的語法，只有句法，沒有詞法，而句法中也仅仅只是研究詞序。"汉語語法＝汉語詞序"，这是多么令人吃惊的論点。

大家都知道，語法一般包括两个部門，一是詞法，一是句法，語法就是詞法与句法的綜合。詞法研究詞的組成、变化和分类的規律，任何語言的語法都应該包括詞法。当然，各种語言不同，詞法的具体內容可以不同，詞的构成方法、詞的变化形式、詞的类目可以有所差异，但不能說某些語言的詞法可以不存在。張世祿先生在注意汉語特殊性的招牌下，把語法的一个有机組成部分——詞法，随自己的意思給取消了，而且对句法也加以随便的閹割，只留下他認为是"主要的""唯一的"詞序。

西方資产阶級学者的反动論点之一，就是說汉語是列位語。高本汉（B. Karlgren）認为："〔汉語語法是〕非常貧乏的，基本上只是一些关于詞在句子里的排列規則和少数輔助詞的作用。"馬伯乐（H. Maspero）認为："中国語言沒有語法范疇及詞品分类乃是絕对的。"馬伯乐否認汉語有詞法，他用"关系类"来代替"詞类"，企圖从一般的句子进向語言事实的具体分析。对資产阶級汉学家这些恶毒誣蔑，張世祿先生不仅沒有用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观点加以批判，反而在講堂上、在講义中兜售这些錯誤观点，竟認为这些錯誤观点是"可以采取的"！

張世祿先生不仅認为汉語是列位語，汉語語法沒有詞法，而且还贊同高名凱先生关于汉語是"表象主义""原子主义"的論点。（《提綱》，30頁）所謂"原子主义""表象主义"，就是說汉語的表达只能是表象的描写和原子的排列，在抽象观念的表达方面沒有西洋語言正确，在表达清晰分明的思想上是一个"最坏的語言"。这是多么荒謬的見解！高名凱先生主張的、張世祿先生附和的汉語原子主义表象主义論，实际上是与馬伯乐的"汉語原始性、散漫性"同調，馬伯乐認为中国邏輯思想和汉語語法范疇都是"散漫性質"，由于汉語不完善，中国邏輯学家只能很困难地、朦朧地分別两个概念的簡單联列和一个概念从屬另一概念。我們可以說，"汉語原子主义、表象主义"就是从"汉語散漫性"演化来的。

（2）关于声調語

張世祿先生認为，"汉語里确是把声調的分別作为形态轉变的一种方式：有时也用这种音調变异，来表示詞性的轉变。… 利用声調来显出一种語法关系的轉化作用，确是汉語的一个特点。因之，說汉語是声調語，应該是可以相对的承認的"。（《提綱》，29頁；《概要》，6頁）張世祿先生这个見解是从高本汉接受来的。高本汉認为："中国語…利用音調的不同来表明各种的詞品：一个'好'字讀做 hǎu，作形容詞用；讀做 hàu，就作动詞用了。"②高本汉还在《汉語字群》中認为中国文字常常有一字两讀而表示詞品不同的情形。这种認为汉語声調区别詞性，認为汉語是声調語的見解是錯誤的。

---

① 見《中国文法革新論丛》，中华書局，1958年，69—81頁。

② 見《中国語与中国文》，張世祿譯，商务版，21頁。

因为：1)音讀、声調的不同，不是代表一个詞的語法变化，而是代表两个不同的詞。"美好"的好与"爱好"的好；"生長"的長与"長短"的長；"朝夕"的朝与"朝拜"的朝，实际上是一个方塊字代表两个不同的詞。古代中国学者称这种用同一个方塊字代表不同的几个詞的現象，叫做"假借"，这种"假借"，不是詞性变化和形态轉变的語法現象，而是一种詞彙引伸的手段。2)一个詞音讀不变化，也可以充当各种詞性。例如：

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白居易：重賦）
范增数目項王。（史記，項羽本記）
手劍而叱之。（公羊傳，庄十二年）
夫易，彰往而知来。（易經，系辞下）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記）

很明显，上面这些例子里的名詞、动詞、形容詞的詞性轉变，并不是靠音讀、音調的变化来显示的。

第三，声調确是存在于汉語，但它不是为区分詞性而存在的。而且声調并不是汉語唯一的特点，也不是唯有汉語有此特点。汉藏語系的語言甚至瑞典語挪威語都具有声調現象。因此，簡單而籠統地称汉語为声調語，既不科学，也无价值。

高本汉强調汉語是声調語是有目的的，他想借此来反对文字改革。解放前張世祿先生也曾經跟在高本汉后面反对文字改革，認为拼音文字不便表示声調的变化，甚至解放后在講台上还說过"汉字不能实行拼音化是由于汉語的性質决定的"的話。很清楚，这就是張世祿先生对待文字改革的态度！

（3）关于孤立語和單音节語

張世祿先生在《中国語文概論提綱》和《中国語言学概要》两本講义中都說："把汉語認为是孤立語的代表，便不很确当。"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汉語"并不是絕对的純粹的分析語"，"并不是純粹的孤立語"。張世祿先生的話說得比較含糊，高名凱先生在解放前出版的《汉語語法論》中曾无意識地替張先生作了一个注解。高名凱先生是这样說的："中国語虽有一部分的屈折成分，虽有一部分的粘着成分，但終不失其为一种孤立語，只是不能說是絕对的孤立而已。"①請比較一下，張、高两先生的意見是多么一致，不过高名凱先生說得明确干脆，張世祿先生說得委婉曲折。

談到这个問題，就不得不联系到形态分类法。語言的形态学分类法，在1808年由德国語言学家施来格尔(F. Schlegel)首先确立，他区分出附加性的和詞干屈折的語言，他認为汉語是附加性的語言的低級阶段。后来，德国語言学家施来哈尔(A. Schleicher)进一步提出了"形态三分法"，他把語言分为孤立語、粘着語和屈折語三种类型；他又認为这三种类型是三个發展阶段的表現：孤立語是古老的阶段，粘着語是后来的阶段，屈折語是最新的阶段；而汉語又是最古老阶段的孤立語的代表。在这里我們不打算对"形态分类法"进行全面的評論，而只是想指出一点，就是：它的"三个發展阶段"的解釋是極其荒謬的，这个解釋是以反动的語言优劣論和种族优劣論为其理論基础的，是根据資产阶級利益和民族偏見而产生的。

与对待"汉語是孤立語"一样，張世祿先生在对待"汉語是單音节語"問題上，也是表面上反对，骨子里贊成。他一方面說："簡單地說汉語是單音节語，这是不正确的。"理由是：因为汉語中有六类复音詞——謰語、合音、重言、附着詞、外来詞、复合詞。但同时又說："不过，在汉語当中，常常有复音詞跟單音詞互相轉化的事实。""这六类复音詞，都因为語气疾徐長短的变化，常常跟單音詞可以互相轉化：双声叠韵的謰語和二合音，往往可以减縮成为單音；重言叠字也很多跟單音詞沒有多大的分别，…附着的詞头、詞尾，也常常可以省去不用；外来語的复音詞，也很多受單音化或由多音詞轉为双音詞，至于复合詞和單音詞的互相轉化，更是常見的了。""复合詞，就是由單詞組成的复詞。"（《提綱》，28頁；《概要》，5頁）張世祿先生說謰語、重言、附着詞、复合詞等等的复音詞可以减縮成單音詞，現在，我們就拿語言事实来檢驗一下看。

关关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經）
老乡見老乡，两眼泪汪汪；地租捐税和灾荒，終年追逼庄稼汉。（旧民歌）

請問上面那些复音詞如何减縮、轉化成單音詞？

小伙子——→伙
老汉、汉子——→汉
老婆（妻子）、婆婆（外祖母）、老婆婆（老妇人）——→婆

請問，上面这样的减縮和轉化行得通嗎？

張世祿先生說，复合詞就是由單音詞組成的复詞，复合詞与單詞可以相互轉化，这个观点，与高本汉是一致的。高本汉認为汉語是單音节語，但又不能无視汉語中大量复合詞存在的事实，于是他便这样来自圆其說："复合詞是由單音詞复合而成的，所以归根到底，复合詞仍是單音节詞（参《中国語与中国文》）。如果說复合詞的每一个合成的部分，真的都是独立的語詞，那么請問，复合詞与詞組有什么区别呢？这样一来，詞組的范圍要扩大到什么地步呢？我們認为，即使本来是可以独立运用的單詞，当它进入复合詞以后，它就失去了独立的身分，仅仅作为一个构詞材料——詞素而存在。复合詞的所謂"复合"，是指它的构詞法而言，在实

（下轉15頁）

① 見《汉語語法論》，开明版，1948年，67頁。

批判王力《汉語詩律学》中的資产阶級学术思想

金連城

1958年1月出版的《汉語詩律学》，是王力先生的主要著作之一。同他的其他一些著作一样，从这一本大部头的書，可以看出王力先生有严重的資产阶級学术思想。我只是想作一番初步的揭露和批判，更全面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还有待于王力先生自己和其他的同志。

一

資产阶級学者总是崇拜西方資本主义国家的。他們开口"西洋"，閉口"西欧"。总之，一切都以外国为是。这是一种严重脫离实际的重外輕中的傾向。他們醉心于"欧化"。在他們看来，外国有的我們才能有，学术研究中不处处与外国材料相对比就不能显示出什么規律来。

王力先生的《汉語詩律学》中，突出地表現了这种重外輕中的資产阶級思想。該書"白話詩和欧化詩"一章表現得更为露骨。全章几乎都是关于西洋詩的格律，大談特談什么音步上的淹波律、特罗凱律、阿那貝律、德提尔律，韵脚上的随韵、抱韵、交韵、商籟、莎士比亞体和史本賽体等等之类。

我們先拿上面所說的淹波律等所謂音步問題来說。音步是外国詩律中的長短或輕重問題。它是适合某些外国語言的特点的。至于从汉語实际来說，那是不适用的。正如王力先生所說，"在普通話里，有所謂輕音字，如'我的書'，'打了他'，'拿着伞'，'枇杷'，'亲家'等"。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其他象'国家'，'銀行'，'圖書館'，'攻击'，'斗爭'之类，总是字字重讀的，这样，絕对的'輕声'字太少了"。依王力先生之意，拿中国新詩中这些"絕对的'輕声'字"与西洋詩律的音步来对比，"变化也就太少了"。（以上引文分别見該書862頁，865頁，下同）我以为不是"变化也就太少"，而是根本不适合。就拿該書所举的卞之琳《慰劳信集》第十六首来看：

要保衛藍天，
要保衛白云，
不讓打污印，
靠你們雷电。

与大地相連，
自由的鷺鷹，
要山河干凈，
你們有敏眼。

也輕于鴻毛，
也重于泰山，
責任內逍遙，

劳苦的人們，
五分鐘死生，
千万顆憂心。　　（843 — 844頁）

这首詩里也許"們""的"等字可說是"輕音字"吧。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是不合于西洋詩律中音步的輕重律或重輕律的。不过王力先生是有办法的。他說："除了絕对的輕音之外，我們还可以分别出相对輕音。譬如'国家'，我們可以假定'国'字比較重些，'家'字比較輕些（虽然不象'張家'的'家'那样絕对的輕）；又如'吃飯'，我們可以假定'吃'字比較重些，'飯'字比較輕些。相对的輕音可算入音步之內；絕对的輕音有时候不必算入音步之內。"（865——866頁）我們姑且不論这种假定的純主观性，且問一問什么情况下把重的輕讀，輕的反而重讀？象王力先生所举卞之琳《傍晚》一詩中"想要說什么呢？"的"么"字那样，本是輕音字反而重讀。看样子也只好見仁見智了。总之，輕重音問題本不是汉語詩律中固有的特点。象王力先生这种削中国之"足"，适西洋之"履"的办法，不过是資产阶級学者主观唯心主义的做法。

象上面所說的这种醉心于欧化的脫离实际的研究，在《汉語詩律学》中是很多的。王力先生总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硬把西洋的帽子套在中国的头上。例如，因为西洋詩里有所謂"跨行"。于是王力先生就把《西廂記》的"这一篇与本宫始終不同。…"写成

这一篇与本宫
始終不同。
………

把王伯成《六么序》（套数"天宝遺事"）的"今日个从实对你分析：…"写成

今日个从实
对你分析：
………

說"宮""实"都是句中韵，而且"有点兒象西洋的'垮行'。"(761——762頁)

又例如，因为西洋詩里有所謂"句首韵"，王力先生就認为中国詩也有"句首韵"。而且認为"在句首用相同的詞，也頗有'句首韵'的效果"。于是把俞平伯《晚風》中的"一个宛轉地話到清愁，一个掩抑地訴來幽怨"的"一个"，把卞之琳《圆宝盒》中的"…一顆晶瑩的水銀掩有全世界的色相，一顆金黃的灯火籠罩有一場华宴，一顆新鮮的雨点含有你昨夜的嘆气…别上什么鐘表店听你的青春被蚕食，别上什么骨董鋪买你家祖父的旧摆設，…"中的"一顆"、"别上"，都說是"句首韵"了。(827——828頁)其实这不过是屬于修辞上各句运用同一类字的排比罢了。其他象西洋詩里有所謂"随韵"、"抱韵"、"交韵"之类，王力先生認为在我国新詩里有，古代的詞里也有。(572——578頁)当然，这些現象无論在現在中国或古代中国都可以有，但是王力先生处处以外国为主，以本国为輔，令人感覚到好象連中国古人也是学習外国才有这些詩律似的，至少在体例上有喧宾夺主的缺点，不是《汉語詩律学》所应采取的写法。王力先生还有許多变通的說法。例如"一韵到底的詞，也可認为随韵的延長"。不很象的，可以認为是"近似"、"类似"甚至"变式"。总之，在王力先生看来，不套用西洋詩律学就不能講中国詩律学。这种重外輕中的資产阶級思想恐怕是达到極点了吧。

事情还不仅如此。王力先生对中国新格律詩的發展方向的理解也是極端錯誤的。他認为新詩的欧化"还沒有达到十分完善的地步。将来詩人們也許还要有所改进的"。(869頁)認为中国新格律詩發展的"最方便的道路就是模仿西洋的格律"。(950頁)周揚同志在《新民歌开始了詩歌的新道路》中指出："有些詩人却偏偏醉心于模仿西洋詩的格調，而不去正确地繼承民族傳統，發揮新的創造，这就成为新詩脫离劳动群众的重要原因。"(見《紅旗》第1期34頁)而王力先生正是"醉心于模仿西洋詩的格調"的得力鼓吹者。这里我們也不难看出王力先生的意圖是想把新詩的發展拖向抛弃民族傳統、脫离劳动群众的境地。总之，严重的資产阶級学术思想阻碍了王力先生去从事有益于中国新格律詩發展的研究；阻碍了王力先生对五四以来，那些战胜了各式各样的个人主义、頹廢主义情調和形式主义傾向的，一步步与人民革命斗争相結合的革命詩歌和新民歌的研究。因此王力先生是不可能指出中国新格律詩的正确發展道路的。

二

資产阶級学术思想的表現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王力先生在《汉語詩律学》中所暴露出来的資产阶級学术思想也是如此。資产阶級学者对待学术研究总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把許多現象看成死板的东西，在那里作些煩瑣的純客观的分析。至于这样的研究到底有些什么用处，他們是不管的。

王力先生在《汉語詩律学》中把古代詩歌句式的分类弄到煩瑣不堪的地步。以五言近体詩为例，王力先生把五言近体詩的句式分为簡單句、复杂句、不完全句三种。又把簡單句的句式分为29个大类，60个小类，108个大目，135个細目；复杂句的句式分为49个大类，89个小类，123个大目，150个細目；不完全句的句式分为17个大类，54个小类，109个大目，150个細目；总計有95个大类，203个小类，340个大目，435个細目。(182——222頁)看吧，大类、小类，还有大目、細目。这种以詞类在句中位置的变换把句式加以分类的方法是徹头徹尾的形式主义的做法。按照这种方法来研究句式，那么散文的句式的数目不知将要怎样統計。这种所謂研究，正如《中国語文》1958年9月号社論里所指出的那样，只是"把語言当做死板的东西，在那里做純客观的分析"。

这种格律的游戏，还表現在对五古和七古的平仄句式的分类上。王力先生把五古和七古平仄句式用了近似数学上排列和組合的方法，把所有可能的平仄句式都排列出来(417頁的統計：五言的平仄句式32类，七言的平仄句式128类)，然后再找例句，找不到的就象該書第400頁所說的那样："平仄仄平平平平。这种句子未見。"

这种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王力先生在該書序言里說，"写这一部書的动机本来是为了教学"。試問有誰願意去学習那几百种煩瑣的句式分类呢？

資产阶級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口头上講什么"为了教学"，而实际上是以此为幌子企圖販卖脫离实际厚古薄今的貨色。他們当然不考虑到指导教学实踐的問題。他們只是关在書斋里把古人的东西再穿上"ABC"的新装来吓唬人，或是企圖引导青年人也象他們一样，鑽在故紙堆里做这些脫离实际、脫离劳动群众的煩瑣的游戏。

三

資产阶級学者的治学态度总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怎样便利就怎样說。他們的所謂"規律"只不过是"便利"的产物。

王力先生在談到七言近体詩的句式时說："七言在平仄上是五言的延長，在意义上也可認为五言的延長。"(234頁)認为"每一个五言句式都可以敷衍成为七言；即使沒有这种例子，也有这种可能性"。(236頁)

(下轉10頁)

悼念罗常培先生

（一）

当代中国卓越的語言学家、本刊前任总編輯罗常培先生不幸于1958年12月13日在北京逝世。

罗先生字莘田，号恬庵，1899年8月9日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滿族平民家庭，先世屬吉林宁古塔薩克达氏。他小时候家境清寒，十七岁死了父亲，一面作速記員，一面在学校讀書。速記的职业使他无形中受到听写各地方言的訓練，与后来从事語言研究工作有很大关系。1919年他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畢业，接着又讀了两年哲学系，以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北京第一中学任校長。1923年任西安西北大学教授，开始講授汉語音韵学。后来在厦門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所講授的課程也大多屬于音韵学范圍。1929年任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致力于音韵学問題的研究，并調查現代汉語方言。1934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仍兼任史語所研究員。抗日战爭發生，北大迁湖南。他在淪陷了的北京听到消息，間道赶去，又随学校迁云南，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1945年到1948年，先后任美国朴茂納大学和耶魯大学訪問教授，教中国語言学和中国文学。1948年秋回国，仍在北京大学教書，并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長。

解放前，罗先生是个在旧民主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爱国主义者。解放后，他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所領导的民主革命的偉大和正确，看到新中国的美好远景，在政治上有了新的認識，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他坦白地批判了自己，积極地靠攏党，热烈地拥护党的政策，在党的領导下做了許多工作。1949年被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語言研究所，他被任命为所長。1951年被任命为中央民族事务委員会委員。1954年被任命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委員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最近当选为第二屆的代表）。1951年他开始患高血压症，虽然領导方面一再要他安心养病，但是对于历次的政治运动，对于語言研究的大小規划和語言学界的組織工作，对于許多語文問題的研究和討論，他却努力要求参加，不肯落在别的語言工作者后头，唯恐辜負党和政府对他的期望。1957年以后，他的病情更見严重，但是他仍然积極地爭取参加偉大的整風运动和反右斗爭。

罗先生三十多年孜孜不倦地从事語言研究工作，从好些方面丰富了中国語言学的內容，对中国語言学的發展起了促进的作用。他用近代語音学的方法，結合我国音韵学的傳統，对汉語音韵学中的許多关鍵性的問題进行深刻研究，提出明确的解答，使音韵学从模糊籠統的某些概念的影响下解脫出来，成为一門比較容易理解的学科。罗先生学术工作中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汉語方言的研究。他写了好几部关于現代方言的專著和許多辨析方音的文章；在汉語史的研究工作中，他系統地研究了唐五代西北方音和早期北方話的語音。对少数民族語言的調查研究，特别是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語言，他作了不少开創性的工作。在語言学别的方面，例如論述中国語言学史中的个别問題，普及語音知識，研究戏剧和曲艺音韵等方面，都有独特的貢献。（罗先生著作目录，因篇幅所限，留待下期發表。）

罗先生長期在大学講授語言学課程，許多語言工作者都听过他的課。他善于結合旁人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深入淺出地把必要的知識傳授給学生。他对学生要求严格而又循循善誘。无論在学业方面或是在生活方面，学生有一点長处，他就多方鼓励；学生有一点錯誤，他也毫不姑息。他为培植中国語言学界的新生力量付出很多劳力。

本刊从1952年7月創刊以来，罗先生一直担任編輯委員，1955年3月以前，他还担任过总編輯的职务。他总是非常关心本刊的編輯方向、稿件內容以及編輯部每个同志的思想和工作情况。

罗先生为人富于正义感。在旧社会，他看見不合理的事或为非作歹的人，都会立刻起来加以呵责，例如1944

年，昆明学生运动正在高潮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揚言要解聘若干进步教授，他听到后立即写信給重庆新华日报表示抗議。他对自己的业务也象待人一样，絕不苟且敷衍，而且始終保持旺盛的上进精神。这些品德，是他在旧社会独立奋斗的武器，也是成为一个学者的条件。进到新社会以后，他自恨"聞道較晚"，过去沒能参与实际的革命工作，虽然有向善自拔的要求，但是由于阶級性的限制，深深感到自己有"勇士不能自举其身"的許多弱点，因而求进步求改造的心也就非常眞摯而迫切。

在祖国飞跃前进的年代，罗先生生前还計划要为人民的事业做出更多的学术貢献，語言学界的許多重要工作也等待着罗先生参加。可是，他的病一天天沉重起来。八年来他先后八次住医院，去年十一月，他最后一次入院，虽然用尽了一切医治的办法，也終于无法挽救。象这样一位經驗丰富、能力强而又忠于人民事业的学者，他的逝世无疑地是語言学界的重大損失。

我們以非常沉痛的心情悼念罗先生。我們要学習他勤劳不懈的工作作風，吸取他丰富的語言学著作中的有用成分，在党的領导下，齐心协力把中国語言学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本刊編輯部）**

（二）

与君長别日，悲忆少年时…

听到罗莘田（常培）先生病故的消息，我就含着热泪写下前面的两句。我想写好几首詩，哭吊好友。可是，越想泪越多，思想无法集中，再也写不下去！

悲忆少年时！是的，莘田与我是小学的同学。自初識到今天已整整有五十年了！叫我怎能不哭呢？这五十年間，世界上与国家里起了多大的变化呀，少年时代的朋友絕大多数早已不相聞問或不知下落了。在莘田活着的时候，每言及此，我們就都觉得五十年如一日的友情特别珍貴！

我記得很清楚：我从私塾轉入学堂，即編入初小三年級，与莘田同班。我們的学校是西直門大街路南的两等小学堂。在同学中，他給我的印象最深，他品学兼优，而且長長的髮辮垂在肩前；别人的辮子都垂在背后。虽然也吵过嘴，可是我們的感情始終很好。下午放学后，我們每每一同到小茶館去听評講《小五义》或《施公案》。書錢总是他替我付。我家里穷，我的手里沒有零錢。

不久，这个小学堂改办女学。我就轉入了南草厂的第十四小学，莘田轉到报子胡同第四小学。我們不大見面了。到入中学的时候，我們俩都考入了祖家街的第三中学，他比我小一岁，而級次高一班。他常常跃級，因为他既聰明，又肯用功。他的每門功課都很好，不象我那样对喜爱的就多用点心，不喜爱的就不大注意。在"三中"沒有好久，我即考入北京师范，为的是师范学校既免收学膳費，又供給制服与書籍。从此，我与莘田又不常見了。

师范畢业后，我即去办小学。莘田一方面在参議院作速記員，一方面在北大讀書。这就更难相見了。我們虽不大見面，但未相忘。此后許多年月中都是如此，忽聚忽散，而始終彼此关切。直到解放后，我們才又都回到北京，常常見面，高高兴兴地談心道故。

莘田是学者，我不是。他的著作，我看不懂。那么，我們俩为什么老說得来，不管相隔多远，老彼此惦念呢？我想首先是我俩在作人上有相同之点，我們都耻于巴結人，又不怕自己吃点亏。这样，在那污濁的旧社会里，就能够独立不倚，不至被恶势力拉去作走狗。我們願意自食其力，哪怕清苦一些。記得在抗日战爭中，我在北碚，莘田由昆明来訪，我就去卖了一身旧衣裳，好請他吃一頓小飯館兒。可是，他正鬧腸胃病，吃不下去。于是，相視苦笑者久之。

是的，遇到一处，我們总是以独立不倚，作事負責相勉。志同道合，所以我們老說得来。莘田的責任心極重，他的学生們都会作証。学生們大概有点怕他，因为他对他們的要求，在治学上与为人上，都很严格。学生們也都敬爱他，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也严格。他不但要求自己把学生教明白，而且要求把他們教通了，能够去独当一面，独立思考。他是那么負責，哪怕是一封普通的信，一張字条，也要写得字正文清，一絲不苟。多少年来，我总願向他学習，养成凡事有条有理的好習慣，可总沒能学到家。

莘田所重視的独立不倚的精神，在旧社会里有一定的好处。它使我們不至于利欲熏心，去淌混水。可是它也有毛病，即孤高自賞，輕視政治。莘田的这个缺点也正是我的缺点。我們因不关心政治，便只知恨恶反动势力，而看不明白革命运动。我們武断地以为二者既都是搞政治，就都不清高。在革命时代里，我們犯了錯誤——只有些爱国心，而不認識革命道路。細想起来，我們的独立不倚不过是独善其身，但求无过而已。我們的四面不靠，来自黑白不完全分明。我們总想远远躲开黑暗势力，而躲不开，可又不敢亲近革命。直到革命成功，我們才明白救了我們的是革命，而不是我們自己的独立不倚！

是的，到解放后，我們才看出自己的錯誤，从而都願随着共产党走，积極为人民服务。彼此見面，我們不再提独立不倚，而代之以关心政治，改造思想。可是，多

年来养成的思想習慣往往阻碍着我們的思想跃进。莘田哪，假若你能多活几岁，我相信我們会互相督勉，勤于学習，叫我們的心眼更亮堂一些，胸襟更开朗一些，忘掉个人的小小顧虑，而全心全意地接受党的领导，作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来！你死的太早了！

莘田虽是博讀古籍的学者，却不輕視民間文学。他喜爱戏曲与曲艺，常和艺人們来往，互相学習。他会唱許多折昆曲。莘田哪，再也听不到你的圓滑的噪音，高唱"長生殿"与"夜奔"了！

安眠吧，莘田！我知道：这二三年来，你的最大苦痛就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能照常工作，老觉得对不起党与人民！安眠吧，在治学与教学上你尽了所能尽的心力，在政治思想上你曾不断地学習，改造自己，兒女們都已長大，朋友与学生們都不会忘了你，休息吧！特别重要的是，我們都知道，并且永难忘記：党怎么爱护你，信任你！疾病夺去你的生命，你的朋友、学生和子女却都会因你所受的爱护与教育而感激党，靠近党，从而全心全意地努力于社会主义的建設！安眠吧，五十年的老友！明年来祭你的时候，祖国的革命事业必又有飞跃的發展与成就，你含笑休息吧！**（老　舍）**

（三）

罗莘田先生于1958年12月13日逝世了，对于他的老朋友們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損失！

罗先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語言学家，关于这一点，自有他的同行們来論述，我是摸不着边的。我只在遇到会說不会写的字句的时候，才向他請教。有时談到歌曲，也向他請教些声韵和声乐，但是現在連这一点也不記得了。

在我的心里，他是一个很好，很热情，很誠恳的朋友。他把你当作朋友以后，他从不忘記你，他从各方面关心你；你有了过失，他也不放过你，他一面耐心地劝告你，一面严厉地指責你。反过来說，他也希望他的朋友們也这样地对待他。

他又是一个很天真，很正直，富于正义感的人。旧政权旧社会的人物，使他常常感到憤懑，感到格格不入。解放后，他心情舒暢了，他找到了他的心悅誠服的領导者——中国共产党！他向党靠攏，接受党的領导，事无巨細，都向党坦白商量。他渴願在自己的崗位上，在党的領导下，尽着自己一切的力量。

1952年我們从国外回来，他来看我們，我們觉得他比从前衰老得多，头髮都斑白了！他又兴奋又难过地說："你看我們祖国整个变了样了吧？現在大家加紧学習，加紧改造，好在建設祖国上多加一把劲，你們看我身体这样赶不上，叫人着急不着急？"

罗先生是个能苦干、大干的人，但是这些年来，高血压的病，一直紧紧地纏住他，因此他更加性急，更加失眠。他也試着听医生的話，清湯淡飯，休息疗养，一方面力疾从公，并且做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是他不能参观旅行，不能坚持写作，不能坚持开会……；八年之中，进了八次医院。我們每次去看望他，都看到他的痛苦和矛盾——病使他痛苦；看着周圍万馬奔騰的跃进現象，而他的病彊限制住了他的跃进的願望和努力，又使他矛盾。他的痛苦和矛盾，都从他的抑郁急躁的詞色中噴溢了出来，但是我們只能勉强劝慰罢了。

人一过了中年，能在一起話旧的朋友，总是一天一天地少下去，这原也是个"必然性"，但是事到临头，却又忍不住有很深的伤感。一个多月以前，我在莫斯科，郑振鐸先生的噩耗傳来，对我是一个晴天霹靂！回来不久，只在北京医院中，和罗先生有过一次短短的談話，他就又弃我們而去！看到朋友，想到自己，我并沒有像罗先生那种的麻煩的病，而是我自己的懶惰拖沓的思想習慣，在限制着我的跃进。我应該化悲痛为力量，以朋友的遺憾来鞭策自己，認眞地努力工作，使自己回忆到这些朋友时，不至于感到有无穷的慚愧！

（冰　心）1958年12月29日

（四）

1958年是全中国人民大跃进的一年，我們都活得更高兴，更有意思。出生在世紀初的許多朋友誰也想再活个五六十年，亲手参与社会主义的建成，更亲身迎接共产主义的来到。偏偏在这年尾一下丧失了好几位新的老的革命工作儔侶。难忘的11月17，我們送西諦、丕模和适安集体安息在八宝山；不期恰恰正一个月，12月17又向八宝山去送莘田安息！象西諦和莘田，我們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一朝永訣，悲痛难以言宣。

过去几十年各各走了些不同的道路，是党引导着我們在解放了的生路上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我們的友誼更結合成牽連不断地創造偉大光輝祖国的一群。我們这一群有过相同的青年时代，在"五四"前后的北洋封建軍閥統治下，都生活在那"晴天香爐、阴天酱缸"的古老北京。就拿"香爐、酱缸"来象征那过去吧，我們掙扎于"香爐、酱缸"之中，如今改变了"香爐、酱缸"的面貌。这是翻天复地的改变，我們都出了力，并且将要进入更美好的天堂。西諦和莘田都为这美好将来兴奋地工作着，不能不憾恨，他們被自然夺去得太驟然了！

回忆三反学習中間，莘田和我都得到党的关怀和教育。我們跟着党走向党所指引的光明道路，逐步摆脫反动的北大傳統。我們过去生活在"香爐、酱缸"里最鮮明的烙印就是这个傳統的影响。首先資产阶級思想和学术觀点有如香灰面酱盖滿浸透了我們。这一直

到現在还是我們一群从事社会科学文化革命的人首要的奋斗任务，我們必須徹底改造自己。我們熟悉，在語言学界一心靠攏党，由衷地尽心尽力在党的領导下不断努力，兢兢业业負荷着任务，注意批判資产阶級思想，莘田是力争上游带头促进的一位。不止是在运动中間，十年来，莘田为了学習馬克思列宁主义，在語言学界和具体工作中，都不遺余力地提倡学習苏联，有的写作可能被脱离政治的"專家"所鄙夷，以为是些"应景"的文字，可是他毫无疑虑地这样做了。远的不說，就說全民整風以来，他是十分認真地力疾参加，小心翼翼地注意大字报，而他的病并不允許他那样兴奋那样紧張。反右斗争中，他为了駁斥右派分子激动得很厉害，在压抑不住感情的情况下写發言稿，是分日計程控制着高血压一点一滴地写成的。我們偶尔遇見，談到的都是如何体現党的政策和如何推进工作，我的印象很深，我也特别难受。因为他的病不宜多談話，尤其多談这些有关工作的話，无論是务虛或者务实都不相宜，虽然住所衡宇相望，想要看看他，我也只好耐着离群索居的寂寞，抑制着特意不去。誰料到这竟是最后的日子，使得他在医院里直念道毅生（天挺）和我呢！就是这样錯成不可补偿的憾恨，沒有能和他多談談。三十年間离合酸辛，一定会从他那兒得到更多更亲切的关怀和教益。想到这里，悲痛不能不深。

驟然夺去我們的莘田的是无法制伏的病痛。現在想来，还幸亏是解放后祖国的一切飞跃地进步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莘田受病痛的纏扰才可能得到許多医疗，使他延續了与病斗爭的力量，看見了祖国美好的将来，应該体会到，这就是时代优越的幸福。莘田，安息吧，你所得到的时代幸福也表証了你沒有虛度这一生，尤其是党和人民政府对你的期望能够表証，我們从莘田几年来与病斗爭的生活所得到的最深的印象是：紧張認眞接受党的領导，时时刻刻不忘任务！莘田，我們一定要学習你这种精神，一定要把悲痛化为力量。

莘田一生紧張認眞的精神是旁人不可及的。記得1937年抗战之初，国民党反动政府拋弃华北，北大师生走向西南，当时莘田和我們留守在危城里，直到敌人侵占学校才开始走上流亡的途程。莘田每一談往事，把那时候毅生仔肩艰巨和另外一些人假薄食壬食䁖畏葸对比，贊揚与唾罵交并，爱憎分外明朗。我們一行从天津遵海南航，輪船上相与笑乐訂一字評，大家叫莘田"罗文直公"。要理解莘田，从他自然流露的言談可以体味，"直"就是他的紧張認眞精神的概括。回溯1928年，莘田在广州，我在北平，我們通信論交，开始走上学术的共同道路；1930年秋我們都到了壮年，才又在我們青年时代生活过的"香爐、醬缸"的古老北京相見，跟濰洲一起，我們三个人相处最好。我在《白濰洲傳》里这样叙述过：

> 余入北京大学，致志文字音韵之学，窃嘆不得一二同志；将卒业，君方入学，旣而相識，并获交罗君常培。三人年齿相次，君長余一岁，小罗君一岁。十九年（1930）秋始同在北平，过从益密；每多劝励，君常下从于余，余又服于罗君，而罗君頗重君意也。

濰洲不幸在1934年10月故去，我們各自对濰洲迸發了不能遏止的哀伤，从而加深相互的認識。就在濰洲故去的那一年，莘田来到北大接任刘半农的职务，我們同在改了名的"香爐、醬缸"的北平生活着，并且朝夕出入相見于紅楼，直到1937年同时离开了陷于敌手的危城。"香爐、醬缸"中的这一段的生活，我們有一个相同的問題，就是为誰服务的前提上犯着不可隐諱的錯誤。这是紅專道路的問題，我們都明白地認識到。解放后得到党的关怀和教育，莘田認眞地接受党的領导，时时刻刻不忘了任务，是很自然的。这也說明我們过去受反动的北大傳統影响相当深，一經警觉，就很眞摯而徹底地不負党和人民的厚望。莘田，你是我們改造学習的榜样！因此回忆起来，在那脱离政治的思想情况下，莘田对于职守的負責态度还是难能可貴的；等到解放后服务方向正确了，紧張認眞的成就就特别大了。

許多朋友都这样打比喻，說語言研究所是我們語言学界的火車头，而莘田是火車头的司机。从具体發揮的作用說，翠花胡同时期的語言研究所，在党的領导下，莘田是煞費苦心逐步使它茁壮起来；当然一切工作是許多同志齐心协力展开的，可是組織、計划等等，他的紧張認眞的精神不能不是主要动力。三数年間，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从語言研究所一个組扩充創立，許多基本人材絕大多数受过莘田的教。莘田算得是火車头的好司机。他就在带着病痛的日子里不断貢献了力量，給語言学界基础工作做了一些准备。1959年将要在全国有更大的跃进，語言工作者对文化革命服务的任务有特别需要。我們一定要体現莘田的精神，更好地完成他未完的遺志！从我来說，代管的审音工作也一定跟同志們加速做好。

我同意潘梓年同志在公祭致悼詞时的論定，說他从好些方面丰富了中国語言学的內容。莘田实在是眞心誠意跟着党走的努力改造、带头促进的語言学者，在資产阶級学术思想弥漫的氛圍中能不負党和人民的屬望，这就当得起馬列主义者对他的称許！

莘田在学术上获得成就，这些成就又成功地傳授給了下一代，我想他們身受者是能够深切体会到的。

新中国的人不作无益的悲痛，我們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先逝者的遺志后死者繼續来干。我們悼念莘田，要学習莘田，学習他那样紧張認眞不亏职責，不負党和人民的屬望。（**魏建功**）1958，12，31。

（五）

罗常培先生逝世了！語言学界失去了一位热情的学者！

四十年来，罗先生一直在教育和科学研究崗位上辛勤劳动着。他一生不倦地啓迪和引导着青年，热情地帮助和鼓励着青年。他自己在語言学工作上的成績很多，而在培养青年这方面貢献更大。

罗先生在学習上一貫刻苦認眞，这是朋友們以及和他同住过一个宿舍的人們所津津乐道的。他从在大学讀書起，学習中一遇到引文和疑問，总是取对古今文献，不厭求詳，因此他的笔記詳細而精确，常为我們所借抄。1927年夏，他在杭州見到一部黃季剛先生手校的《广韵》，里面标注許多符号而沒有說明。他业余在盛暑蒸郁的斗室中，揮汗过录，并深入地排比探求。朋友們都說何必如此認眞，而罗先生不顧，終于得出它的条貫。1954年，我到太平胡同語言研究所宿舍去看他，这时他已患高血压病。我見他还在讀書写卡片并为同志們校看卡片，劝他节劳。他說，工作慣了，一刻不工作反倒觉得难过。四十年来，他除了病倒以外，确实是沒有一刻不在認眞工作，眞是劳年矻矻，孜孜不息。

罗先生在学習中，总是先掌握丰富的文献和实际材料，然后从材料中去找它的規律。1928年他为了研究反切就注意对音，为了对音就注意拉丁字拼音，为了拉丁字在中国的傳播就注意到刘献廷，为了刘献廷就注意到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人物和学术思想。1943年，他在云南鷄足山悉檀寺看到丽江木家的"木氏宦譜圖象世系考"，就注意到父子联名制，因而进一步自己去調查并收集朋友們得到的現实的活材料以及文献資料，綜和起来加以研究。1933年他在青島遇見游国恩先生，一听到游先生說的"临川"两个字就觉得有三点値得注意，于是就进一步对临川音加以調查研究，終于写成《临川音系》。由于他善于抓住語音規律，所以学習語言方面十分迅速。1927年秋天他到广州，不久就掌握了广州話的特点和詞彙。他不肯放过一切的实踐机会，常說广州話。当他第一次会見古直先生时，古先生不相信他是外省人，更不相信他到广州不过半年。

罗先生教授汉語音韵学和音韵沿革多年，有很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見解，但是他始終謙光自抑，不事夸揚。他的講义——《汉語音韵学导論》經过了二十五年，修改了八次，才在1949年印行。这本書虽然只有七万多字，而都是从他个人研究的結果提煉成的，偶有采取前人意見的地方也是經过批判才接受的。出版以后，他自己仍不滿意，还想用語体徹底改写，以便使較多的讀者看得懂。可惜他已为高血压病所苦，沒有来得及改写。他每写一篇文章或一本書，总是謙遜地請旁人提意見，而对正确的意見又总是虚怀接受，就是在出版以后，如有新的發現，来得及的，再版时一定改，来不及的也一定加以說明。我們在他的許多著作的自序和再版序言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1948年，他随着学校从長沙迁到昆明。云南是多民族地区，語言复杂，而汉語又和北方普通話相近。研究語言的人狃于积習，对少数民族語言的研究感到条件困难，对于云南汉語又感到平凡，都鼓不起系統地調查研究的兴趣。他却認为全国語言有一个地方沒有經过精确的科学調查，語言地圖上这一角終究是个缺陷，应該利用当前的机会，因利乘便地做一次云南全省語言調查。于是建議大家通力合作。几年之間，几个中年人領导几个青年人，分别在当时交通梗阻、經費拮据、印刷困难的情况下，咬紧牙关到各地去作实地調查，終于給少数民族語言研究工作开辟了一条道路。

罗先生在政治上也和在科学研究上一样，是要求不断前进、不断日新的。北京一解放，他就积極学習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参加政治課教学工作。他常說，現在的心情和解放以前大不相同了。他抱着加紧工作的雄心，可是几年来都为病所困，否則他在科学研究的成就上一定还要大得多。

罗先生为人坦率，嫉悪如仇，我們都称他为"罗文直公"。他律已很严，能持人所不能持。他待人眞誠热情。我和他是大学的同学，四十多年来，天天見面的时間总在二十年以上，他对我的帮助、鼓励和关怀，不是笔墨所能尽。四十年生死交情的朋友，一旦永别，使我万分悲痛，而我更悲痛的是这样一位科学干将，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設的文化革命进軍中，忽然停止了他的思想！（**郑天挺**）1958年12月28日，天津。

（六）

罗常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語言学家，他的逝世是語言学界的一个很大的損失。我在二十多年以前就跟罗先生学習語言学、方言調查和有关汉語音韵的科目。在这样長的时期里，我不断地得到罗先生的教誨、关怀和帮助，現在眼看到他永远地离开了我們，特别是离开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时代，我感到非常悲痛！

罗先生在語言学上的貢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但在語音学、汉語音韵和方言研究方面，而且在少数民族語文研究方面，都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根据我的体会，罗先生在少数民族語言工作上有两个主要的貢献：

（一）对我国少数民族語言进行了一些开創性的研究，积極地貫徹党提出的帮助少数民族創制和改革文字的任务——罗先生从1940年就开始在昆明研究納西語，1942年到云南西部的大理研究僰、傈僳、白、独

龙、怒等語言，1943年又到大理研究了景頗語。这些材料大部分还沒有整理完畢，已經刊布的只有《景頗語中的詞头n-》(1942)，《蓮山擺彝語文初探》(1950)，《貢山俅語初探》(1952)，《国內少数民族語言系屬和文字情况》(1951)，《国內少数民族語言文字的概况》(1954，和我合作的)等。其中除末两篇文章参考了解放以后搜集的新材料以外，其他都是根据解放前搜集的材料写成的。这些著作虽然还不够深入并且在学术观点和方法上有一些錯誤和缺点，但是都对少数民族語言提供了宝貴的資料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們都知道，在国民党統治时期，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是很困难的。事实上在解放以前，沒有任何人对我国任何少数民族語言进行过全面而又深入的科学研究。那时候不只大多数語言沒經过研究，研究过的也不过随意在一个民族的个别地点就發音合作人搜集材料，然后加以整理。只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才有可能有計划地大規模地对全国少数民族語言进行普查，并在普查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罗先生在解放以前，虽然对一些政治問題上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但是还沒有接受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解放后，他又經常害病，和其他許多学者一样，資产阶級的学术思想还沒得到根本的改造。因此，我們还不能拿我們今天的要求来要求他。罗先生在担任了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所長以后，誠心誠意地跟着党走，随时随地听党的話，尽力在党的領导下，組織人力来完成党提出的帮助少数民族創制改革文字的任务。即使是在病中，他还是經常指导和督促这一項重要工作。因此，我們可以說，罗先生在少数民族語言研究上有开創的功劳，在帮助少数民族創制改革文字的工作上，也已經尽了他的最大的力量。

(二)教导鼓励学生从事少数民族語言研究，在培养民族語文干部方面起了积極的作用——罗先生教書几十年，学生只要有問題，罗先生总是不遺余力地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教給学生。罗先生从1938年开始，不論在課內課外，都积極鼓励学生从事少数民族語言的調查研究工作。罗先生虽然在当时沒看到帮助少数民族發展文化这个主要方面，但是他提出了要大大地推进汉語历史的研究，必須立即調查研究少数民族語言，开展汉藏語言的比較研究。現在从事少数民族語文工作的同志中，有一些从那时候起就因受到他的鼓励而开始了少数民族語言的研究。例如，我就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于1938年开始研究蒙自附近的彝語。当时，我在蒙自中学找到一位彝族学生，他在民族压迫和歧視的反动統治下，不敢暴露民族成分，因此，他和我約定，記录語言的工作只能背着人进行，在我們两人以外，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他是彝族（当时称“倮倮”）。可是我們初次进行調查工作，有許多問題需要得到罗先生的指导。后来我和罗先生商量，如果我能对这位發音合作人暴露罗先生是滿族，他就会願意一同見罗先生，請罗先生审訂一下記录的材料。在罗先生欣然同意下，我們三人才在罗先生屋子里关起門来由罗先生指导解决我們的疑难問題。从此以后，我就利用一切机会研究少数民族語言，罗先生随时都給我指导和帮助。解放以后，罗先生在党的教育下，更加体会到要大力开展少数民族語文工作，必須培养新生力量。在他的建議下，1951年語言研究所主办了一个在夜晚上課的少数民族語言調查訓練班，1952—1954年在北京大学开办了語言專修科，規定在專修科中培养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語文干部。这个訓練班和專修科畢业的許多同志，現在都有了独立工作的能力。其中还有一些在1956年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大規模举办的民族語言調查訓練班上担任了教員和輔导員。由此可以看出，罗先生在解放前教导学生从事少数民族語文研究工作和解放后在貫徹党培养新生力量的指示中，起了积極的作用。

罗先生在病中看到民族語文工作大跃进的情况，非常兴奋，但是，同时又因自己有病不能經常参加工作而感到焦急和遺憾。只要病稍好一些，他就把他搜集的材料稍加整理，凡是他觉得对今天的工作有用的，他就交給同志們参考。在他最后这一次进医院以前，他花了半个月的时間整理他的藏書。他把他的藏書一本一本地按照語言研究所和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的需要，亲自分成两部分，分别贈送給两个研究所。在整理这些書籍的过程中，他的血压更高了，从两只脚一直腫到臉上，他还不停止。家里的人劝他休息一些时候再进行整理，他說：“我不把这些書送到需要它們的地方，死也不能瞑目！”他分贈藏書的工作完成的一天，也正是他病危进入医院的一天。他躺在病床上对我說：“我的病重了，这一次沒有出院的指望了。希望死后能埋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也說明罗先生自从接受党的教育直到死，都是积極靠攏党的。党也滿足了他的最后希望，現在他的遺体已經光荣地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了。

为了更好地紀念罗先生，我們还应該清理他留下来的一箱子遺稿，妥善地給他登記保存，以供参考，并选出应該完成的稿子来，替他完成。（傅懋勣）

悼莘田先生　　王力

弱冠文章重士林，漸归平淡轉精湛；
商量旧学旁新学，剖析今音辨古音。
共喜九洲光燦烂，那堪八載病侵尋；
語言学界同斯泪，豈特区区愴痛深。

現代汉語音节重音的声学本質

苏联 H. A. 斯茇式涅夫

本文目的在于用实驗語音学的方法，来闡明現代汉語音节重音的声学本質。①

通常認为，汉語有三种不同輕重的音节：第一种是重讀音节，它用力最大，声調听起来最清楚；第二种是次重讀音节，它用力比較小，声調仍旧听得出来，只是稍微不清楚一点；第三种是輕讀音节，即所謂輕声。輕声的声学特点并不一致。它的高低基本上取决于它前头的音节。汉語里詞和詞組的重音可以落在任何一个音节上。本文只研究双音节的詞和詞組。

我們研究的材料是 18 个前重后輕的双音詞，13 个后重前輕的双音节的詞和詞組。發音的是两个中国人——王恩裕(音)和王东(音)，全是 26 岁，都出生在北京，現在都在列宁格勒大学学習。王恩裕同志和王东同志在 1952 年以前一直未离开过北京。他們說的是北京話。两位發音人都具有中等音高，完全适合浪紋計發音人条件。不过，第二位發音人(王东)所發的音有几回是失敗的，因此本文某些个詞例只有第一位發音人的記录。

我們所研究的詞例的录音和分析工作，是在列宁格勒大学語音实驗室里做的。

下面的詞和詞組經过录音，把录音的結果作了分析：②

1. 前重后輕的詞：

'ka^1 ta^0	疙·瘩③	'xu^2 tʻu^0	胡·塗
'tuo^1 suo^0	哆·索	'ma^2 tsa^0	麻·子④
'po^1 po^0	餑·餑	'la^3 pa^0	喇·叭
'tʂu^1 tʂu^0	蛛·蛛	'tʂa^3 pa^0	眨·巴
'ku^1 ku^0	姑·姑	'pʻo^3 luo^0	笸·籮
'ʂu^1 ʂu^0	叔·叔	'ku^3 tʂʻu^0	鼓·出⑤
'ʂa^1 tsa^0	沙·子④	'pa^4 pa^0	爸·爸
'nuo^2 nuo^0	挪·挪	'luo^4 tʻuo	駱·駝
'pʻo^2 pʻo^0	婆·婆	'tʻu^4 tʂʻu^0	吐·出

2. 后重前輕的詞和詞組：

xɤ^1 'kɤ^2	合格	fu^2 'u^4	服务
tsʻaŋ^1 'pa^1	瘡疤⑥	tɕian^3 'tan^1	簡單
tsuo^4 'tsʻuo^4	做錯	tɕin^3 'tɕi^2	紧急
ʂʅ^1 'tʂʅ^2	失职	pʻu^3 'pu^4	瀑布
ɕiaŋ^1 'kaŋ^3	香港	i^4 'tɕʻi^2	一齐
tu^2 'ʂu^1	讀書	fan^4 'uan^3	飯碗
ta^2 'pa^3	打靶		

全部詞例两个發音人都各录音五次。这样，詞里每个音节的元音，就根据两个發音人十次不同的浪紋計記录，进行了十次不同的測量。全部 62 个元音測量了 570 次。

我們所以选擇以上詞例，是想使分析的結果能够帮助我們考察元音的几个特征(即音高，音長，音强，音色)之間的联系。

因此，我們完全选擇那种两个音节（重讀和輕声）元音完全相同的例子来分析。这样我們就預先排除了元音音色影响音强的可能性(看表 4)。为了研究音强跟音高的关系，我們所选的詞例中，大多数的詞和詞組都具有不同的声調組合。只有三个后重前輕的詞例，两个音节的声調是相同的。其实，在这种場合，除了元音的音色以外，还排除了声調对音强的影响。物理上的音强跟我們感覚上的，或即我們耳朵所听到的音强不一样。我們感覚到的是声音的响度。声音在同一个可以听見的程度以內，同样的音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响度。例如，在同样的音强之下，較低的声音比較高的声音响度差一些。

根据以上所述，本文的任务可以归結为以下几点：

1. 研究 1、2 两組詞和詞組中音强对声調的依賴关系；

2. 闡明在主要元音的重音里，什么因素在起着主导作用：是音强还是音長。

---

① 到現在为止，所有关于汉語重音問題的闡述，都完全建立在耳朵对詞的發音的主观听覚上，因此，当然不可能給我們提供有关这一問題的客观的資料。

② 重讀和次重讀的音节用 1，2，3，4 代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輕声用 0 表示。重讀音节除标出声調以外，还在音节前头加标重音符号 '。

③ “疙·瘩”北京話讀 ['kɤ^1 ta^0]，不讀 ['ka^1 ta^0]——譯者。

④ “沙子”“麻子”的“子”北京話平时讀 [tsɿ]，帶感情时才讀 [tsa]——譯者。

⑤ “鼓出”的“出”在北京話里有时不讀輕声——譯者。

⑥ 按“瘡疤”北京讀 [tʂʻuaŋ^1 'pa^1]，不讀 [tsʻaŋ^1 'pa^1]。下同，不另注。——譯者。

音强的分析

前音重讀的詞 首先我們可以指出，重讀元音和非重讀元音的音强的比例，是以重讀音节的声調为轉移的。

1. 在前音重讀的詞当中，有一类是重讀音节讀上声的。例如："喇·叭"['la^{3} pa^{0}]，"眨·巴"['tʂa^{3} pa^{0}]，"笸·籮" ['p'o^{3} luo^{0}] 和"鼓·出"['ku^{3} tʂ'u^{0}]。差不多在这些詞的所有录音材料里，前一音节的元音都比后一音节弱一些，虽然我們听起来重音是在前一音节上。 重讀元音和輕讀元音的音强的比例，"喇·叭" ['la^{3} pa^{0}]（圖1）这个詞第一个發音人平均是 0.84:1，第二个發音人平均是 0.61:1；"眨·巴"['tʂa^{3} pa^{0}] 这个詞是 0.78:1 和 0.53:1，"笸·籮"['p'o^{3} luo^{0}] 这个詞是 0.82:1 和 0.55:1；"鼓·出" ['ku^{3} tʂ'u^{0}]这个詞是 0.81:1 和 0.71:1（表1）。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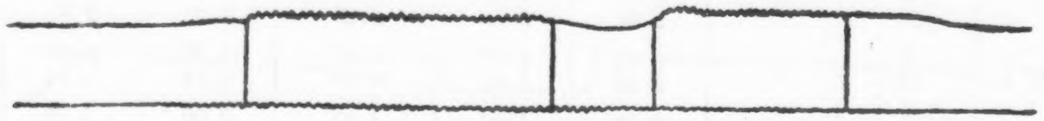


圖 1："喇·叭"['la^{3} pa^{0}]的浪紋計录音

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是，上声是四声之中最低的一个声調。因此，它的响度要比別的声調羞得多。上声后面的輕声是最高的(近于阴平)。这种情况也使得上声中的元音要比輕讀音节的元音弱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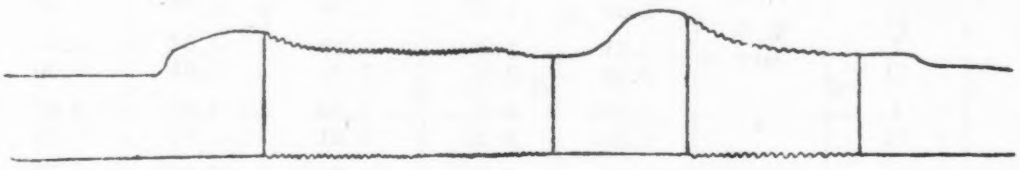


圖 2："婆·婆['p'o^{2} p'o^{0}]的浪紋計录音

2. 重讀音节讀阳平的詞有："麻·子"['ma^{2} tsa^{0}]，"挪·挪"['nuo^{2} nuo^{0}]，"婆·婆" ['p'o^{2} p'o^{0}](圖2)，和"胡·塗" ['xu^{2} t'u^{0}]。 如表1所示，重讀音节的音强差不多平均比輕讀音节大半倍。 "麻·子" ['ma^{2} tsa^{0}] 这个詞两个音节的音强比例要小一些。 很可能前一音节的元音音色在这里起着某种作用，后一音节的元音讀得跟前一音节的元音[a]不大一样。②

3. 重讀音节讀去声的詞有："爸·爸" ['pa^{4} pa^{0}]（圖3），"駱·駝" ['luo^{4} t'uo^{0}] 和 "吐·出" ['t'u^{4} tʂ'u^{0}]。 重讀音节元音的音强平均超过輕讀音节的音强半倍(看表1)。"吐·出"['t'u^{4} tʂ'u^{0}]这个詞稍为有些例外。第二个發音人这个詞共發了五次，其中有三次重讀元音比輕讀元音弱，有一次跟輕讀元音一样强。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个人發音特点的緣故，同时也由于第二个發音人在录这个詞时發音速度比較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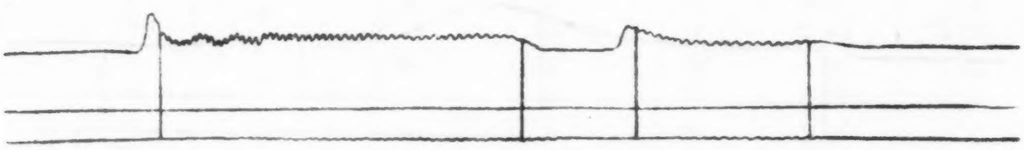


圖 3："爸·爸"['pa^{4} pa^{0}]的浪紋計录音

4. 重讀音节讀阴平的詞有："疙·瘩"['ka^{1} ta^{0}]，"沙·子" ['ʂa^{1} tsa^{0}]，"哆·嗦" ['tuo^{1} suo^{0}]（圖4a），"餑·餑" ['po^{1} po^{0}]， "蛛·蛛" ['tʂu^{1} tʂu^{0}]，"姑·姑" ['ku^{1} ku^{0}]（圖 4, б） 和 "叔·叔" ['ʂu^{1} ʂu^{0}]。

---

① 除了音長用秒表示以外，所有計算結果都用相对的大小来表示。

② 这話是对的，看前頁注④—— 譯者。

前音重讀的詞（表1）

詞	發音人	元音	比例		五次測量平均比例	一个振动最大强度的比例		五次測量平均比例
			最大	最小		最大	最小	
疙·瘩 ['ka^{1}ta^0]	I	a	2.35	1.02	1.75	2.27	1.00	1.57
	II		1.81	1.10	1.44	1.43	0.90	1.17
沙·子 ['ʂa^{1}tsa^0]	I	a	1.39	1.00	1.17	1.30	1.00	1.14
	II		2.24	1.69	1.92	2.75	1.50	2.15
哆·嗦 ['tuo^{1}suo^0]	I	(u)o	2.32	1.43	1.86	2.27	1.25	1.66
	II		3.19	1.97	2.56	4.00	2.46	3.19
餑·餑 ['po^{1}po^0]	I	(u)o	3.58	1.14	2.07	3.50	1.11	2.04
	II		2.38	2.12	2.25	3.20	2.33	2.64
蛛·蛛 ['tʂu^{1}tʂu^0]	I	u	2.24	1.07	1.52	2.70	1.00	1.54
	II		2.52	1.61	2.00	2.75	1.44	1.95
姑·姑 ['ku^{1}ku^0]	I	u	2.18	1.04	1.45	2.00	1.11	1.43
	II		1.82	0.89	1.39	1.68	0.84	1.35
叔·叔 ['ʂu^{1}ʂu^0]	I	u	1.47	1.00	1.24	1.44	1.00	1.19
	II		3.31	1.93	2.39	3.45	1.81	2.33
麻·子 ['ma^{2}tsa^0]	I	a	1.47	1.04	1.14	1.63	1.00	1.21
	II		1.25	1.00	1.16	1.65	1.29	1.41
挪·挪 ['nuo^{2}nuo^0]	I	(u)o	1.29	1.08	1.19	1.50	1.00	1.22
	II		2.18	0.91	1.39	2.30	1.05	1.52
婆·婆 ['p'o^{2}p'o^0]	I	(u)o	1.83	1.04	1.46	2.08	1.08	1.45
	II		1.84	1.32	1.56	2.46	1.40	1.73
胡·塗 ['xu^{2}t'u^0]	I	u	1.61	1.05	1.23	1.67	1.07	1.35
	II		2.03	0.97	1.40	2.61	1.00	1.73
喇·叭 ['la^{3}pa^0]	I	a	1.05	0.61	0.84	1.00	0.61	0.79
	II		0.83	0.43	0.61	0.71	0.40	0.51
眨·巴 ['tʂa^{3}pa^0]	I	a	0.96	0.58	0.78	1.00	0.73	0.87
	II		0.75	0.31	0.53	0.70	0.35	0.52
笸·籮 ['p'o^{3}luo^0]	I	(u)o	0.99	0.61	0.82	0.94	0.65	0.83
	II		0.75	0.41	0.55	1.05	0.44	0.66
鼓·出 ['ku^{3}tʂ'u^0]	I	u	1.00	0.60	0.81	1.14	0.71	0.85
	II		0.88	0.52	0.71	0.94	0.57	0.79
爸·爸 ['pa^{4}pa^0]	I	a	2.90	1.28	1.89	3.00	1.09	2.06
	II		1.88	1.00	1.45	2.36	1.08	1.72
駱·駝 ['luo^{4}t'uo^0]	I	(u)o	2.39	1.63	1.90	2.60	1.38	1.95
	II		2.50	1.35	2.08	2.23	1.40	1.84
吐·出 ['t'u^{4}tʂ'u^0]	I	u	1.64	1.08	1.32	2.30	1.40	1.65
	II		1.16	0.87	0.97	1.18	0.88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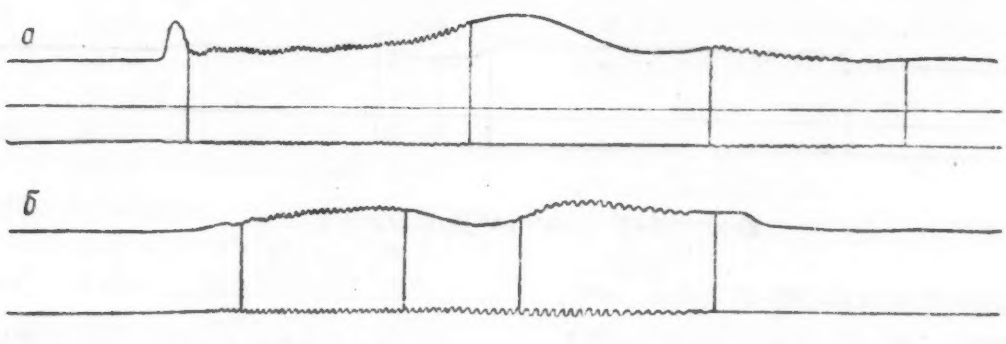


圖 4: a."哆·嗦"['tuo^1 suo^0] 的浪紋計录音
б."姑·姑" ['ku^1 ku^0] 的浪紋計录音

在这一組詞里，重讀音节的元音在所有情况下，都超过輕讀音节元音的音强（平均半倍至一倍）；我們可以看到，重讀元音跟輕讀元音的音强比例，在个别的录音中是相差比較大的：从 1.02:1 到 3.58:1，① 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元音不同的緣故。

后音重讀的詞和詞組 这一組的詞有点象第一組的詞，重讀音节元音的音强，也不是在所有場合都超过次重讀音节的元音。在十三个重讀音节中，有七个是沒有次重讀音节那样强的。

我們首先来看看“瘡疤”[tsʻaŋ^{1} ˈpa^{1}]，“合格”[xɤ^{2} ˈkɤ^{2}]和“做錯”[tsuo^{4} ˈtsʻuo^{4}]这几个詞或詞組。在这几个例子里，由于声調是相同的，所以完全排除了声調对音强和音長的影响。

在“瘡疤”[tsʻaŋ^{1} ˈpa^{1}]（圖5）这个詞里，重讀元音比次重讀元音要强一些（看表2）。但是第二个發音人的五次發音中，有两次是重讀元音比次重讀元音弱的（1:0.86，1:0.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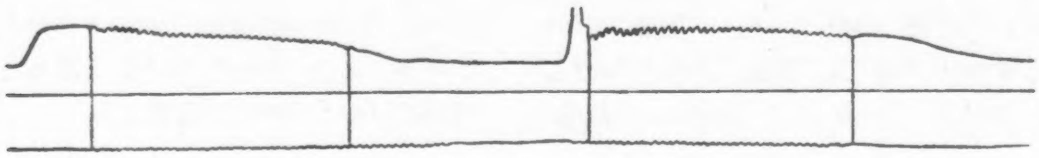


圖5：“瘡疤”[tsʻaŋ^{1} ˈpa^{1}]的浪紋計录音

后音重讀的詞和詞組（表2）

詞	發音人	元音	比例 最大	比例 最小	五次測量平均比例	一个振动最大强度的比例 最大	一个振动最大强度的比例 最小	五次測量平均比例
瘡疤[tsʻaŋ^{1} ˈpa^{1}]	I	a	1.42	1.04	1.19	1.50	1.04	1.21
	II		1.27	0.86	1.03	1.77	0.92	1.22
合格[xɤ^{2} ˈkɤ^{2}]	I	ɤ	1.37	0.85	1.01	1.50	0.85	1.06
	II		0.96	0.50	0.68	1.00	0.40	0.70
做錯[tsuo^{4} ˈtsʻuo^{4}]	I	(u)o	1.16	0.73	0.87	1.17	0.66	0.91
失职[ʂʅ^{1} ˈtʂʅ^{2}]	I	ʅ	1.41	0.70	0.97	1.35	0.83	1.08
	II		0.78	0.66	0.72	0.80	0.74	0.77
香港[ɕiaŋ^{1} ˈkaŋ^{3}]	I	a	0.57	0.43	0.50	0.63	0.46	0.55
	II		0.56	0.28	0.44	0.91	0.43	0.73
讀書[tu^{2} ˈʂu^{1}]	I	u	1.28	1.19	1.24	1.30	1.00	1.15
打靶[ta^{2} ˈpa^{3}]	I	a	0.64	0.42	0.51	0.67	0.43	0.52
	II		0.94	0.47	0.59	0.94	0.55	0.71
服务[fu^{2} ˈu^{4}]	I	u	0.79	0.70	0.74	1.00	0.82	0.93
	II		1.02	0.77	0.88	1.30	0.93	1.11
簡單[tɕian^{3} ˈtan^{1}]	I	a	2.69	1.54	1.97	2.80	1.40	1.83
	II		2.18	1.24	1.53	2.63	1.35	1.65
紧急[tɕin^{3} ˈtɕi^{2}]	I	i	1.36	1.05	1.20	1.53	1.25	1.39
	II		1.42	0.83	1.10	1.30	0.92	1.16
瀑布[pʻu^{3} ˈpu^{4}]	I	u	3.00	1.55	2.39	2.55	1.50	2.06
	II		3.51	2.66	2.88	3.13	2.37	2.78
一齐[i^{4} ˈtɕʻi^{2}]	I	i	1.58	0.89	1.18	1.36	0.78	1.13
飯碗[fan^{4} ˈuan^{3}]	I	a	0.49	0.39	0.46	0.50	0.34	0.46
	II		0.50	0.35	0.44	0.54	0.26	0.40

① 这种現象可以在第二个發音人所發的“沙·子”[ˈʂa^{1}tsa^{0}]这个詞里看見，同时也可以在“麻·子”[ˈma^{2} tsa^{0}]这个詞里看見。

在"合格"[xɤ^{2} 'kɤ^{2}] 这个詞里，①两个發音人后一音节的十次發音中，有八次是比前一音节弱的，虽然前一音节是次重讀音节。只有第一个發音人的五次發音中的两次，重讀音节比次重讀音节强一些。这两次的比例是: 1:1.04 和 1:1.37。

詞組"做錯"[tsuo^{4} 'ts'uo^{4}]的后一音节也比前一音节弱。只有第一个發音人②的五次發音中的一次，重讀音节比次重讀音节要强一些。

这一組其他詞和詞組的声調結合情况比較不一致: ③

"失职"[ʂʅ^{1} 'tʂʅ^{2}]，"香港"[ɕiaŋ^{1} 'kaŋ^{3}]，"讀書"[tu^{2} 'ʂu^{1}]，"打靶"[ta^{2} 'pa^{3}]，"服务"[fu^{2} 'u^{4}]，"簡單"[tɕian^{3} 'tan^{1}]，"紧急"[tɕin^{3} 'tɕi^{2}]，"瀑布"[p'u^{2} 'pu^{4}]，"一齐"[i^{4} 'tɕ'i^{2}]，"飯碗"[fan^{4} 'uan^{3}]。

在分析这一些詞的时候，我們可以看到一种有趣的現象。在"失职"[ʂʅ^{1} 'tʂʅ^{2}]和"讀書"[tu^{2} 'ʂu^{1}]这两个詞和詞組里，声調組合的情况正好相反: 一个是"阴平＋阳平"，一个是"阳平＋阴平"。在"失职"这个詞里，重讀元音沒有次重讀元音强，两个發音人的平均音强占次重讀元音音强的85%。与此相反，詞組"讀書"[tu^{2} 'ʂu^{1}]里次重讀元音沒有重讀元音强，仅占重讀元音音强的81%。

在以下几对詞里也有十分相似的現象: "服务"[fu^{2} 'u^{4}]和"一齐"[i^{4} 'tɕ'i^{2}](圖 6 a, 6 б)，"香港"[ɕiaŋ^{3} 'kaŋ^{3}]和"簡單"[tɕian^{3} 'tan^{2}]，"打靶"[ta^{2} 'pa^{3}]和"紧急"[tɕin^{3} 'tɕi^{2}]，"瀑布"[p'u^{2} 'pu^{4}]和"飯碗"[fan^{4} 'uan^{3}](看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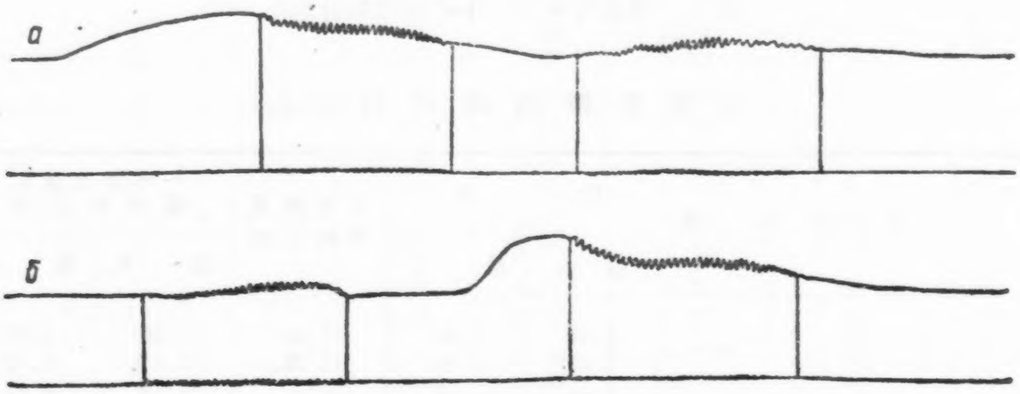


圖 6: a. "服务"[fu^{2} 'u^{4}]的浪紋計录音
б. "一齐"[i^{4} 'tɕ'i^{2}]的浪紋計录音

在所有我們上头引用的这一組詞或詞組里，一个音节如果它的声調相对地高一些，它的音强总是大一些。

音長的分析

前音重讀的詞 这一組詞中所有的詞，前一音节元音的平均長度，毫无例外地都比后一音节長。通常，重讀元音平均比輕讀元音長半倍到一倍。它們的絕对数字是: 前后两个音节的元音的平均長度两个發音人都是 0.24 和 0.13 秒。在个别的情况下，重讀元音的長度只超过輕讀元音 0.02—0.03 秒("吐·出"['t'u^{4} tʂ'u^{0}] 0.19—0.16 秒)，或者几乎超过两倍("麻·子"['ma^{2} tsa^{0}] 0.27—0.10 秒)(看表3)。

重讀元音的絕对長度，如果拿每个詞的普通情况来說，大致在 0.16—0.31 秒之間，而輕讀元音的長度則在 0.08—0.17 秒之間。如果把各个录音材料中元音的最大長度和最小長度計算在內，那末它們的長度是，重讀音节在 0.14—0.39 秒之間，輕讀音节在 0.06—0.22 秒之間。

在"叔·叔"['ʂu^{1} ʂu^{0}]和"姑·姑"['ku^{1} ku^{0}]这两个詞里，第一个發音人有两次重讀元音和輕讀元音一样長; 有一次重讀元音比輕讀元音还短 0.03 秒。这可以用形态方面的原因来解釋。这两个詞結构上都是重迭的，并且都是亲屬称謂。中国的語言工作者曾指出过，这种类型的詞，如果在当面叫的时候用，重音可以挪在后一音节上。④ 因此，关于这几个詞的数据是不完全可靠的。

至于声調和元音音長的关系，这里我們沒有看出什么規律性。

---

① "合格"这个例子不大好。这个詞在北京話里重音常常可以讀在前一音节上。这里的記录正是反映了这一实际情况——譯者。

② 第二个發音人"做錯"[tsuo^{4} 'ts'uo^{4}]这个詞沒有發好。

③ "阴平＋去声"和"去声＋阴平"这种类型的詞本文缺如，这是因为这些詞的录音不能令人滿意。

④ 《汉語詞类問題》，北京，中华，1955年，110頁。

（表 3）

詞	發音人	前一音节元音五次測量的平均長度	后一音节元音五次測量的平均長度	詞	發音人	前一音节元音五次測量的平均長度	后一音节元音五次測量的平均長度
前 音 重 讀 的 詞							
疙·瘩[ˈkɤ^{1} ta^{0}]	I	0.24	0.11	婆·婆[ˈpʻo^{2} pʻo^{0}]	I	0.26	0.14
	II	0.26	0.11		II	0.23	0.09
沙·子[ˈʂa^{1} tsa^{0}]	I	0.22	0.12	胡·塗[ˈxu^{2} tʻu^{0}]	I	0.25	0.16
	II	0.26	0.10		II	0.16	0.09
哆·嗦[ˈtuo^{1} suo^{0}]	I	0.24	0.15	喇·叭[ˈla^{3} pa^{0}]	I	0.28	0.17
	II	0.27	0.09		II	0.25	0.15
餑·餑[ˈpo^{1} po^{0}]	I	0.24	0.16	鼓·出[ˈku^{3}tʂʻu^{0}]	I	0.21	0.17
	II	0.29	0.13		II	0.17	0.12
姑·姑[ˈku^{1} ku^{0}]	I	0.19	0.17	笸·籮[ˈpʻo^{3} luo^{0}]	I	0.28	0.15
	II	0.25	0.11		II	0.22	0.13
叔·叔[ˈʂu^{1} ʂu^{0}]	I	0.20	0.15	駱·駝[ˈluo^{4} tʻuo^{0}]	I	0.21	0.12
	II	0.20	0.11		II	1.20	0.09
蛛·蛛[ˈtʂu^{1} tʂu^{0}]	I	0.21	0.13	眨·巴[ˈtʂa^{3} pa^{0}]	I	0.27	0.15
	II	0.26	0.12		II	0.25	0.13
麻·子[ˈma^{2} tsa^{0}]	I	0.28	0.12	爸·爸[ˈpa^{4}pa^{0}]	I	0.31	0.15
	II	0.26	0.08		II	0.28	0.14
挪·挪[ˈnuo^{2}nuo^{0}]	I	0.24	0.13	吐·出[ˈtʻu^{4}tʂʻu^{0}]	I	0.20	0.17
	II	0.26	0.10		II	0.18	0.15
后 音 重 讀 的 詞 和 詞 組							
搶把[tsʻaŋ^{1} ˈpa^{1}]	I	0.18	0.22	服务[fu^{2} ˈu^{4}]	I	0.21	0.32
	II	0.13	0.18		II	0.18	0.21
合格[xɤ^{2} ˈkɤ^{2}]	I	0.21	0.23	簡單[tɕian^{3} ˈtan^{1}]	I	0.10	0.20
	II	0.17	0.19		II	0.16	0.17
失职[ʂʅ^{1} ˈtʂʅ^{2}]	I	0.18	0.29	讀書[tu^{2} ˈʂu^{1}]	I	0.21	0.23
	II	0.15	0.22				
香港[ɕiaŋ^{1} ˈkaŋ^{3}]	I	0.15	0.27	緊急[tɕin^{3} ˈtɕi^{2}]	I	0.12	0.29
	II	0.12	0.21		II	0.12	0.21
做錯[tsuo^{4} ˈtsʻuo^{4}]	I	0.18	0.20	瀑布[pʻu^{3}ˈpu^{4}]	I	0.17	0.20
					II	0.17	0.20
打靶[ta^{2} ˈpa^{3}]	I	0.20	0.27	一齐[i^{4} ˈtɕʻi^{2}]	I	0.20	0.25
	II	0.22	0.26				
飯碗[fan^{4} ˈuan^{3}]	I	0.20	0.29				
	II	0.19	0.27				

后音重讀的詞和詞組 在这一組詞里，在所有場合重讀元音都比次重讀元音長。

这一組詞重讀元音和次重讀元音長度的差別，比第一組詞要小一些。这一組詞两个音节两个發音人的平均長度是，前一音节 0.17 秒，后一音节 0.23 秒。

如果把次重讀元音的長度和輕讀元音的長度加以比較，就可以發現：次重讀元音的平均長度并沒有比輕讀元音大多少（次重讀元音 0.17 秒，輕讀元音 0.13 秒）。当然，在各別的場合这一差別还是可能比較大的。

在这一組中我們也沒有看出音長对声調的依賴性。

結　論

把我們所得到的，关于元音音强和音長的数据加以对照比較，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 在汉語里，元音的音强跟該元音的声調有关系。在前音重讀的詞里，重讀元音和輕讀元音音强的比例要看重讀音节的声調而定。

在后音重讀的詞和詞組里，声調对音强的影响，表現得更为明显。在这种地方，随着声調次序的变换，音强有时是重讀音节比較强，有时是輕讀音节比較强（“服务” [fu^{2} ˈu^{4}] 1:0.81，“一齐” [i^{4} ˈtɕʻi^{2}] 0.85:1）。

根据我們所得到的数据，我們可以把声調按照音强的不同分为几等。最强的是阴平，其次是阳平，第三是去声，最弱的是上声。

2. 元音的音强实际上跟重音沒有任何关系。在我們所有的 31 个重讀音节中，有 11 个是在音强方面反而比較弱的。把我們上述 31 个詞和詞組連結在一起的是重讀元音的音長，它在所有的情况下①都比次重讀元音和輕讀元音長。

因此，在現代汉語里，詞的重音实际上是以重讀音节的音長为轉移，而不是以重讀音节的音强为轉移。因此，看来汉語是应該屬于这种語言，它的重音的特点主要是表現在量的方面。

为了闡明元音的音色与音强間的相互关系，我們統計了許多前音重讀的詞。在这些詞里，前一音节的元音或韵母都不相同，后一音节的元音或韵母則都相同。在所有的詞里前一音节都讀阳平，左下就是这些数据。

詞	元音音强的比例	詞	元音音强的比例
毯·子['tʻan² tsa°]	1.06:1	茄·子[ˌtɕʻie² tsa°]	1.39:1
牌·子['pʻai² tsa°]	1.15:1	鼻·子[ˌpi² tsa°]	1.48:1
法·子['fa² tsa°]	1.28:1	厨·子[ˌt ʻu² tsa°]	1.53:1
脖·子['po² tsa°]	1.38:1	桔·子[ˌtɕy² tsa°]	2.57:1

从左列数据可以得結論：音强最大的是高元音，音强最小的是低元音。（**金有景**譯自«朝鮮和中国語言学問題»論文集，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学术札記 *No.* 236，第六分册，1958）。

① "姑·姑['ku¹ku°]"和"叔·叔"['ʂu¹ʂu°]这两个詞是例外，我們这里沒有把它們考慮进去。

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語組大搞科学研究

經过了整風运动，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語組的教师們拔掉白旗，插上紅旗，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在短短的时間內編出了現代汉語、古代汉語、語言学概論三門課程的新教学大綱。这些新編的大綱远远超过旧大綱的水平。

除此以外，他們还提出了二十多項論文題目，决定大放科学研究的"衛星"，要在 1959 年元旦、五一、七一、十一四大节日都拿出成品——科学論文来，作为今年这几个节日的献礼。比如，«汉語僮語的比較研究»、«广西客家話調查研究»、«桂北方言研究»、«学習毛主席的文風»、«汉語單句复句的划分問題»、«"被"字句与"把"字句的研究»、«汉語詞的彙类»和«汉字的簡化和推行方法»（以上題目只是举例性質），这些題目大都是集体合作的，其中«汉語僮語的比較研究»一文由全組教师合作，并吸收僮族同学参加。

这些論文的完成将会大大地推动教学工作。比方«汉語僮語的比較研究»完成后，便可以用汉藏語系語言来說明許多語言規律，对語言学概論的教学是非常有利的。«广西客家話調查研究»、«桂北方言研究»所調查的方言地区很广，找出了这两种方言跟普通話的語音对应規律，对于語音教学便能起巨大的作用。其它各篇也都跟汉語教学有直接的关系。

他們在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也并不是沒有困难的，比方要写«汉語僮語的比較研究»就碰到这样一些困难：1)本組教师絕大部分都是汉族，不懂僮語；2)許多教师都沒有受过严格的語言学訓練，缺乏历史比較語言学的知識；3)僮語缺乏文献，沒有文字記載，只能以仅有的僮文課本（前年才編出来的）和一些散見于报刊上的調查材料为根据。但是，他們有勇气有决心向一切困难作斗爭，經过小組的討論和决議，便馬上采取了下列各种措施：

（一）組織全組教师学習僮文，采取突击办法，爭取在一两个月內基本上学会僮文。

（二）組織教师学習有关历史比較法的文献，掌握一般的和特殊的方法，对亲屬語言进行比較研究。

（三）跟广西僮文工作委員会联系，借用有关資料，并爭取他們的理論指导和技术援助。

他們深信，在党的領导下，鼓足干勁，以共产主义大跃进的精神来进行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是一定能够放出紅色"衛星"来的。（**梁振仕**）

四川邛崃話里的后加成分"兒"和"兒子"

李　　齡

邛崃話里有兒化，和北京話的兒化相当。邛崃的某些名詞兒化以后，有表示"小"或"可爱"之类的意思。在語音上，不論兒化的那个音节原来的韵母是什么，邛崃一律把原来的韵母变成［-ər］。"爸"是［ˍpa］，"爸兒"是［ˍpər］。"豆芽"是［touˀ ˍia］，"豆芽兒"是［touˀ ˍiər］。"人人乖"（圖画里的人，泥人，紙人等)是［ˍzen ˍzen${}^{21}_{55}$ ˓kuæe］，"人人乖兒"是［ˍzen ˍzen${}^{21}_{55}$ ˓kuər］。"湯元"（元宵）是［˓t'aŋ ˍyæn］，"湯元兒"是［˓t'aŋ ˍyər］。①

邛崃話里除了兒化之外，还有在名詞或量詞之后加"兒"或"兒子"的說法；其作用也是表示"小"或"可爱"之类的意思。加"兒"或加"兒子"，一般是任意的，沒有什么条件限制，也沒有意义上的差别。在語音上，加上去的"兒"或"兒子"是自成音节的，不影响被加的那个詞的讀音。

（一)名詞　能加"兒"或"兒子"的，一般是动物、物件等有形的名詞。

現在把各种加法列表如下：

情况	例詞	加兒	加兒子
單音节	狗	狗狗兒(重迭)	狗狗兒子，狗兒子②
單音节加子	猴子	猴猴兒(重迭)	猴猴兒子，猴兒子③
單音节重迭	缸缸	缸缸兒	缸缸兒子
双音节	水牛	水牛兒	水牛兒子
双音节加子	麻雀子	麻雀兒	麻雀兒子
(双音节原帶"子"的加"兒"时，失去"子")			
三音节	鬼东哥(鳥)	鬼东哥兒	鬼东哥兒子
單音节兒化	猫兒［˓mər］	猫兒猫兒兒［˓mər ˓mər ˍər］	猫兒猫兒兒子［˓mər ˓mər ˓ər ˋtsɿ${}^{53}_{33}$］
双音节兒化	鸚哥兒［ˋŋenˋkər］	鸚哥兒兒	鸚哥兒兒子

此外，有少数名詞習慣上只能說"××兒"，不許有別的說法，如：

样兒	［iaŋˀ ˍər］	模样；指人。
婆婆兒	［ˍp'o ˍp'o${}^{21}_{55}$ ˍər］	指"丈夫的媽"；一般不当面指。
奶奶兒	［˓læe ˓læe ˍər］	男孩子的阴部。

有的只能說"×兒子"，也不許有別的說法，如：

芋兒子	［yˀ ˍər ˋtsɿ${}^{53}_{33}$］	小芋头。
鬼兒子	［ˋkuei ˍər ˋtsɿ${}^{53}_{33}$］	駡人話，即"死鬼"。
龟兒子	［˓kuei ˍer ˋtsɿ${}^{53}_{33}$］	私生子。

一个名詞本来沒有"大""小"的区别，加上"兒"或"兒子"就有了"小"的意思。如"水牛兒"或"水牛兒子"，是說小水牛。本来就是"小"的意思的，加上"兒"或"兒子"就添了"可爱"之意。如"碟碟兒"或"碟碟兒子"便是。

"兒"或"兒子"如果在阳平字后面，"兒"就变調，由原来的阳平变成阴平。如"水牛兒"［ˋsuei ˍȵiou ˍər${}^{21}_{55}$］，"水牛兒子"［ˋsuei ˍȵiou ˍer${}^{21}_{55}$ ˋtsɿ］。

邛崃話里有兒化的說法，同时又有加"兒"或"兒子"的說法，两者显然不能混为一談。后一种說法在邛崃占絕对优势；相对說来，兒化的說法是比較少見的。年長的人嘴里的兒化比年輕一輩的稍多一些，知識分子嘴里兒化則很少。看来，邛崃話里兒化的說法比較趋向于衰退，而加"兒"或"兒子"的說法則正在扩張。

（二）量詞与"兒"和"兒子"的結合。量詞可以在名詞之前，表示多少；也可以在形容詞之后，說明一种程度。

1）"方、片、張、担、节、件、撮、把、点"等等單音节的量詞之后加"兒"或"兒子"时，須先重迭，同时前面加"一"或"两"，如：

方：一(两)方方兒(布)　　一(两)方方兒子(布)

点：一(两)点点兒(眼藥水)　一(两)点点兒子(眼藥水)

这种形式是表示"少"或"小"的意思。"一撮撮兒米"或"一撮撮兒子米"，是很少的一撮米。"一方方兒布"或"一方方兒子布"，是小小的一塊布。

2）容器名詞如罎子、桶桶、口袋、簸箕、蔦篼(竹制农具，盛土或农作物)、案板、沙盔子、倒伏罐等等后面加上"兒"或"兒子"，同时前面加"一"或"两"，本身成为

（下轉38頁）

---

① 邛崃有五个調类：阴平 55，阳平 21，上 53，去 324，入 33。变調时用第二調値标在本調値下面。

② 加"兒子"重迭与否一般是两可，但刀——刀刀兒子，梳——梳梳兒子，凳——凳凳兒子，甑——甑甑兒子，灶——灶灶兒子等必須重迭。这是習慣上如此，沒有什么道理。

③ 鴿子——鴿鴿兒子，箱子——箱箱兒子，椅子——椅椅兒子，杯子——杯杯兒子，碟子——碟碟兒子，墊子——墊墊兒子，鋸子——鋸鋸兒子等必須重迭。

潮州方言一些語法特点的討論

关于数量詞

白　星

李新魁先生的《潮州方言的数量詞》一文①所介紹的情况大部分都正确，但有一些誤解，現在提出我的意見供李先生和讀者参考。

1）原文(三)"一般称数"說"等級位数之間如有空位，…潮州話不用'零'，而在前一位数后面加上一个'了加[liou˨ke˧]'的連接詞，…如說'百了加三'，就是103。"这种說法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潮州話是要用"零"[꜁laŋ]或"0"[k'aŋ꜃]、單[꜀tũã]做連接詞的，如"百零三""百0三""百單三"可以随便說。潮汕区各地方音在大同之中虽有小异，但沒有"了加"这一个詞兒。所謂"百了加三"，显然是两个句子("百了"是一句，就是从一到百已經完了的意思，"加三"又是一句)。在对話的場合或許会出現这样的問答句，按一般的說法，就不說"百了加三"这样別扭的句子。李先生把問答句誤認为連接詞，錯把上句切脚，下句切头，凑成一个不知所云、难于理解的"了加"。

2）原文(三)又說"潮州話表示大概的数量(約数)用'个般母'[kai˦pan˧bo˨]或'压宝量'[iak˦po˨liaŋ˥]，这相当于普通話的'上下'或'左右'…。"这种說法也是誤解。"个般母"乍看起来很象音譯外来語。"般"字应念[꜀pũã]而原文作pan˧，把音讀錯了。这个詞应該是双音节的"版模"[꜂paŋ꜁mo]，因音变念成[꜀paŋ꜂bo]。古代鑄錢的"模"叫做"版"。② 潮州話里"版模"的涵义是"式样"，只有用它表示"法式"、"模样"的意思，并不用来表示"概数"、"約数"，也不是固定和"个"字連結在一起的。原文举的例句"伊五十岁个般母(他五十岁上下)"应改成"伊五十岁个版模(他五十岁的样子)"，改后句子里的"版模"="样子"，"个"="的"(助詞)，这是表示"模样"，不是表示"概数"、"約数"。另举几个句子来說明：

1）伊討价无版模＝他要价沒有标准
2）伊写字有版模雅＝他写字有帖式很好看
3）批評人无个版模＝批評人沒有一点分寸
4）食物件着有个版模＝吃东西应該有一点限度

"版模"这一个詞在第一句里＝"标准"，在第二句里＝"帖式"，在第三句里＝"分寸"，在第四句里＝"限度"，这种"多义性"是由那个鑄錢的版模的原始意义(式样)演变扩展出来的。但它却沒有产生"概数"、"約数"的意义，因为"式样"不是"概数""約数"。再說，第一第二两句里面沒有"个"字，第三第四两句里的"个"＝数量詞"一点"，这就說明了"个"字和"版模"是不能連結一起算一个詞的。

3）原文提出的"压宝量"，看来也好象外来語。"压"字应該念[iap꜇]而原文作iak˦，又把音讀錯了。这个詞应是"約莫量"[iak꜇mok꜇꜅liaŋ]，因音变念成[iak꜇꜂bo꜅liaŋ]，而原文却作iak˦po˨liaŋ˥，記音有誤。"約莫"是"猜度"。"量"是"估量"的"量"。"約莫量"就是"約莫估量"，相当于江北方言里的"揆情"。把它說成"差不多"、"大概"、"大約"是可以的，但不能說成"概数"、"約数"。它和"上下"、"左右"也不一样。原文的例句"許塊压宝量百人"(那里一百人左右)应改成"許塊約莫量百人"(那里差不多[大概][大約]一百人)。再举两个句子来說明：

只蕊花約莫量欲开(这一朵花[差不多][大概][大約]要开了)。

約莫量欲落雨(差不多[大概][大約]快下雨了)。

这两个句子里的"約莫量"都不是表示"概数"、"約数"，如果把"差不多"、"大概"、"大約"改做"上下"或"左右"，就不成話了。

4）原文"潮州話用'个'称花"的說法也不正确。潮州話称花、草和蔓生的瓜、果也用"欉"，如說一欉茉莉花、一欉夏枯草、一欉瓠、一欉葡萄等。称花也用"蕊"[꜂lui](＝朵，开了的花也称蕊)，带莖的用"枝"，如說一蕊蓮花、一枝梅花等。一般是不說"一个花"的。

5)原文(五)"行为称数"中"表示动作次数的'次'，潮州話用'匝'[tsua˨]"的說法也是誤解的。"匝"字(本应作帀，通常作匝)应念[tsap꜇](和"汁"同音)，原文作tsua˨是音和字不符。这个詞不是"匝"而应該是"遭"。潮州方言有一部分字文白异讀，"遭"字讀書音念[꜀tsao]，白話音念[tsua꜄]，一遭[tsua꜄]就是一次。这个"遭"在厦門的白話音里念[꜀tsua]，和潮州白話音[tsua꜄]声韵是一样的。原文又說是古詩里的"匝"(其实曹操那篇《短歌行》是繞树三"帀")。其实"匝"的意义是"环繞一周"。原文所举古詩里的"繞树三帀"，很明白是說"环繞三轉"。原文例句"伊去二匝了"，"再来一

---

① 見《中国語文》1958年5月号。

② 見《辭源》"版版六十四"条。又，清季广东自鑄銀圓，潮俗叫"光版"龙銀，間有伪造嵌入銅、鉛的叫"啞版"銀。

匝"就等于說"他去繞两轉了","再来繞一轉"。潮州話的一"遭"[tsua ²]是一次,不是"繞一轉"。"遭"和"匝"有不同的意义。

关于被动式

苏賢輝

李新魁先生在«潮州話的几种特殊句式»(載«方言与普通話集刊»第一本)中,談到被动式的类型,他說:"潮州話的被动式却与普通話的被动式有点不同。…潮州話被动句的主語却不是受动的东西,而是施动的东西,尽管整个句子具有被动的意义。潮州話的被动句不用'被'字表示,而用'乞'字表示。汉語的'被'字有蒙受的意义;而'乞'字則有'賜予'的意义。用'乞'表示被动,其主語便永远处于施动的地位。"他举了一个例子:

我乞伊批評一頓(我被他批評一頓)。

他認为这句子的意思是"我給予他把我批評一頓的机会"。他并举下列二例来作旁証:

1. 我乞伊一件东西。
2. 檣乞伊倒落去了。(李按:这个句子的意思是"檣給它自己倒下去的一个机会")

从而証实"这种特殊的形式又再一次証明'乞'的涵义,它使得主語不是受事者而是施事者"。

我覺得上面的說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潮州話的被动句的主語是施动者"的結論是值得商榷的。

我們看看下列的例子:

1) 我乞伊批評一頓。
2) 美国鬼乞志愿軍打敗了。
3) 奴仔乞水激(ke?⁴)死了!
4) 伊乞我趱(dzau³)出来。

上述例子不能解釋为:

1) 我給予他把我批評一頓的机会。
2) 美国鬼子給予志愿軍把他們打敗的机会。
3) 小孩子給予水把他淹死的机会!
4) 他給予我把他赶出来的机会。

按照我們說話时的意思只能解釋为:

1) 我被他批評一頓。
2) 美国鬼子被志愿軍打敗了。
3) 小孩子讓水溺死了!
4) 他被我赶出来。

显然,这些句子都是被动句,主語都处于被动的地位。这里的"乞"字不是"給予"的意义,而是被、讓、給、受的意义。这样,我們就不能得出"主語便永远处于施动的地位"的結論。

其次我們可以从句子結构上来分析。我覺得用下列的分析較好:

奴仔‖乞水‖激|死|了!(主語、介詞結构作状語、謂語、补語、助詞)

这里,"乞"是介詞。介詞和名詞組成介詞結构,放在动詞前面作状語,表示动作所由来(引出被动詞的施动者)。

李先生以为"普通話的被动句中'被'字可以不带宾語,而潮州話却不能。""因为'乞'后边的宾語是作为动作的承受者,所以宾語才不能省。"因而得出結論:"潮州話的被动句的主語是施动者。"

其实,普通話的被动式,介詞后边的主动者(即宾語)省去是有一定条件的。而可以省去的主动者再补进去也是可以的。比如李先生举的例子"他被說服了",可以說成"他被我說服了",或者"他被李明說服了"。潮州話不能省去施动者,它的意思就更明显,不能得出与普通話完全不同(主語是施动者)的結論。

問題在哪里呢?我覺得有两个原因:1)李先生給"乞"字的本义所限制了,認为凡是"乞"都是"賜予"的意思。他不懂得把方音写成文字时意思可能有一些距离。有些方音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字来表达,只好生造,如潮州話的"soi?⁴",或借同音字来頂替。比如"乞"字好些地方讀成"方"(puŋ),"方"与"puŋ"的原义完全不相同。2)李先生忘記了某个詞用在甲句子与乙句子有时詞性会起变化的原則,正如"乞"字用在不同句子里詞性会变一样。所以产生了錯誤。他举的两个句子:

我乞伊批評一頓。　　我乞伊一件东西。

其实这两个句子的"乞"字詞性是不同的。例1的"乞"是介詞,是"被"的意思,它和代詞"伊"組成介詞結构,放在动詞"批評"前面,表示动作所由来(引出施动者)。例2的"乞"是动詞,有"給予"的意义,"伊"是近宾語,"东西"是远宾語。两个句子的結构不同,意思不同。例1的"我"是被动者,例2的"我"是主动者,不能一律都認为"主語确实是施动者而不是受动者"。

从句子的意思、句子結构分析、"乞"字的詞性变化等方面看,我的結論是:潮州話的被动式同普通話的被动式是一样的,沒有什么特殊。

"甲伊"和"分伊"

林澤熙

詹伯慧先生的«潮州話的一些語法特点»,① 对于研究潮州方言中一些較为突出的詞法和句法的特点,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文中第二部分句法上的一些例句中,有些与潮州方言是有出入的。如第5点a)的"甲伊"[ka?˨i˧](給他)。我認为"甲伊"并不是"給他",而是"和他"。例如:

---

① 見«中国語文»1958年5月号。

你爱甲伊去地塊，[luɯ˨ ãi˥ ˦ka?˨ i˧ k'u˨ ti˥ ko˥](你要和他去哪里？)

詹先生說："撮飯甲伊食了"（把这些飯吃光）。但在潮州話里說"把这些飯吃光"是"撮飯个伊食去"。（伊在这里是指飯）。"个伊"[kai˩i˧]和"甲伊"[ka?˨i˧]是有区别的，前者相当于普通話的"把他"（它），后者相当于普通話的"和他"。詹先生把"甲伊"当成"給他"是不对的。"分伊"才是相当于普通話的"給他"。例如："玻璃杯分伊扣破了"（玻璃杯給他打破了）。同样，在"本書甲伊收起"中，"甲伊"应为"个伊"。

另一錯在b)点，詹先生的例句："你对伊支笔物害去（你把他的笔弄坏了）"。弄坏什么东西，潮州話叫"物掉"…。"你把他的笔弄坏了"，潮州話是"你对伊支笔物掉了"。也可說成"你将伊支笔物掉了"。一般潮州人的習慣說法有时把动詞提前說成"你物掉伊支笔"。

处置式及其他

俞　圭

詹伯慧先生的《潮州話的一些語法特点》一文中有一些地方与事实不符，特提出来商榷。

1）在别人面前称自己的父亲为"阮阿爸"[uaŋ˥˩a˧pa˧]。可是一般称呼时因連讀起同化作用，"阮阿"二音拼成"安"[uã˧]，加上"爸"成[uã˧pa˧]。"伊阿兄"[iŋ˧a˧hiã˧]也同样变成[ĩã˧hĩã˧]。

2）照口(意指这边)应写为"照畔"[tsiõ˨˦pãi˥]。"照"字除潮安讀[tsiẽ˨˦]外，其余各县都讀[tsiõ˨˦]。

3）"雄猫"統称"猫牯"或"猫囊"（"囊"系"郎"之訛音，潮音"囊"讀[laŋ˧]，"郎"讀[nəŋ˥]）。

4）表阴性的"鷄娜"[kəi˧nuã˨]作者注明是"沒下过蛋的母鷄"，不可靠。据我所知，潮汕各县雌鷄皆称"鷄娜"，也有称"鷄母"的。沒有下过蛋的則称"鷄娜仔"，生过多次蛋的則称"老鷄娜"或"老鷄母"。

又"猫娘"的"娘"只有潮安才讀[nie˥]，其他九县都讀[niõ˥]。"姼餔"通称"姼嫲"[tsa˧bou˨]，"姼"保存古代濁塞輔音。

5）表示顏色弱化的[hũãĩ?˥]不是入声，而且潮汕各县都沒有[-ũãĩ?]韵。通常都称"紅 huã˧˦紅huã˨"。

6）句法上，动詞前面处置式一般有"甲伊"[ka?˩˥i˧]，"个伊"[kai˥˩i˧]，"共伊"[kaŋ˩i˧]，"将伊"[tsiaŋ˧i˧]，"对伊"[tui˨˦i˧]等格式。它的用法各有分别。其中的"伊"大都指第三身代詞（他）。其用法約有下列数种。

a）甲伊（和他）

　貂婢甲伊在戏耍。（見潮州百屏歌）

b）个伊（向他、把他、与他）

　你个伊咀知。（"你通知他"或"你跟他說明。"）

c）对伊（对他）　你对伊唔住。（你对他不住）

d）将伊（把他）　你将伊撤职。

e）"共伊"与"甲伊"習慣上常通用

　你甲伊参商。
　你共伊参商。（你和他商量。）

f）"个伊"有时并无詞匯意义，只作助詞而已。"本書甲伊收起"应改为"本書个伊挠[kiə?˧]起。"意思是"把这本書收起"。

7）特别后置状語除"死、絕、爱死、哭父"等外，还有"棺材"、"死人"、"死絕"，都是形容"極"、"甚"的意思，屬程度副詞。

（上接85頁）

准量詞。如：

　罏子：一(两)罏罏兒(花生)　一(两)罏罏兒子(花生)

这种形式有表示"滿滿"或"整个"之意的作用。如"一罏罏兒花生"，是說滿滿一小罏子花生。"吃完一桶桶兒面"，是說把整个一小桶面吃完。

3）双音节重迭式量詞"点点"后面加上"兒"或"兒子"，可以跟在單音节和双音节的形容詞后面。例如：

快：	快点点兒	快点点兒子
淘气：	淘气点点兒	淘气点点兒子

这种形式表示一种最低程度。如"乖点点兒"或"乖点点兒子，"是稍微乖一些的意思。如果單說："点点兒"，"点点兒子"，是很少或很小的意思，可以对一切可多可少、可大可小的东西說，比如对"錢"或"糖果"等等；并且前面还可加上"这"或"那"，例如說"这点点兒錢"。

在語音上，无論跟在形容詞后面的或單說的，"点点"[ᶜtiæn ᶜtiæn]常常被念成[ti_{55} ti_{55}]，略微跟本方言"低"[$_c ti_{55}$]字同音了。这里的"点点"，不論就意义上看或就語音上看，显然都跟前文"一(两)点点兒(眼藥水)"里的"点点"是有所不同的。

4）某些名詞跟"一(两)…兒"或"一(两)…兒子"的格式結合，純粹表动量（动作的次数），如：

敲(它)一(两)釘錘兒	敲(它)一(两)釘錘兒子
宰(它)一(两)弯刀兒	宰(它)一(两)弯刀兒子

在这里"一"或"两"表概数，言其不多。如"敲(它)一(两)釘錘兒"或"敲(它)一(两)釘錘兒子"，是說用"釘錘子"敲(它)一下或几下的意思。

语文短评

536 故尔使得讀者对毛澤东同志关于論述解决这个矛盾諸多問題中的一个首先和主要的問題，紙老虎还是并非紙老虎的問題，自然感覚兴趣。（紅旗　1958年第11期，2頁）

1）“关于”无着落。如果說它加在“論述解决这个矛盾”之上，构成介詞結构，作“諸多問題”的定語，意思不好理解；2）“首先和主要”不如“首要”現成、經济；3）为使結构清楚，“矛盾”之后要加“的”字。

原句可以取消“关于”，并无害文意；否則可改为：“…故尔使得讀者对毛澤东同志所論述的关于解决这个矛盾的諸多問題中的一个首要問題，…”（簡澤）

537 从这些可以看出刁書記的腦子里无时无刻的都在考慮着禹县的工农业發展問題，…（旅行家　1958年11月号，21頁）

这个句子原来是想說：刁書記任何时候“都在考慮着…”，但这里正好說反了。可以改成“无时无刻不在…”或“每时每刻都在…”。（献力）

538 会議将討論研究民間运輸合作社如何向高級形式过渡，同时交流推广各地进行技术革命的經驗等問題。（新华日报　1958年11月19日1版）

“討論研究”的是“問題”，“交流推广”的是“經驗”，所以“等問題”应移在“过渡”之后。如果“交流推广…經驗”也在討論研究的范圍之內，那么“同时”要改为“如何”。（張正寰）

539 况且又是个将近六十几岁的老头子，連一个班長也当不成，說不定还要判罪。（曲波：林海雪原，444頁）

“将近六十几岁”的說法很含糊。要末說“将近六十岁”，要末說“六十几岁”。“将近”和“几”在这里不能同时并用，应去掉一个。（光　烈）

540 因为曾几何时，我們的人民还被統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人民日报　1958年9月30日8版）

“曾几何时”意思是“才过了多少时候…”，是在时間上往下叙的用語，这里是追忆过去，不能用“曾几何时”。应該用“不久以前”一类的話。（刘凱鳴）

541 在前言和注釋当中，对当时的历史和康有为年譜簡編，可以帮助讀者認識康有为由进步而反动的整个一生。（光明日报　1958年9月21日3版）

用“对”組成的介詞結构跟下面的动詞配不攏，使人不知所云。改法：在“簡編”后边添上“作了簡要的叙述和說明”。（刘凱鳴）

542 我們要高举紅旗，乘胜前进，爭取明年全县小麦亩产一千五百斤至二千斤而奋斗。（河南日报　1958年7月14日2版）

“为…而…”是一个固定的格式。“爭取”前少用了“为”。改法：在“爭取”前加“为”，或者索性去掉“而奋斗”。（陈信春）

543 到底是什么使得这四幢厂房以这样神速的速度出現在农田上呢？这是这个公司工人們的共产主义覚悟和英勇忘我的劳动态度表現的結晶。（新华日报　1958年11月30日3版）

总观两句，第二句的“这”是回答第一句的“什么”的，那应該說，“这是这个公司工人們的共产主义覚悟和英勇忘我的劳动态度”，删去“表現的結晶”。可是从第二句看，“这是…的結晶”，又象是指的“四幢厂房”了，这样，第一句的“什么”就落空了。分开看时，两句都没有錯；可是連起来研究，就有問題了。（赵宁淥）

544 全世界都强烈譴責美国的玩火行为，甚至在美国的盟国中，除了李承晚和岸信介以外，也沒有任何人公开表示願意替美国帮凶。（河北日报　1958年11月4日1版）

美国是“玩火”的“主犯”，帮助主犯的才是“帮凶”。“替”字应改成“給、为”之类的詞。（楊万昌）

545 粮站职工和全体送粮的社員，立即为了护粮保船，与風雨展开搏斗。（新华日报　1958年10月2日3版）

“立即”是表示时間的副詞，在这里是用来說明“搏斗”的，不能离开太远，应移到“与風雨”的前面去。（蕭国株）

从一篇文章的評改談起

王兆麟

1958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第四版的專栏标題“方城十二家”非常引人注目。其中《方城十二家运动在蓬勃發展中》一文，十分生动地报道了河南省方城县由劳动人民出身的十二种專家是怎样成長起来的；它反映出方城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在党的領导下，人人成为專家的共产主义風格，同时也介紹了方城县委所領导的这一运动的丰富經驗，所以这篇报道文章是很有鼓舞作用和教育意义的。

但是，从語文角度来看，这篇文章却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虽然形式上的个别毛病不足以降低內容的思想性，可是在遣詞造句上如果得到适当的加工，这篇文章的生动性和鮮明性就会更为突出。現在仅就这篇文章几处显而易見的文病談一談。

这篇文章只有两千多字，共分六段。第一段开头一句說：

> 半年多来，我县十二家共創作出詩歌、快板、圖画、順口溜两千六百多万首（幅）。

这句的毛病在于：1）“十二家”指的是十二个專家呢？还是十二个家庭呢，还是一个地名呢？令人費解。虽然第二段里对“十二家”作了解釋，可是不如在文章一开头就交代清楚。2）把“詩歌、快板、順口溜”和“圖画”放在一起說，量詞就不好用了，于是写成“圖（幅）”。这讀起来多么拗口，不如分开来說成詩歌、快板、順口溜多少首，圖画多少幅。

第三段里有一句說：“于是，原来的十二家，合并为作家（画家）…。”原意应是表示把“画家”也納入“作家”范圍，算作一“家”，依照下文体例，括号內的“画家”前应添“包括”一詞，否則便会引起誤解。下面接着有一句說，“…又为大办鋼鉄、建立人民公社、农业大生产积极的服了务”。“服务”是合成詞，不能随便拆开。

第四段里毛病比較多，这里不必就句子結构逐句評改，仅就用詞上来看一看。

例如：1）“为了巩固提高的問題”，2）“城关鎮还特以办了两所戏曲学院和歌舞学院”，3）“啓發共产主义風格的更大發揮”。例1用“为了巩固提高”已很清楚，不必再要用上“的問題”；例2里的“特以”可能是“特意”之訛，不如用“特地”。例3的“啓發…發揮”配不上，“啓發”的对象应該是“十二家”，而不是“發揮”，“發揮風格”不如說“發揚風格”，所以这句不如改成“啓發他們更进一步地發揚共产主义的風格”。

此外，这篇文章在标点符号的使用方面相当混乱。有些地方用得很不妥当，如頓号和逗号不分，句号和分号相混，情况不一，不必詳举。

这篇文章里的詞句毛病和标点錯誤，很多都是显而易見的。前边說过，尽管有这些毛病，可是文章內容是丰富的，称得起有血有肉，不能以小疵而掩大瑜；不过，要是从报刊編輯的責任問題来看，这篇文章的毛病就很值得提出来一談。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前面所加的按語里曾着重指示过，报刊編輯同志要注意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順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要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象上面指出的这篇文章的毛病以及标点上的錯誤，《光明日报》的編者如果作到适当的加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現在大家都在响应党和毛主席的改进文風的号召，努力使文章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而《光明日报》的編者在这篇文章上却表現了相反的态度，这是大不应該的。

談《旅行家》的一篇特写

何季

《旅行家》1958年11月号有一篇題为《县委書記的一天》的特写，从它描述的內容看，应該是可以写得很生动的；可是这篇特写的內容却被文字上过多的錯誤破坏了。这里試举一些例子看看。

文句不通或是錯得使人莫名其妙的，如：

1）“好！这塊是个好的矿石”。

2）他很快的就又到一种自动吸風爐群旁边去了，这个爐也是他設計出来的，…

3）…从中他發覺了有还些不是矿石也把他在砸矿石据中了。

本是一回事錯成两回事的，如“县委直屬煉鉄試驗厂”和“县委直屬屬試驗厂”，从文义上看，实际上是一个單位；“来厂長”和“宋厂長”实际上也只是一个厂長。类似这种情况在10月号16頁《百煉成鋼》一文中也存在，如“技术員馬芳”和“技术員馬芬”，从文义上看应該是一个人，可是究竟是“馬芬”呢，还是“馬芳”？

此外，11月号的特写使用标点符号的混乱和文字校对的錯誤也是十分惊人的。如有的双引号有头无尾，有的不是疑問句却用上了問号，有的該用句号而不用。至于錯字那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总之，我們認为象《旅行家》这样思想性較高、內容丰富、印刷精美、拥有广大讀者的全国性刊物，出現上述这样的錯誤是很不应該的，値得引起《旅行家》杂志編者的警惕。

书刊評介

《学文化詞典》，中华書局辞海編輯所編輯，中华書局出版。1958年11月 第1版，定价0.55元。

在群众急切需要詞典作学習工具的今天，每一部新詞典的出版都是令人欢喜的事，象《学文化詞典》这样适应工农大跃进新形势，为提高劳动人民文化而编写的詞典更値得欢迎，因此我願意給它作个介紹。

《学文化詞典》有几个特点：1）收常用字3600个，凡已認識两千多字的劳动人民都可以利用它巩固成績，进一步提高語文水平。2）單字下附一些語詞，大部分是百科性詞彙，供讀者参考檢查，能起提高思想和丰富科学知識的作用。3）單字和語詞的注解說明都簡明淺显，适合初学程度。4）条目按笔画和笔顺排列，便于檢査。这些特点同时也就是优点，說明这部詞典是一部适用的工具書。

不过，作为一部供广大人民应用的詞典，必須要求它內容充实，体系严密。《学文化詞典》在这两方面都还沒作到好处。先从所收的条目来看。書中所收單字包括一般用字和專科用字，但語詞(即合成詞、詞組等)則十之七八是專科性的，絕大部分一般語詞沒有列入(如"風俗""游戏"等)。这不但使單字和語詞的意义脫节，而且使讀者不能从書中看到有系統的語言詞彙。記录編排語言詞彙本是詞典的重要任务之一，該書"編輯說明"上声明的选詞不求系統，似有重新考慮的必要。此外在选詞上标准也不一致，如选了"集团"不收"集体"，收了"甲骨文字"不收"鐘鼎文字"或"金文"；"危"字下認为沒有收"危險"的必要，而"确"字下又列了"确切""确定"。再从注音来看。書中多音詞不注音，遇有异讀的字就發生含混的毛病。如"包干"的"干"是gān还是gàn？"了如指掌"放在"了"㊁liào音之下，将使人誤念"了"为去声。"扒"的第三义应念bā，并沒有从pá里分出来。这些是注音上的缺点和錯誤。至于用同音汉字輾轉注音，任意取舍，很少条理。如以"爭"注"征"，以"正阴"注"爭"，以"政征"注"正"，以"証"注"政"…，也应当选定常用的"正"字作注音字(注"正"字时换另一字)才整齐合理。

其次，从釋义来看，也有些問題値得商榷：1）用以举例代釋义的方法。"萄"注"葡萄的萄"是不錯的，但"泪"注"眼泪的泪"，"疲"注"腰疲腿疲的疲"就不合适了。因为"眼"下了注解，"泪"一样可以下注解；"疲"是一种感覚，可以解說明白的，可以不用"××的×"的方式。2）解釋不明确，不易理解或有錯誤。如"包袱"注"有思想問題不解决叫背包袱"，"再生产"注"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和翻复"，"价值"②注"体現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情面"注"表示的交情"等。3）解釋不全面，有遺漏。如"露骨"解釋成"形容穷凶極恶的样子"，只着眼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又如"分配"缺乏經济学上的意义，"單位"沒提到"机构"的意义等。4）措詞欠妥或有冗句有重复。欠妥的如"青貯飼料"注"…作为冬季飼养家畜的用途"，冗句如"伏虎运动"下注"…可以培养人的勇敢和机智"，重复的如"帅"②的注文与"政治挂帅"大同小异等。5）科学性不强。本書是偏重各科詞彙，想通过詞典来介紹知識的，但給各科詞彙作注时并未达到"科学的說明"的高度，有的甚至低于一般常識的水平。例如"蜘"下注"蜘蛛，昆虫名…"，"爪"zhuǎ下注"动物带叉的脚"，这些是錯誤的或不妥的。又如"变态"下只注了一般意义，沒涉及动物等科，是跟本書的体例矛盾的。6）單音詞和复音詞的意义混淆。如"汪"的第二义应取消，另收"汪汪"，把"流泪的样子"作注；"爷"的第二义"祖父"也应移在"爷爷"条下。

最后，从举例来看。書中單字举例多，复詞举例少，也是値得考慮的。举例当中，如"爪"举"指爪"；"苟"举"苟不上进"，都不大妥当。至于"政治运动"下举"抗美援朝运动，全民整風运动"作例，已經是表示用法的举例，应該把"例"换成"例如"才对。

除此以外，总观全書，似乎只是一部小字典和若干名詞术語的混合体，各个条目之間缺乏有机的联系。書中虽尽量收采了政治社会科学技术的新詞，并沒有眞实地从語言詞彙里反映出工农大众的生活，满足他們学文化的需要。我們恳切希望編者从体例和內容两方面再作修改补充，提高書的質量，使在文化革命运动中有更大的貢献。（蔚）

人民教育出版社办理郵購業务啓事

我社为了满足讀者需要，添办郵購业务。各地讀者在当地書店如果买不到我社出版的圖書期刊（新出版的教学大綱、課本、教学参考書暂不办郵購），可写信向北京景山东街48号人民教育出版社郵購組函購。我社銀行帳戶是"北京人民銀行东四办事处文教衛生25号"（个人滙款可由銀行或郵局滙寄，一元以下款額可用郵票代价）。我社备有郵購簡章，函索即寄。

复旦大学中文系語言教学上的一次革命*

湯珍珠　高天如

复旦大学中文系語言專业全体师生，在党的直接領导下，本学期开学以来繼續深入地开展了教学改革运动。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間里，語言学專业徹底地經过了一次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旧的教学大綱，馬上編写出新的教材；冲破了旧的教育体系，制訂出新的專业計划；批判掉資产阶級学术思想，每一个角落都插上了紅旗。下面介紹一下这个过程的發展情况。

一

隨着上学期双反运动以后的教学革命的深入开展，教学思想上的錯誤傾向，学术思想上的唯心主义观点都被批判了。旧的教学大綱被推翻以后，隨之而来的一个突出而艰巨的任务，就是进行新的教材建設。所有課程的大綱都要重新拟訂，主要課程的講义也要很快地編写出来。單靠几位教师，显然是不能胜任的。于是采取了群众路綫的做法：师生协作，一起动手，特别是依靠了青年同学。經过十多天的苦战，全套嶄新的教学大綱誕生了。在这基础上又进一步編写了五門主要課程的講义（約30万字）。这五門主要課程是："党的語言政策"、"資产阶級語言学說批判"、"一般語言学"、"文字改革研究"和"写作理論与实踐"。这是我們在教学革命上又一个新的胜利。这些大綱和講义根本扭轉了过去厚古薄今、重洋輕中、理論脫离实际的錯誤傾向，插上了毛澤东思想的紅旗。当然，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也不是沒有斗爭的。这个斗爭实質上就是資产阶級思想和无产阶級思想的斗爭。比如在制訂教学大綱的过程中，某些同志仍然沒有打破旧框框，束縛在所謂"系統性和完整性"的圈子里，故步自封沒有革命气概。后来經过广泛深入的討論、辯論，終于突破了旧体系，貫徹了兴无灭資的原則，保証了專业教材的思想性和科学性，取得了徹底的胜利。这不仅直接提高了教学質量，并且在同志之間开始树立了大协作的風气，为开展群众性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打开了寬广的道路。

二

在进行教材建設的同时，我們对学制問題也进行了广泛討論。有人主張把原来的五年制改为四年制，也有人主張改三年制，意見不一。后来經过对党的教育方針的学習和辯論，大家才統一了認識，决定根据原来学制不变，可是要保証三年赶五年、五年胜八年的水平。使前三年的学習質量要超过五年的学習水平，后两年要相当于过去研究生的学習水平。根据这样一个新的要求，我們就不得不重新考虑修訂專业計划。而專业計划能够訂好的一个根本問題是在于貫徹党的教育方針。于是在同志之間又开展了一个学習党的教育方針的新的鳴放和辯論高潮。

在这个基础上，我們才重新修訂了專业計划。这个新的專业計划充分体現了全面观点。把劳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科学研究和軍事体育活动都列入了教学計划。比如，每年平均有三至四个月的劳动时間，同时要求在高年級有一年的时間下厂下乡，以保証与工农接触向劳动人民学習的机会。在安排劳动时，更力求与專业相結合，解决理論联系实际的問題。要做到边劳动、边学習、边研究。比如我們在下厂下乡集中劳动时，拟开的課程是：方言和方言調查、文字改革研究、語文教学法等。此外，在專业課程的安排上也保持了基础課与理論課的一定分量，同时保証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結合。一、二年級要有一定的基础課（比原来計划增加了"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基础"、"現代汉語"、"邏輯"等課程），并且以学習为主，結合所学課程开展科学研究；三、四、五年級則有一定的理論課，同时要結合社会实际需要，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軍事体育活动方面也作了相应的安排，在下厂下乡期間，要保証有百分之十五的时間进行政治学習。

三

在深入进行教育革命的过程中，开展对資产阶級学术思想的批判，也是我們工作的重要一环。人民日報發表《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的社論以后，党組織了全体师生进行学習和討論。在認清形势，明确意义，提高認識的基础上，一个学术領域內的社会主义革命又轟轟烈烈地开始了。首先二、三、四年級的同学和青年教师写出了許多大字报和文章，集中地批判了張世祿先生的資产阶級学术思想，之后全体师生曾連續举行了两次張世祿先生資产阶級学术思想批判大会。会上教师和同学根据張世祿先生解放前后的著作

---

* 按复旦大学中文系語言教学存在的缺点和前一阶段的改革情况，本刊1958年7月号已有胡芸、阿湯的报道——編者。

兰州大学中文系的語言教学和科学研究

一、編写教材 兰州大学中文系汉語教研室在党总支的直接領导下，全体教师和二、三、四年級的部分同学，經过了两星期的苦战，編出了“語言学引論”和“現代汉語”講义。

参加編写講义的每一个人都認識到：編写講义是教学改革極其重要的一环，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爭。在編写过程中，个个認眞、負責，同学們更是干勁冲天，为了一个問題往往翻几本参考書，换几次稿紙。根据党总支的指示，初稿的每一章节都經过了小組两次以上的討論。在討論过程中，对許多問題都展开了爭論，取得了比較一致的看法。

新編講义有如下几个特点：

1）增强了党性、思想性。在新講义中，批判了資产阶級語言学說，建立了馬列主义語言学观点。“語言学引論”中增加了“党的語言政策”“語言学界两条道路的斗爭”等章节；“現代汉語”的例句多采自《紅旗譜》《林海雪原》《苦菜花》等文艺作品。

2）联系实际。新的講义的章节，首先考虑到如何才能使同学們更易接受，作了很大的更动。“現代汉語”的“語法”就擱在“詞彙”前面講，語法部分的詞法和句法也不絕对分开，例如介詞和时态助詞就擱在句法后面講，这样对“多用了介詞而使句子失去主語”“由能願动詞加动詞构成的合成謂語后不能加‘着’‘了’”等問題也就容易理解。

为了提高同学們运用語言的能力，“現代汉語”課增加了“修辞”、“常用抽象詞語分析”和“結构混乱的句子分析”等內容。

3）詳中略外。新講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例句都采自現代汉語普通話、汉語方言和少数民族語言。

新講义还增加了我国历代語言研究的某些优秀成果。

4）为了克服学了語法还不会辨别錯誤句子的缺点，“語法”部分以大量病句为例，通过病句的分析来說明正面的問題。

5）“語言学引論”“現代汉語”沒有重复的地方。講課时間大大压縮。“現代汉語”每周3小时（共3学期：緒論、語音、文字一学期，語法一学期，詞彙、修辞一学期。第一学期緒論、文字作为一部分与語音齐头并进）。“語言学引論”每周3小时，1学期講完。

二、科学研究 講义一編完师生們又投入了另一工作中——准备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在普查的基础上（1957年已完成），对甘肃全省的方言，再作一次深入、細致的調查。計划在元旦前把兰州方言調查完畢；1959年“五一”以前，把天水專区的方言調查完畢；“十一”以前把定西專区的方言調查完畢。

語音方面，为了帮助兰州人学習普通話，准备作兰州音与北京音的比較研究；为了更好地了解兰州方言的現状，准备作兰州音与中古音的比較。

詞彙是这次調查的重点。計划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按意义調查，一方面是按音节調查。經驗証明，后一种办法是調查方言特殊詞彙極其有效的办法。値得推广。

此外，語法調查也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通过别种方言的特殊格式来比較，一是从本方言作品中收集材料录制音档。（謝曉安）

和在教学中存在的問題作了深刻的分析批判。

張世祿先生在第三次大会上作了进一步的自我檢查，并表示要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希望在大家繼續帮助下徹底清除自己的資产阶級学术思想。

批判会不仅对張世祿先生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全体师生也有很大的收获。大家的政治覚悟提高了，大家的学术思想水平也提高了。老年教师和青年教师自覚地写了自我批判的文章，批判了自己的資产阶級学术思想，肃清了資产阶級学术思想的影响。

最近，我們正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大搞科学研究的热潮。打开了同学与同学、教师与教师、同学与教师之間大协作的新局面。分散的、个体的研究力量被組織起来了。教研組和二、三、四年級同学都分别拟訂了作为元旦献礼的科学研究計划。二年級的同学要白手起家編写一部《六十年来語言学思想斗争史》，三年級同学要編写一部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普通語言学》，四年級同学要写一本《高本汉批判論文集》，教师也組織了力量，提高《党的語言政策》、《資产阶級語言学說批判》等講义的質量，并爭取在年內出版。

（1958年12月7日）

语言学名词解釋（四）

北京大学語言学教研室編

43 同义詞 語言中發音不同而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詞叫做同义詞。所謂意义相同是指在相同的上下文中，我們无論怎样把它們互相替换都不感覺到其間有什么显著的差别，例如汉語的“課室”和“教室”，“星期”和“礼拜”，“可是”和“但是”，“如果”和“假如”，等等。这一类詞（又叫做等义詞或絕对同义詞）在語言中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又不能否定其存在。正因为有了这一类詞，我們才有可能在相同的上下文中选擇一个最适当的，使念起来比較順口，或避免重复，而不致影响它的意义。

大多数的同义詞都只是意义相近，而不是相同的。其中当然有某些共同点，在意义上沒有共同点的不能叫做同义詞，但是除此之外，它們在涵义上、用法上或修辞色彩上却总具有某些特点。例如汉語的“夸大”和“夸張”都是“言过其实”的意思，但在涵义上并不完全相同，“夸大”是把小的說成大的，有意加以歪曲，比方說“夸大个人的作用”，“夸大某人的缺点”，等等；“夸張”却只是“过甚其詞”，把大的說成很大，小的說成很小，或長的說成很長，短的說成很短，等等，不是有意加以歪曲。例如李白詩中有“白髮三千丈”这一句，我們就只說它是“夸張”，而不是“夸大”。有些是在用法上有限制的。例如一个人的衣服，我們可以說它很“好看”，也可以說它很“漂亮”，沒有什么显著的差别；但是一本小說，我們就只能說它很“好看”，而不能說它很“漂亮”，反过来，我們只能說“打了一个‘漂亮’的仗”，而不能說“打了一个‘好看’的仗”。另外有些同义詞是在修辞色彩上有差别的。例如“死”和“逝世”都是“丧失了生命”的意思，而“死”在修辞上是一个中性的詞，“逝世”却只用于庄严的場合。这一类詞我們都管它叫做近义詞或相对同义詞。

有些詞是可以有不同的同义詞的。例如“先生”的同义詞可以是“老师”或“教师”，也可以是“丈夫”，因为一个詞的意义往往是多方面的。

同义詞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由于新旧詞的并存。例如“眼”和“目”都指同一样的东西，它們是同义詞（或詞素），“目”是旧詞，而“眼”是比較新的詞（或詞素）。我們現在說“視官”多只称“眼睛”，但是在某种場合也可以称“眼”，如“一眼看見”，“眼底云烟”，“好汉不吃眼前亏”，等等，而不称“目”。“目”在現代汉語中已不能独立存在，但是在某些复合詞或成語中却还用“目”，不能用“眼”来代替，如“目前”，“一目了然”，“目空一切”，“目瞪口呆”，“目不識丁”，等等。有些是由于外来詞音譯和意譯的不同，例如“麦克風”和“扩音器”，“引擎”和“發动机”，等等。这些詞随着时間的进展，有些可能变成比較通用，有些却不大为人所采用。有些是由于学名、术語、委婉語和俗語等并存，例如“玉蜀黍”和“老玉米”，“腮下腺炎”和“痄腮”，“大便”和“拉屎”，等等。有些是由于个別的創新，例如“勇敢”、“英勇”、“神勇”，等等，都各有一些特殊的意味。

同义詞的产生是語言高度發展的結果，它的作用是能够表达概念的各种細微的色彩，使說話者或写作者遣詞造句达到精密的程度并避免重复。有时我們还可以利用同义詞构成复合詞和成語，例如“偉大”、“尊敬”、“东歪西斜”、“連蹦带跳”，等等，这可以減少單音节詞而使富于表現力，但是切忌生造詞，使各构成部分意味不相稱，例如“話語”，“开啓”，等等。（岑）

44 多义詞 語言中常有一詞多义的現象，那就是說，一个詞除它的基本意义之外，还可能有它的附带意义。例如汉語的“花”本来指“花朵”的“花”，但是也可以指“花布”的“花”和“眼花”的“花”。在这里，“花朵”的“花”是它的基本意义，“花布”的“花”和“眼花”的“花”都是它的附带意义。附带意义是由基本意义派生出来的。每个意义都由上下文規定，使不致相混。这样的詞就叫做多义詞。

多义詞本質上是一个詞表示几个意义，但是它跟同音詞或同音异义詞不同，因为多义詞虽然也用一个詞表示几个意义，但是这些意义之間是有联系的，即由一个意义派生成几个意义，而同音詞，例如汉語“站起来”的“站”和“火車站”的“站”，我們却找不出它們之間有什么联系。

多义詞的来源是由一个詞的基本意义派生成不同的附带詞义，每个意义都由上下文規定，这就是它的特点。但是假如这些意义后来变成相去已經很远，各自独立，使人覺察不出其間的联系，那么这些多义詞就可能变成同音詞。例如汉語的“月”本来指“月亮”的“月”，其后也可以指一年的十二分之一，如“一个月”。“月亮”的“月”是它原有的意义，“一个月”的“月”是由“月亮”的“月”派生出来的，可是后来这两个意义間的联系已經割断了，我們就只能說它們是同音詞了。（岑）

45 方言 方言是同一語言在不同地域由于演变分化而形成的变体。它是某一民族中一部分成員所說的話，只流行在这部分成員所居住的地域中。一个方言具有异于其它亲屬方言也异于民族共同語的某些語言特征。比如北京語音是汉民族語——普通話的标准音，可是北京居民把“老鼠”叫作“耗子”，把“火柴”叫作“取灯兒”，“耗子”、“取灯兒”被認为是北京的方言詞。又如广州方言[n]和[l]有别（“难”和“蘭”不同音），可是少数人[n]和[l]不分（“难”和“蘭”同音），这也是一种方言或方音現象。方言特征的內容，在各民族語中是不同的：有的語言的方言，詞彙、語法的差别大些，如德語的諸方言和意大利的諸方言就是。有的語言的諸方言，語音方面的差别大些，比如汉語各方言。社会和人民的全部历史是方言特征形成的决定因素。操同一語言的社会集体，人口不断增加，分布日益扩大，或因外族侵占而發生長途迁徙和异族杂居等現象，就会使同一語言在不同的地区产生不同的演变或發展。地理因素，在某些社会条件下也会引起方言特征的形成。

語言是随着社会的發展而發展的。由于社会集体的經济、政治、文化的变革，一个語言可以分为几个方言或者几个方言融合为統一的語言。因此，方言現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情况是不同的。在原始公社时期，氏族方言有分裂为几种不同語言的傾向；奴隶制度时期，某些方言扩展到寬广的地域，發生方言的集中；封建制度时期方言分化占优势；資本主义时期語言的統一占优势，但是由于資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和各地区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可能有完全的統一。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乡差别一步步被消灭，掀起强大的文化高潮，才能保証民族共同語的完全形成，方言差别只留下一些模糊的痕迹。（袁、余）

46 基础方言 民族共同語一般是在某一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例如北方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語的基础，庫尔斯克—奥勒尔方言是俄罗斯民族語言的基础，巴黎方言是法兰西語的基础。这些作为民族共同語基础的方言就是基础方言。

基础方言所在的地区一般都是在政治、經济、文化上占重要位置的地区。基础方言本身也是最能代表該民族語言的發展趋势的。并且，它的書面形式和口头形式都得到广泛流傳，有發展成为民族共同語的客观基础。

然而，基础方言并不等于民族共同語。任何民族共同語都比它的基础方言要丰富得多，在各方面都要超出基础方言。同时，基础方言中非常特殊的东西是不被放到民族共同語中去的。在民族共同語形成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吸取其他方言中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北方方言是汉語各方言中分布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一个大方言，流行的地区也是元明清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汉語的書面語言，从話本和元曲到《儒林外史》和《紅楼梦》，以及“五四”以后的白話作品，都是以北方方言做基础的。在各地区所使用的“官話”也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其核心是北京話。“官話”就是普通話。普通話虽然还沒被非官話区的人完全使用，但它的音早已做为“讀書音”滲透到南方方言中。可見，北方方言作为汉民族共同語的基础方言具备了各方面的条件。（余）

47 方言学 方言学是以語言的各种地方变体做为研究对象的。作为一門独立的科学，方言学是在十九世紀初叶才产生的。那时它还沒脫离人种学和民俗学的范圍。在某些国家的学术界中，它在頗大程度上至今还是人种学的附屬品。到十九世紀最后二十五年和二十世紀初，由于实际材料的累积和对各別方言事实的地域分布的研究，才兴起“語言地理学”。斯大林的語言学著作發表后，苏联語言学界就把研究語言的形成和發展过程放到重要位置，因之“历史方言学”在他們那里得到特别重視。

对方言的研究，以調查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各个方言在語音、詞彙、語法上都有自己的特征。根据对一个方言的初步了解，制定調查大綱，用語音符号（如国际音标）精确地記录語言材料（單詞、短句、成篇故事等），然后进行分析、描写，这是描写方言学的任务。把某种語言的現代方言和該語言的較古的历史阶段相联系，从而看出一个語言的形成發展过程，这就是历史方言学。用繪制圖表的方法研究方言特征的分布，不但可以确立和划分方言区，而且可以給某种語言的各方言在語音系統、語法构造和詞彙方面以系統化的知識，这叫做“方言地理学”。这种研究所得的材料对語言史是很重要的。此外，还有研究关于方言的普通理論的方言学。

我国方言的研究，最初着重在方言詞彙上。汉朝楊雄所著的《方言》，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方言著作，記录了当时各地的方言詞彙，并对特殊的詞加以解釋。可惜，这种研究沒有被繼續下来，直到章太炎的《新方言》才繼承了古代研究的傳統。二十世紀以来，我国的語言学家，对方言的研究多偏重在个别方言的調查上，而且着重的是語音，研究詞彙、語法的很少。由于他們的研究方向不明确，力量單薄分散，研究成果是另散的，內容也多厚古薄今。

党所領导的人民革命胜利以后，各方面的研究都蓬勃發展，方言的研究也在党的領导下大規模开展起来。为推广普通話而进行的方言調查，动員了全国各地大專学校的师生集体进行，时間虽短，但已取得很大

成績。方言地圖的繪制，目前也正在进行。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方言組正以大部人力投入这一工作。但汉語方言史和方言理論的研究还沒有开展起来。汉語方言复杂，为建立起汉語方言学，需要进行大量研究工作。（袁、余）

48 体 “体”是語法范疇的一种，它的作用在于說明行为或过程在一定时間內的进行情况。比方說汉語“老王光荣地入了党”，“我正在說着話”之中的“了”表示“入”这个行为或过程已經完了或完成，所以是表示行为或动作完成的完成体的；“着”表示“說”这个行为或过程正在持續地进行着，沒有完了，所以是表示行为或动作正在持續进行的持續体或进行体的；完成体和持續体（或进行体）都是屬于“体”的語法范疇的。値得注意的是“体”和“时制”的区别。傳統的語法学家把“时制”和“体”混为一談，因此英語的語法学家往往称英語 We have tried three times（我們已經試过了三次），Father had told me two weeks ago（两星期以前，父亲就告訴了我）之中的 have tried 为 try 这个动詞的現在完成时，had told 为 tell 这个动詞的过去完成时。其实“时制”只指时間，現在和过去屬于时制的范圍，完成則屬于“体”的范圍，不过因为两者都与动作或行为有关，有密切的联系罢了。汉語的“了”之类的語法成分所表示的是“体”，不是“时制”，因为它只說明行为或动作在某一时間內的完成的情况，这某一时間可以是現在，可以是过去，也可以是将来，因此，我們可以說：“我昨天看了毛主席的《实踐論》”，“我現在吃了飯就走”，“我明天上了課再跟你談談”。“体”的語法范疇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別，有的語法学家把“时制”之外的动詞的許多語法作用都划归“体”的語法范疇之內，例如把“态”、“式”等列入“体”的語法范疇之內，因为他們認为“态”和“式”等也是表明动作和行为的某种情况的，但是严格的了解，应当把“态”、“式”等和“体”区別开来，因为它們的作用尽管也在于表明动作或行为的某种情况，却是特殊的情况，并且不只是表示动作或行为的某种情况，还表示其他的情形，例如“式”还表示主观說話人的态度或感情。（高）

49 态 “态”是語法范疇的一种，是动詞所有的語法范疇，它說明动詞所指明的动作、綿延状态或变化等和主語的关系，要看动詞所指明的动作、綿延状态或变化等是主語指明的事物所發出来的或这事物所承受的。一般的說，动詞的“态”所說明的这种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主动的关系，一是被动的关系。前者表示动詞所指明的动作或綿延状态或变化等是从主語指明的事物所發出来的，动詞所有的起着这种作用的語法成分称为主动态或自动态或施动态。后者表示动詞指明的动作或綿延状态或变化等是主語指明的事物所承受的，动詞所有的起着这种作用的語法成分称为被动态或受动态。例如英語的 Father loves me（父亲爱我），这里的动詞形式 loves 指明“爱”这动作是从主語指明的“父亲”所發出来的，所以是主动态动詞；She has once been loved（她曾經被爱恋过一次），这里的动詞形式指明，“爱恋”这个动作是主語指明的“她”所受到的，所以是被动态动詞。有的語言还有中态动詞。中态动詞說明动詞指明的动作既是主語指明的事物所發出来的，又是它所承受的，有“自作自受”之意。俄語的反身动詞就是一种中态动詞，例如俄語 Товарищ торопился（同志很忙）就是中态动詞，它說明“同志把自己占住了，脫不了身”，因之“很忙”。中态动詞也可以带有彼此互相动作的意义，也就是說，指明主語所指明的不同个体之間的互相动作，例如俄語的 Друзья обнялись（朋友們彼此拥抱着），不过，在这种情形之下，也同样的表示动作既是主語指明的事物所發出来的，又是它所承受的。（高）

50 式 “式”是語法范疇的一种，屬于动詞的范圍，动詞的式是同某种語法形式結合在一起，表示說話人对所叙述的行为或动作和現实現象的主观态度的語法范疇。比方說，說話人可以把过去、現在或将来發生的事情認为是事实而用直接陈述的語气，用动詞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来加以表达，这种动詞的式就叫做陈述式。例如俄語的 она в волненье привела давно умолк нувшие чувства（它使我早已消沈的情感又激动起来），就是說話人把听話人使他早已消沈的情感又激动起来的事情看成事实，而用陈述的口气，用陈述式的动詞表达出来的；привела（激动起来）是过去时陈述式的动詞。又如說話人可以不把过去、現在或将来發生的事情認为事实，只把它看成假定的事实，而用假定的口气，拿动詞的假定式来加以表达。俄語的 пришли бы юношества лета（青春的年华也許逝去了）就是說話人用假定的态度或口气，拿假定式动詞 пришли бы（也許逝去了）来把青春的年华逝去这一事情看成假定的事实而說出来的。动詞的这种式就是假定式。各語言中的动詞的式种类很多，常見的有陈述式、假定式、命令式、願望式、条件式，等等。这些式往往是整个句子的不同口气的表現，不过是由动詞的式加以集中的表現罢了。有的語言学家把动詞的“式”看成动詞的“体”的一种，因为广泛的理解，动詞的“体”指的是动詞所指明的动作或过程的某种情况，而“式”也是情况的一种，不过，严格的說，“体”和“式”应当区別开来，因为“式”往往是整个句子的不同口气而由动詞的形式集中表現出来的，然而一般的“体”却只指明动詞所指明的动作本身的某些情况。（高）

51 时制 时制又称为时，它是語法范疇的一种，屬于动詞各語法范疇的范圍。說話人把所要叙述的动作安置于一个固定的时間內而用动詞的一套特殊的形式把这些时間表达出来的，叫做动詞的时制范疇或时的范疇。比方說，俄語的 Я пишу(我写)，Я писал（我写过）、Я буду писать（我将要写），其中 пишу 指的是說話人說話的时候他所进行的“写”的动作，писал 指的是說話人說話的时候他所已經做过的“写”的动作，буду писать 指的是說話人說話的时候他还沒有做过而将要做的“写”的动作。于是，我們就把第一种情形的动詞称为現在时动詞，第二种情形称为过去时动詞，第三种情形称为将来时动詞。“时制”是語法范疇之一，因此，它要有語法形式来表达它，用詞彙形式来表达的，不是时制范疇。比方說，如果我們用詞彙成分“昨天”、“过去”、“明天”、“将来”等来表示动作發生的时間，如“我过去当大学生”，“我昨天来北京”，“我明天上上海”，“我将来畢业”等，这种表示时間的詞彙成分就不是动詞的“时制”。“时制”和“体”是两个不同的語法范疇。从前的語法学家往往把它們混为一談，比方說，把“完成体”称为“完成时”。其实，“体”只說明动作在一定时間里的进行的情况，着重于动作情况的說明，而不指出动作是在哪一固定的时間發生的。比方說，汉語的“我吃了飯”，这“了”所表示的就是“吃”的动作在某一时間里的完成的情况，而不指明其在哪一固定的时間內完成，我們可以說“我明天吃了飯再走”，这里“了”是說明将来要發生的动作的完成情况的；也可以說“我昨天吃了飯到田里去插秧”，这里“了”却是說明过去已經發生的动作的完成情况的。“时制范疇”說明动作到底發生在什么时候，依照說話人說話的时候指明它是發生于过去、現在或将来。（高）

52 动詞 动詞这个术語来自拉丁語的 verbum（等于希腊語的 rhéma）。动詞是詞类中的一种，原先的含义指的是句子中的主要成分，即謂語，因为古代的語法学家認为句子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就是謂語，也就是动詞。这种看法当然是片面的，其实古代的語言也有以名詞为謂語的。現代的語言学家把动詞理解为具有一定語法形式而在句子結构里表明“过程”意义的詞，“过程”包括“行为”或“动作”、“綿延状态”、“变化”等。比方說，汉語的“政治要挂帅”之中的“挂帅”在这个地方具有动詞的作用，因为它具有外部形态“要”，同时也在語法結构里表明“挂帅”这个动作。俄語的 удаляться（离开）就是一个动詞，因为它有一定的語法形式，可以起“人称”、“时”、“体”、“式”等的变化，同时也在語法結构里包含有行为或动作的意义。动詞的种类很多，从其所表明的意义的区别来說，可以分为表动作动詞、表綿延状态动詞、表变化动詞；从其在句法中的关系来說，可以分为及物动詞和不及物动詞；从其与其他动詞連用与否的情形来說，可以分为一般动詞和助动詞，等等。（高）

53 及物动詞 及物动詞是动詞的一种。“及物动詞”这个术語来自拉丁語的 transtivus。拉丁語的这个术語有“通达”的意思。古代的語法学家把带有直接目的詞（即宾語）的动詞称为及物动詞，意思就是說，这种动詞无需前置詞的中介而能直接“通达”到目的詞上面去。現在的了解，及物动詞就是要求有宾語在前面或后面作为动詞指明的动作所到达的对象的动詞。反之就是不及物动詞。比方說，英語的 say（說）是及物动詞，英語的 potter（小題大作”）是不及物动詞，因为 say 要求后面有个直接目的詞（即宾語）：I say the truth（我說眞話），而 potter 后面却不能用直接目的詞：I potter（我小題大作）。汉語具有动詞作用的詞往往既可以在一种場合下具有及物动詞的作用，又可以在另一种場合下具有不及物动詞的作用。比方說，“我連看都不看”，这里的“看”沒有宾語，起着不及物动詞的作用；“我看电影”，这里的“看”有宾語，起着及物动詞的作用。（高）

上海語文学会举行《馬氏文通》出版60周年学术座談会

上海語文学会于1958年12月20日在复旦大学工会大礼堂举行《馬氏文通》出版60周年学术座談会，会議由語文学会常务副主席罗竹風同志主持。在会上發言的有陈望道、吳文祺、郭紹虞、胡裕树四位先生。陈望道先生首先說：《馬氏文通》的語法研究是有很大的成就的，但也有很多缺点，有的应当討論，有的需要批判。接着指出《馬氏文通》有三点可以肯定的成就和两点必須判批的缺点。

吳文祺先生的發言是用阶級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評价《馬氏文通》的。郭紹虞先生說：“今年是《馬氏文通》出版后的第六十年，我們紀念它，固然为了重視这部著作，即使批評它，也同样認为它在語法学上有重要的地位，有值得批評的价值。”最后胡裕树先生說：《馬氏文通》这本著作标志着汉語語法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它超越了《助詞辨略》、《經傳釋詞》、《古書疑义》等書的范圍，跳出了訓詁学的領域。但是这本書不是沒有缺点的，它的缺点首先表現在厚古薄今上，其次是机械模仿，再次是从意义（概念）出發研究語法。（程美英）

1958年度高等院校学报和学术刊物的語言学論文索引

为了帮助讀者了解一年来我国語言学界的研究情况，我們在这里作了一个論文索引。当然，可能有些篇目遺漏未列。本刊和其他語文專业刊物的論文因各有全年总目录，这里就不包括了——編者。

批判資产阶級学术思想和駁斥右派言論

批判高本汉氏著作中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江海学刊**，4月号）……葛毅卿
山大中文系語言教学中的厚古薄今、脫离实际（**文史哲**，7月号）……陈百中等
王力在語法研究中的資产阶級观点（**讀書**，9月号）……溫清波
批判張世祿先生資产阶級語言学观点（**学术月刊**，11月号）……复旦大学中文系四年級語言組第一小組
簡化汉字不是“正字”嗎？——駁斥右派分子陈夢家——（**学术論壇**，第一期）……洪篤仁
駁右派分子反对汉字改革的讕言（**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2期）……孙延璋
批判傳子东在語法理論研究上的反馬克思主义观点（**人文杂志**，第5期）……吳士勛
傳子东先生究竟站在什么立場用什么观点方法来对待汉語（**人文杂志**，第6期）……西北大学中文系語法批判小組
批判傳子东在語法理論研究上的資产阶級学术观点（**人文杂志**，第6期）……西安师范学院人民語言研究社
傳子东先生的“語法体系”剖析（**人文杂志**，第6期）……西北大学中文系語法批判小組
批判傳子东先生在主語宾語問題上的主观唯心主义（**人文杂志**，第6期）……西安师范学院人民語言研究社
傳子东先生是怎样訓釋古汉語的（**人文杂志**，第6期）……西北大学中文系語法批判小組
砍掉語言学界的一面黑旗——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兪敏的伪科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2月号）……中文系語言教研組及中三部分同学集体討論

文字改革問題

汉語拼音方案与民族团結（**民族团結**，2月号）……罗常培
大力推行拼音方案，为普及教育創造条件（**人民教育**，4月号）……韋　愨
教学汉語拼音字母的点滴經驗（**江苏教育**，4月号）……徐化民
簡化汉字建立汉字字形的規范（**文史哲**，5月号）……蔣維崧
也談“笔画”和“笔划”問題（**爭鳴**，8月号）……刘树屏
汉語拼音方案的当今任务与远大前途（**人文杂志**，第1期）……高元白
試从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动观点来看方塊汉字的改革（**学术論壇**，第3期）……欧良楷

一般語言学和文風的問題

司馬迁的諷刺語言的艺术（**文史哲**，2月号）……衛仲璠
关于譬喻（**理論与实踐**，2月号）……杜守素
从語言教育的角度看改进文風（**新聞战綫**，3月号）……叶聖陶
从“鷄毛能上天”这个比喻說起（**新聞战綫**，3月号）……黃汉生
文風中的風格問題（**新建設**，4月号）……高名凱
算式似的組織要不得（**新聞战綫**，4月号）……叶聖陶
一般語言学的对象与任务（**江海学刊**，5月号）……方光燾
論我国古代的諺語（**文史哲**，11月号）……王　驥

語音和音韵

对学習北京語音声、韵、調的發音提供几点意見（**貴州教育**，1月号）……罗文敏
北方話“濁上变去”来源試探（**学术月刊**，2月号）……楊耐思
关于汉語語音發展的几个問題［《汉語史稿》（上册）讀后感想］（**学术月刊**，2月号）……周斌武
切韵韵目四声不一貫的解釋——附論韵書晉类相从問題（**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魏建功

汉語音韵学研究綱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語文專号〕)……黎錦熙
略論汉語的入声(**人文杂志**,第4期)……楊耐思
試談邏輯重音(**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10期)……曾聪明

方言語音

成都語音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甄尙灵
潮州方音概說(**兰州大学学报**,第1期)……黃家教
万宁方音概述(**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詹伯慧
广济方音之調类与調值(**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刘 頤

詞 彙

宋元俗語研究三例(**理論与实踐**,3月号)……刘逸生
試論汉俄詞典編纂法(**上海外国語学院季刊**,第1期)……張超人
現代汉語的基本詞彙——和孙常叙先生討論基本詞彙的特点本質(**人文杂志**,第1期)……謝曉安
熟語的修辞作用(**上海外国語学院季刊**,第2期)……王德春
詞、詞組、熟語——向陆志韋先生請教(**上海外国語学院季刊**,第3期)……王德春

語 法

汉語虛詞的語法作用及其在翻譯中的处理方法(**俄文教学**,2月号)……程荣輅
关于汉語复音詞构詞形式二三例的試解(**文史哲**,4月号)……殷孟倫
关于汉語构詞法(**文史哲**,5月号)……崔伯阜
怎样研究文法、修辞(**学术月刊**,6月号)……陈望道
談"到"字的詞性和用法(**文史哲**,9月号)……李人鑑
汉語副詞是实詞还是虛詞(**文史哲**,10月号)……石安石
試論人称代詞的語法特点(**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1期)……張彥昌
語法是什么?(**厦門大学学报**,第1期)……高名凱
汉語动詞复說法的初探(**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何 融
«水滸傳»疑問句的特点(**兰州大学学报**,第2期)……黃伯荣
中学汉語語法教学的重点突出問題(**人文杂志**,第3期)……馮成麟
什么是現代汉語中的一个句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語文專号〕)……史錫堯

古汉語

甲骨文金石文札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平 心
甲骨文金石文札記(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平 心
关于秦汉間的系詞"是"(**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1期)……周光午
«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書后(**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朱德熙
古汉語如何为今服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語文專号〕)……陆宗达、肖 璋、葛信益

少数民族語文

少数民族創制和改革文字的几个問題(**民族团結**,2月号)……馬基新
建議各少数民族人民在掌握本民族語文外广泛地学習汉語汉文(**民族团結**,4月号)……薩空了
僮文的創制和推行(**民族团結**,4月号)……梁华新
社会主义大跃进中民族語文工作者的道路(**民族团結**,5月号)……包尔汉
批判少数民族語文工作中的資产阶級思想傾向(**民族团結**,5月号)……刘 岩
要学習和学好少数民族語文(**民族团結**,6月号)……薛向晨
海南保亭黎語音位系統(**学术論壇**,第1期)……陈世民、黃家教、張永言

118

日本中国語学会第九回全国大会簡記

日本中国語学会于1958年10月21日至23日在大阪外国語大学举行第九回全国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各地的語文工作者約180人。

大会第一日在討論了一般会务以后，即举行五个分科討論会：1)“汉語里如何判定詞”(宮田一郎、平山久雄、工籐篁等报告)。宮田、平山两人是根据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学說發言的，所得結論沒有什么大出入。宮田認为在一个詞內，要是可以插入别的詞，就不能算作詞(如“看見：看/不/見”不是詞)。田中認为不能把詞这种东西孤立地看，需要在句中把握它。参加討論的人所提意見認为：在詞与非詞之間，有某种“既不是詞也不是非詞”的东西，是汉語的客观事实。2)“中国的語文运动与日本的汉語教学”(柴垣、新島、小峰报告)。这个报告提到：a)汉語普通話的普及将对日本的汉語教学起安定作用，b)日本今后在汉語教学上应該采用拼音方案，c)如何进行簡化汉字教学，d)如何将中国的文字改革同日本的“略字”問題联系起来，e)中国文字改革对日本汉字問題的影响。3)“汉語应用文及其教学”(佳田、坂本、熊野)的报告中談到：中国商业文体形式的变化，横写直写的問題，書式的变化等。4)“古汉語語法上的若干問題”的报告(鈴木、牛島、內田)。鈴木是以先秦文献为中心，詳細地叙述了由“可”到“可以”的發展；牛島是以«史記»为資料，把“所以”作为連詞的安定时期，就黎錦熙、王力等人的先秦說、中古說、唐代說，各加以詳細論述；內田就六朝文献認为，“将”是表现确定与不确定間的語气，“曾不”、“曾无”是否定的强調，是反詰詞。这个討論会还对如何着手研究汉語語法史，在資料和方法論上發表了很多的意見。5)“关于唐代音韵”(水谷、賴)的报告分两部分，在“唐代声母”部分提出輕唇音和喉音两个問題，以及平声二分的問題；在“唐代韵母”部分，圍繞着重紐的問題發表了日本从所未有的新見解。因为日本汉字音同唐音关系極为密切，所以特别邀請日本国語学者池上教授参加，他从“国語学”的立場上提出了不少意見。

大会第二日，除了“汉語辞典的編纂方針”的报告和討論以外，在上午还發表了四个專題研究报告：1)关于汉語动作动詞之意义的分类(庄村忠良)，2)汉語中的招呼語(大河內康宪)，3)关于客家話海陆丰方言的音位系統(桥本万太郎)，4)由声母方面看粤語和閩語(松本一男)。

下午繼續举行專題研究报告会，有服部昌之的“关于‘呢’‘哩’和‘来’‘来着’”，望月八十吉的“关于«史記»的复杂謂語”，辻井哲夫的“魯迅作品里比喻的变迁”，以及“关于«紅楼梦»作者的研究”报告。

日本中国語学会这次大会的一个突出表現，就是青年語文研究工作者所發表的报告內容都很充实。这无疑地是日本汉語学界的新生气象，也足見学会成立十余年来所做的努力現在已开始产生了良好的成果。

这次大会还决定了从1959年4月起，編輯出版一种普及性的«中国語»杂志，由大安書店出版。

(香坂順一)

每册定价人民幣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中国語文 月刊
1959年1月号
总第79期
1959年1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員会 北京西城端王府夹道7号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印刷者 北京京华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总發行处 北京市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
代訂另售处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定价：三个月0.72元，半年1.44元，全年2.88元；寄費1.平邮寄費不計，2.挂号邮費由訂戶負担。 1—17,520册

代号2—44